

人文学刊

人文学刊

声 明

本刊仅作为学术交流与出版平台,所刊载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刊立场。本刊坚决反对抄袭、伪造数据、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可靠性由作者全权负责。

本刊为开放获取期刊。所有发表内容均采用CC BY-NC 4.0协议许可。读者可以免费获取、阅读和非商业性分享,但使用时必须明确注明作者和出处,且不得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

出版单位:拾华出版有限公司

总 编 辑:王海波

总 顾 问:胡 斌

联系地址: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2C号凯悦
商业大厦6楼602室

E - MAIL: rwxk@shiharr.com

联系 电 话: +852-9749-5505

投 稿 平 台: <https://ojs.shiharr.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pISSN 3104-5014

eISSN 3104-5022

发行范围: 全球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25年10月25日

发行定价: 免费赠阅

版权许可: 



更多科研资讯可关注官方公众号

2025年第五期第1卷



9 773104 501001

2025年
第五期第1卷

月刊

编辑部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总 编 辑: 王海波 总顾问: 胡斌

【法学编辑部】

主 编: 刘 珮
副 主 编: 陆 瑶 唐旭晨 唐丽云 苏咏喜
编 辑: 王 正 曾 霄 裴 耘 石 鑫 汪 淇 李明旭 谷成影
青年编辑: 张红军 姬红杰 江 涛 张 力 田笑潇 殷 玥 左芸菲 任志鹏
出版顾问: 马子研 胡奕帆

【教育与体育编辑部】

主 编: 何小兰
副 主 编: 龚雅哲
编 辑: 周鸿璋 鹿艺馨 苏文杰 刘洪铭 白天昊 吕文欢
青年编辑: 洪 阳 徐文佳 袁 骁 蒋心毅 王日娴
出版顾问: 曾维民 刁培鑫

【艺术学编辑部】

主 编: 莫 岚
副 主 编: 王嫄媛 周白云 郝 爽 刘 飞 刘梦雨 郭胡合璧 李嘉乐 蔡 佩
编 辑: 黄 杨 刘 颖 宋彦霖 赵 洋 贾效田 刘济君 赵沃林 王镜皓 王俊翰
张 鹏 金黛彤 李一帆 何 蕴 张靖博 袁 浩 冯志超 兰正焱 罗木英
青年编辑: 谢 民 成 玥 杨喜超 祝鹏飞
出版顾问: 胡斌

【文学与新传编辑部】

主 编: 侯本塔
副 主 编: 冯浩源 韩文涛 戚 昊 李国平
编 辑: 胡 港 井兴龙 包云龙 任韵灵 蒋瑀宸 王昊祥 孙玉豪 李 芮 佟 彤
吕淑娟 田诗昂
青年编辑: 金宇恒 黄 芊 吴宗译
出版顾问: 李显坤 吴元超 颜俊志

【历史与哲学编辑部】

主 编: 宋朝红
副 主 编: 曹 栋 孙苡森 崔梦泽 李伟强
编 辑: 曾 浩 王伟康 吴栩薇 刘宇航 许嘉杰 熊晨曦
青年编辑: 田宇洋 赵文雯 范记川 王芳芳 解 娇
出版顾问: 范宇飞

出版策划: 莫 岚 桂 军

营销策划: 谭瑞将 孔维旭 孙玉豪 颜俊志

技术编辑: 范哲文 刘霜尧 杨开路

装帧设计: 金黛彤

目 录

教育与体育

01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法律素养培养与就业联动路径研究
杨静芸、闫思好、李淑铮

06 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研究
闫思好

艺术与设计

11 符号学视域下的古村落数字活化设计--以凤院古村“重返凤院”项目为例
陈思思、尤丽华、杨玲玉

19 试论观者--AI时代架上艺术洞见
刘青云

24 算法黑箱与艺术创作主体性的嬗变:消解、重构与路径探索
兰正焱

3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的传统花鸟画创作转型
沈珺瑶

35 数字时代中国画留白美学的传承与创新:技术适配性与精神内核的平衡
温甫玉

文学与新传

40 从咏鸟诗看唐代诗人情感的变迁
徐佳怡

46 论《河山传》中微信书写的叙事功能与时代隐喻
尹丹阳

历史与文化

50 唐代河南元氏佛、道信仰研究--以出土墓志为阐释中心
陈阳阳

55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研究——以衡水地区为例
范记川、周帅、王冬桂、李晓倩、王鹏

62 方言在胶东民俗文化中的多重社会功能及社会价值

郑婕

66 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契合性研究

张文静

72 人工智能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路径探析——以“柏子仁”IP创新实践为例

贾淑华

法学

76 农地二轮延包新政中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因应与发展

钟芷琪、谢斯彤、魏旭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法律素养培养与就业联动路径研究

杨静芸^{1*}, 闫思妤¹, 李淑铮¹

(¹ 广东白云学院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450)

摘要: “大思政课”体系推行的背景下, 健全高校法律素养培养体系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浓厚校园法治文化、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当前高校法律素养培养体系存在与学生需求适配性不足、与就业创业融合度不够、师资力量不强等问题。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法学通识教育的困境, 系统性地从指导思想、人员队伍、课程体系、培养方式、资源整合等几方面优化教育体系。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法律素养; 就业指导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54>

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Integrating Legal Literacy Cultivation with Employment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ang Jingyun^{1*}, Yan Siyu¹, Li Shuzheng¹

(¹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School of Big Data and Computer Scie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50,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the "Inclu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legal literacy cultivation frame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ndispensable path to promote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nrich the campus legal culture, and further advance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 Currently, the legal literacy cultiv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s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adaptation to students' needs, inadequate integration with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and a lack of strong teaching resources. In response to the predicaments of general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optimized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guiding ideology, teaching staff, curriculum system,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gal Literacy; Career Guidance

1 引言

1.1 就业市场压力下的法律素养能力考验

作者简介: 杨静芸 (1999), 女, 湖南益阳, 硕士。

通讯作者: 杨静芸, 通讯邮箱: yangangang233@163.com

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推动互联网行业成为大学生首选就业行业，线上招聘信息平台也应运而生并逐步成为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的主要渠道。线上平台虽节约了求职者的时间成本，但也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与陷阱，如“非法职业中介”“入职先交钱”“虚假内推”“色情招聘”“传销拉新”等，大学生缺乏辨别能力，本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极易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或权益受损，或误入歧途。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将就业率的提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开展就业指导课课程时也往往聚焦技能培训这类能显著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课程，而忽略了学生就业软实力的培养，如法律素养培养。高校毕业生初入社会，缺少经验，如若缺乏必要的法律素养，在就业过程比较容易被侵害正当权益，也不会适当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

1.2 社会实践中法律素养缺位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近年来，大学生在招聘环节受骗的现象屡见不鲜，求职不成反被索赔巨额违约金也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例如2021年至2024年，犯罪嫌疑人于某以自己能办理央国企等事业单位正式员工入职为由，对应往届大学毕业生实施招工、招干诈骗，受骗人数达400余名，金额高达8000多万^[2]，这些大学生认为通过支付“介绍费”等方式入职国企，未能辨别显而易见的陷阱。其背后原因，是这些大学生缺乏必要的就业常识，在就业市场中法律素养不高，就容易陷入陷阱。而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本可以通过法学通识教育提升，来避免类似因急就业被骗的案事件。当前，大学生在就业阶段的法律素养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就业平等意识缺失。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竞争日益激烈，毕业生在求职应聘中逐步处于弱势地位，用人单位常常利用优势地位不当地缩减

2. 契约意识缺失。一旦劳动纠纷出现，毕业生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亦或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订立合同时未明确约定薪资，劳动关系确立后，毕业生才发现实际工资与用人单位先前承诺的薪资待遇想去甚远，却又维权无门。

3. 诚信守约意识缺失。在毕业生的认知里，签订就业协议后不履行约定，只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不用受到法律的约束，更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实际上就业协议订立后就具备法律效力，且通常就业协议中会有“违约责任”一节专门约束合同双方。部分毕业生在订立就业协议后因有更好的选择选择不履约，这是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行为，不仅有损于自身权益，也会扰乱就业市场、贬损学校声誉。

4. 法律维权意识缺乏。在用人单位明显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时，毕业生常常难以识别到自身合法权益受损，更难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从而后知后觉的陷入被动的局面，谓此需通过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来改变。

1.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法律素养培育的价值定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以育人为中心，注重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引导，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其中包括提升法律素养，因此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对于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是法律素养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法学教育素养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保障，是德法双修、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立足校园、走向社会、贡献国家的必备素质，大学生获得法治素养，形成良好的法治思维，将法治知识及技能开展实践工作，才能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3]

二是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是学校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教育通过“五个维度”（政治、思想、道德、法治、心理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将法律规范内化为价值认同。从校纪校规到学生管理，从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都需完善就业指导体系，提升就业服务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4]

三是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是社会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要求提升高校学生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法律素养，促进就业市场规范化，减少劳动纠纷。高校通过法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价值认同，进而引导学生在未来参与社会劳动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将法律认同运用起来，以高水平的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推进高水平的社会法治文化建设，营造遵规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2 “大思政课”视域下法学通识教育与就业衔接的问题检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各高校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思政教育理念由原本的重理论知识转向理论、实践并重，在培养理念、培养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更加突出实践导向，是加强大学生综合素养的关键举措。作为综合素养的重要环节，高校法律素养通识教育也多是依托“大思政课”推进。但是，这一体系下的法律素质教育仍然存在课程体系不完善、教育范式缺乏实践性、师资队伍不足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提升。^[5]

2.1 课程设置与大思政目标及就业需求的适配性不足

当前大学生的法治思维培养主要依托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一小部分，涉及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内容庞大，但受课时限制，学生只能浅尝辄止，因此而获得的法律思维训练和法律素质培养非常有限。同时，由于课时受限，这类课程与法律相关的内容也多是围绕法律规范具体条文的介绍与解析，未能具体围绕法学理论与法治观念展开，也缺乏价值引领，无法满足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还有改进的空间。

2.2 教学范式中实践与思政元素与就业能力培养的融合欠缺

当前，部分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中的通识课程仍然是局限于教室内的知识讲授、案例分析与书本阅读，这种教学范式难逃传统教育的窠臼，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也难以同实际生活，尤其是学生常见的创业、就业、购物等生产生活场景产生联系，学生也难以通过设身处地地思考锻炼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难以让知识入脑入心，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

2.3 师资队伍素养与专业能力与就业指导协同短板

高校法治教育仍然处于发展阶段，法学教育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使命。^[6]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要以构建育人联动机制为突破方向，增强校内外教学资源、教师等教育要素的联动，构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教师教育多维一体的育人联动格局。^[7]其中，健全教学体系和师资队伍是重要的着力点；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着重从政治标准、专业标准、师德师风等方面建立法学教师遴选和评价标准，打造政治立场坚定、法学根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专兼职教师队伍，保障法学教师当好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领路人”。

3 “大思政课”引领下法律素养培养体系与就业联动的优化路径

为推进高校法学通识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建设“大思政课”的背景下，必须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思想，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法学通识教育的困境，系统性地从指导思想、人员队伍、课程体系、培养方式、资源整合等几方面优化教育体系。以完善高质效的法学通识教育体系，真正培养出专业技能强、法治素养高的新时代高校毕业生。

3.1 构建思政、法学与就业需求深度融合课程体系

法律意识离不开系统的法治教育，在了解学生学习特点和知识需求的基础上，善于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根据就业创业方面法律知识特点开设就业法律必修课或选修课，系统讲解劳动法、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落实到各学科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中，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8]

一是要因材施教。法学通识教育体系必须要打破“一刀切”的课程设置模式，要根据上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差异，针对性地调整授课内容。如针对理工科的学生，要侧重科技伦理与法律、专利法等课程。针对人文学科的学生，则要聚焦其对法律变革史、社会发展史的兴趣，侧重于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授课。通过专业交融交叉，既能提升学生对法学教育的兴趣，又能够提升教学效果。

二是要突破传统。在教学方法上，要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增强课堂的吸引力。将法治教育融入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结合案例教学，激发学生兴趣，增加学生互动，提升课堂教育效果，

增强实用性。如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法律辩论赛等授课方式，鼓励学生就具体案例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自行研究，通过课堂展示的方式既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又能够通过同学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三是课程连贯。在课程安排上，法治教育类课程要结合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因时制宜，连续递进，不断优化升级。大一可以以提起学生兴趣为目的，通过普适性法治教育宣扬法律基本知识；大二聚焦于法治实践，通过大量的案例课程提升思辨能力；大三年级可以随着就业指导课拓宽课堂的广度，学习劳动法、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为学生就业做法治保障；大四则根据学生创业、就业的需求，开设就业创业法治思维专题讲座，聚焦于辨别岗位真伪、实际维权技巧等，帮助学生更好适应学校到社会的转变。这一连续递进的法治教育课程体系，旨在培养兼具法治信仰、规则意识、合规经营能力和维权本领的高素质人才。

3.2 营造助力就业的浸润式法治文化氛围

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除了通过课堂教学这一方式，还可以润物细无声地方式让法治教育入脑入心——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见法律、处处讲法律、处处用法律，让学生在法律教育课堂之外也能习惯于、善于运用法律知识。

法治教育应注重实践性和互动性。可以通过学生社团开展模拟招聘比赛等，在比赛中融入模拟面试、模拟劳动合同签订等环节，通过将市面上常见的合同陷阱设置在比赛中，让学生对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与签订注意事项、识别招聘陷阱技巧（传销、收费、扣押证件、不合理违约金等）、遭遇侵权（如歧视、虚假信息、拖欠薪资）时的维权途径（向学校求助、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劳动仲裁、诉讼）等实践技能更加熟练。也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入学季、毕业季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专题性普法活动，让学生亲身参与，让法律走进生活，加深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寓教于乐。

利用法律资源设立校园就业与创业法律服务中心，同时开通法律咨询服务，解决学生创业就业中遇见的实际问题。在学院中开通专门微信公众号，推送创业就业维权案例和就业法律知识汇编，扩大普法覆盖面，让学生在就业创业时期遇到的问题能获得校园法律援助。

第三，邀请法律专家、律师、法治副校长等进校开展专题讲座或法律咨询活动，通过专业人士解决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以此来强化学生维权意识。对于有帮扶需求的学生可通过职业测评和深度访谈，诊断学生技能缺口与职业倾向，明确适配创业或就业赛道，区分技术专精型、复合能力型等发展路径。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就业方向的学生，提供定制化法律指导。

3.3 推进服务就业的跨域资源整合与协同育人机制建设

一方面要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教师队伍的能力素质是基础、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充分发掘、培养具有较好的教学潜质的青年教师，也要引入外部的优质教学资源，通过专兼结合的方式，丰富教师队伍、优化教师结构。^[9]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智慧网络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慕课、人工智能教育等方式，运用翻转课堂、智慧课堂创新教学方式，拓展教学思路。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模式，构建立体的理论宣传和法治思维培育网络矩阵，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另一方面，学校要严格把关参与校园招聘的企业资质，要求参会企业签署《校园招聘承诺书》，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提供真实招聘信息、公平公正招聘、保护学生个人信息、遵守会场秩序等，明确违约责任。与用人单位、法律服务机构合作，建立就业法律咨询平台。建立毕业生入职后跟踪机制（如入职后1-3个月的问卷调查或访谈），了解实际工作情况与招聘承诺是否相符，是否存在侵权现象。对发现的问题，学校可出面与企业沟通协调，必要时为学生提供维权支持。

4 结语

要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就必须要从大学生这一群体抓起。当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在高校之中蔚然成风，当大学生进入社会后能够准确运用法律思考、解决问题，也就意味着“大思政课”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高校法律素养培养体系的健全又进了一步。

参考文献:

- [1] 汪灿. 大学生“兼职直播”被索赔, 值得警惕[EB/OL].(2024-11-09)[2025-07-09].<https://mp.weixin.qq.com/s/DpLvjBq-cI9OIulPP2JLA>.
- [2] 李华锡. 花钱买“铁饭碗”? 400 多名大学生被骗 8000 多万! [EB/OL]. (2025-02-20)[2025-02-20].<https://t.xs.youth.cn/xw/202502/t2025022015837778.html>.
- [3] 习近平.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J]. 求是, 2022(4): 4-9.
- [4] 赵艳敏. 高校法治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J]. 高教论坛, 2022(10): 10-12.
- [5] 王瑶琳. “大思政课”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思维培养的意涵、问题与路径[J]. 思想战线, 2024(4).
- [6] 黄佳. 高校法治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内涵、要求与对策[J]. 东北师大学报, 2022(4).
- [7] 杨灿明. 完善法学教育体系推动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3): 70-72.
- [8] 习近平.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J]. 求是, 2022(4): 4-9.
- [9] 刘曼. 依法治校视阈下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推进路径——以华东政法大学为例[J]. 高校后勤研究, 2022(10): 48-50.

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研究

闫思妤^{1*}

(¹ 广东白云学院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 广东省 广州市 510450)

摘要: 数字化背景下,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一种创新型学生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其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尤为关键。本文基于广东某民办本科“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工作实践, 运用问卷调查、经验总结等方法, 对如何进一步发挥“一站式”学生社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进行研究, 旨在为提升民办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强化高校学生社区育人功能。

关键词: 民办高校; “一站式”学生社区; 党建工作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09>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ie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Promo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Under Party Leadership within the Digital Context

Yan Siyu^{1*}

(¹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School of Big Data and Computer Scie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5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igitalization, the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emerged as an innovative student management model, and its rol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building a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at a private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this paper adopts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experience summarization to study how to further exert the role of the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The research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student communities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student commun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Private universities;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Party building work

1 民办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意义

自2019年教育部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后, 民办高校积极响应并贯彻落实, 这一平台日益成为民办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阵地,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也通过“一站式”学生社区得到充分发挥^[1]。

作者简介: 闫思妤 (1997), 女, 山西吕梁,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通讯作者: 闫思妤, 通讯邮箱: 18534881103@163.com

1.1 学生“主人翁”意识与教师职业成就感提升

“一站式”意味着事务办理的集成化、高效化。学生关于学业、生活、就业、医保、心理等业务的咨询和办理，在“社区”内或线上平台即可解决，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腿”，节约了学生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一站式”社区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师生之间有更多非正式、平等、轻松的交流平台，在这种氛围下，教师能及时地了解学生情况并提供指导，也能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指导对学生成长的积极影响，这种即时的、真切的正向反馈，能有效提升教师的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

1.2 党建引领工作质量与学校治理效能的提升

党建工作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学校党委重视，但落实到基层学生党支部动力不足、创新不够，亦或是党建工作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成长需求结合不紧密，最终流于形式化。而“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第二课堂的主阵地，通过组织读书会、兴趣小组、创业讲座、志愿活动等，将师生的活动中心从课堂延伸到课外，使得党建和思政工作能更好的融入学生日常生活场景，不仅丰富党建活动形式，也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容易入脑入心。而且“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将学校各方力量下沉、资源整合，打破了传统高校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的弊端，提高了学校应对学生事务的效率和响应速度。

2 民办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现状

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在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学生的工作质量，但由于受到学校、老师、学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民办高校的“一站式”平台在建设升级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困难与挑战^[2]。就目前而言，该平台的建设应用主要呈现以下现状。

2.1 民办高校“一站式”社区建设的独特性

首先是相对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拥有灵活的决策机制和办学自主权。以广东某民办高校为例，该校聚焦华南、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实施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战略，其“一站式”社区建设也符合校本特色、贴近学生实际。例如社区有U创长廊、青创空间、心理辅导示范社区等个性化空间，与头部企业共建华为云实验室、曙光数据中心等实战场景，开设区块链应用开发、边缘计算等前沿微专业，所有感兴趣学生均可学习。

其次是民办本科学生的“独特性”。除少部分高考失利之外，很大一部分学生的现状就是上公办本科差一点，上专科又不甘心，还有一部分是家里经济条件不错。这些学生自尊心强，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对事物的甄别力，因此学校“一站式”平台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打破时间、空间的壁垒，以适应不同年级、不同性格的学生特点和需求，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和帮扶措施。

2.2 民办高校党建工作开展的优劣势

基于以上两点独特性，民办高校的“一站式”学生社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也存在优劣势。优势在于极具特色的社区建设，使得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该平台进行“党建+”模式管理，将党建工作渗透到“一站式”社区服务的方方面面^[3]。但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创新型较弱，少部分学生的入党动机功利化，对党的理论知识学习缺乏内在动力。学生党员自身可能存在“随大流”心态，在学业、纪律、宿舍文明等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降低，这种情况下不仅党务工作者的管理负担较大，党建引领的作用也不尽人意。

3 以广东某民办本科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为例进行成效评估

3.1 评价指标与方法

本文以广东某民办本科为例，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有效回收305份学生的问卷，题目包含学生对于“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了解程度、主要用途以及改进意见等等，调查对象覆盖大一到大四学生，其中包括党团员与群众等，通过数据分析学生对“一站式”平台的应用程度，深入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该平台所发挥的作用。

3.2 结果分析

通过调查学生对于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知晓程度了解到，近80%的学生知道该平台的存在。而对比党团员与群众知晓情况发现，不清楚“一站式”服务平台存在的学生群众占比要高于党团员。调查学生对于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的使用情况发现，85%的学生用来请假，查成绩占到68%，晚归申请、临时不在校住宿均占到60%左右，40%的学生申请调换宿舍，50%的学生用来借阅图书。该数据也可看出线上平台的作用多用于日常管理，学生利用该平台更多的是与辅导员、宿管阿姨联系。

通过调查学生对线下“一站式”平台的知晓与应用情况发现，63%的学生对于线下该平台并不知晓，近一半的党团员也不了解该线下平台的存在。之后通过走访了解到，大部分学生经常通过该平台办理业务，只是不清楚该平台即为“一站式”学生社区，部分党团员是因为平时表现较为优异，很少用来请假等，因此对该平台知之甚少。

3.3 存在问题分析

(1) 学生参与度较低。数据表明大部分学生只知道线上“一站式”平台的存在，且多用来请假、申请晚归等操作，对于深度的学习、生活利用度较低，甚至一部分学生并不清楚该平台的存在，知晓率低，利用该平台丰富课余生活的参与度自然较低。

(2) 学生党员队伍未充分利用。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站式”服务平台与党员队伍并没有充分融合。20%的党团员不知道该平台的存在，这意味着在平台的管理过程中，一些党团员学生没有发挥应有的带头作用。民办高校中党员人数本就偏少，一部分党员的党性修养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如果学生党员队伍都无法充分发挥带头模范作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也就成效甚微。

(3) 平台服务功能与技术应用缺乏。目前线上线下平台的功能多为服务学生日常管理、生活方面，而对于利用该平台丰富第二课堂的内容很少。通过调查学生对于平台服务内容的需求情况看出，目前学生还是希望该平台能改善提升大学生活水平，例如：学生希望增加学习督促功能、分享学习经验、考研介绍和辅导、增加网络心理医生、增加学校附近的公交线路图等服务。这表明“一站式”服务平台亟需加强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资源融合力度，但问题是部分高校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未能深入到学生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各个方面，也就无法对学生开展更为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

(4)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该平台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掘。首先是学生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其次是“一站式”学生社区下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目前更多的是学工队伍发力，专任课教师较少参与其中。民办高校教师不稳定，教师党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相对较低，从而对于“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参与度较低。党员师生都无法有效利用该平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4 如何更有效发挥“一站式”社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核心地位，是确保社区发展方向不偏、动力不竭的关键。反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该平台亦发挥着前沿阵地的作用。

4.1 全员联动，凝聚建设学生社区的有效合力

第一是学生本身，学校可以成立“社区党支部”，打破学院、年级、专业等的桎梏，将学生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学生社团等有效联合，不同特色的学生党员在社区内相互交流、学习，才能加速提升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并通过传帮带模式吸引带动更多的学生加入。

第二是学工队伍进社区。辅导员本身有岗位职责，如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学生事务管理、谈心谈话等，不断强化思想辅导和日常管理，多和学生接触，才能当好学生的“暖心人”和“引路人”。

第三是专任课老师进社区。大部分民办学校现存问题是专任课老师与学生的距离感较重，多数专任课老师在校外住宿，很难与学生进行沟通。学校可以选聘优秀的思政教师、专业教师等进社区，定期参与学生社区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例如指导学生开展学科竞赛、课题研究、职

业规划等交流学习活动，实现党建+专业教育工作大融合，充分给予学生“陪伴式”成长。最后是学校领导干部进社区，校领导干部带头深入社区贴近学生，各学院可以定期开展“书记院长谈心会”，了解学生思想状态、生活学习发展需求，切实解决学生实际问题。

4.2 全过程跟进，精准实施社区服务助力学生成才

第一，高校“一站式”社区的服务内容要贯穿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和生活。一年级新生适应期：通过成立功能性党组织，组织迎新活动，促进新生快速适应大学生活。二、三年级成长发展期：可以开展各类学术讲座、技能培训、文化活动等，或邀请知名校友、企业名家等入驻社区，针对学生困惑的专业课程学习、实习就业等问题，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四年级毕业过渡期：可以组织模拟面试、实习实训、创业培训活动，确保学生在毕业前做好顺利过渡到职场的充分准备。以上贯穿四年的服务内容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也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形成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社区文化氛围。

第二，“一站式”服务要在内容上连贯，打造“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实践场所^[4]。学生社区可以结合校园文化活动，将主题党团日活动与校训校歌、校史校情、“四史”教育等交互融入，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爱党爱国情怀，也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除此之外，社区还可以举办各类专业知识竞赛、先进组织和个人的表彰会等，激励学生用专业知识、实践奋斗展现时代担当、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团队精神、通过开展劳动教育和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劳动的乐趣和价值。总之社区服务内容要坚持五育并举，让学生在活动中锻炼自身，在发展中收获知识。

4.3 全方位保障，用信息技术为社区保驾护航

首先是技术方面，目前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操作较为繁琐，系统的内容、结构和布局与学生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就需要高校在业务和技术上同时发力，协调推进，以达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要求。其次是信息方面，当前大学生面临的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爆炸，这就需要高校能够利用高效、便捷的新媒体技术，即时为学生提供最前沿、最一手的信息渠道^[5]。以“党建+就业”为例：招聘网站、企业官网、校招公告、社交媒体……海量信息扑面而来，而信息整合能力能帮助学生筛选、甄别、提炼有效信息，从嘈杂的信息环境中快速找到与自己专业、兴趣、价值观匹配的岗位，从而避免盲目海投，提高求职效率。总之数字化背景下，“一站式”社区的建设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护航保障。

5 总结

综上所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作用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当务之急是要构建面向学生、面向未来的“一站式”学生社区，因此高校必须解决顶层设计、资源配置、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挑战，以确保“一站式”平台高效化、数字化转型成功，从而更好地培养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与此同时，高校“一站式”社区的建设与日常应用要将党建工作渗透到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通过设立社区党支部、党员先锋岗等形式，尽可能地将师生党员的力量下沉到学生一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建与“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后者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黄彦天. 民办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的价值旨归、现状审视与实践进路[J].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3(03): 71-76.
- [2] 王文杰.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和实践理路[J]. 北京教育(高教), 2024, (01): 78-80.
- [3] 雷鸣. 民办高校基层支部党建与专业思政融合的现状分析与问题研究——以华南女院学前教育专业全国样板培育党支部为例[J]. 办公室业务, 2024,(11): 181-183.
- [4] 段立, 郑志玲. 基于场域优化视角下的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研究——以某民办本科高校“六型学生社区”建设为例[J]. 高校后勤研究, 2024, (08): 72-75.

[5] 张毅,李秦. 新时代高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传承和创新[J]. 领导科学论坛, 2023, (10): 7-11.

符号学视域下的古村落数字活化设计——以凤院古村“重返凤院”项目为例

陈思思^{1*}, 尤丽华¹, 杨玲玉¹

(¹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广东省 广州市 510000)

摘要: 本研究聚焦沉浸式媒介在文化遗产数字转化中的应用, 以凤院古村“重返凤院”项目为案例, 探索人工智能与沉浸式体验技术在古建筑空间营造中的实践路径。研究基于符号学框架, 构建从建筑符号到数字体验的转化方法, 整合点云扫描、BIM 建模、人工智能辅助生成与混合现实技术, 建立人机协同的设计工作流程。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知识生产、记忆建构、观众参与模式的改变机制, 并为文化遗产数字活化提供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活化; 符号转译; 沉浸式媒介; 数字艺术; 建筑文化遗产; 人机协同设计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720>

Digital Revitalization Design of Ancient Villages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Return to Fengyuan” Project in Fengyuan Ancient Village

Chen Sisi^{1*}, You Lihua¹, Yang Lingyu¹

(¹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mmersive media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Return to Fengyuan” project in Fengyuan Ancient Village as a case. I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integration of AIGC and MR technologies in shaping ancient architectural spaces. Based on a semiotic framework,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a method for transforming architectural symbols into digital experiences, integrating point cloud scanning, BIM modeling, AI-assisted generation, and mixed reality technologies to establish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design workflow. The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digital technologies reshape traditional cultural knowledge production, memory construction, an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model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rev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Digital revitalization; Symbolic translation; Immersive media; Digital art; Architectural cultural heritag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design

引言

凤院古村位于广州从化, 始建于宋代, 距今已有 800 余年历史, 2000 年被列入广州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村落以宗祠为核心, 祖屋与私塾沿轴线展开, 风水塘环绕外围, 空间格局兼具广府“临街设铺、礼制宗祠”特征与客家“围合聚居、农耕民俗”基因, 是广客文化交融的典型古村落^[1]。然而当前古村文化遗产传承面临多重挑战: 传统宗族关系结构变化导致祠堂等核心空

间使用率下降，建筑构件因缺乏日常维护出现损坏，年轻群体对传统民俗与建筑技艺的认知度持续降低，现有静态展板与节庆活动难以建立有效的情感连接^[2]，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研究聚焦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凤院古村“广客融合”建筑文化如何通过符号学的语形、语义、语用三维度进行解析，为数字转化提供理论框架；第二，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传统文化的知识生产、记忆建构与观众参与模式；第三，数字活化实践中如何平衡文化真实性与技术创新性。研究以“重返凤院”沉浸式体验项目为案例，探讨符号学理论指导下的数字活化路径，为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当代转化提供参考。

1 凤院古村“广客融合”文化符号的三维解析

本研究以符号学为理论框架，从语形、语义、语用三个维度解构凤院古村“广客融合”建筑文化的符号体系，为数字活化实践提供文化依据与内容支撑^[3]。

1.1 语形维度：建筑形态的融合表达

凤院古村的空间形态呈现出典型的客家村落特征与广府装饰传统的叠加。村落以12条南北纵向古巷为骨架构成棋盘式格局，村前月牙形风水塘与禾坪构成入口缓冲区域。祠堂群是空间核心，渤海大宗祠居中统领，周边环绕月竹公祠、云麓公祠等六座家祠，形成辐射式礼制序列；民居与骑楼式商铺散落其间，构建起祭祀、居住、商贸互补的空间体系。结构层面，祠堂多采用官样歇山顶，以三进格局按前堂、中厅、后寝序列展开，如渤海大宗祠进深达54米，严格遵循礼制空间的进深要求。梁架融合抬梁式与穿斗式技术，配合高坡度屋顶与“一明两暗”的通风布局，形成应对岭南气候的结构方案。装饰以木雕、灰塑为核心，封檐板刻戏剧场景与岭南风情，正脊塑龙船形饰博古纹，山墙置鳌鱼灰塑，楹联匾额构成完整的文字符号系统。材料选择花岗岩、杉木、青砖、素瓦组合，形成“石基、木架、青砖、黛瓦”的视觉基调，配合广府赭红、岭南青灰、客家明黄的色彩体系^[4]，这些形态、视觉要素可通过点云扫描、高清建模转化为数字素材库。

1.2 语义维度：文化意义的圈层建构

建筑形态承载着从家族到地域的圈层文化意义。空间布局层面，古巷门楼配置神坛既延续广府分坊治理传统，又契合客家聚族防御需求；风水塘兼具广府“藏风聚气”理念与客家“蓄水防旱”功能，体现两种文化的实用调适。祠堂空间序列体现家族价值观的物化表达，歇山顶限定科举及第者建造，进士牌坊与旗杆夹呼应“耕读传家”理念，三进格局的功能分区既满足广府宗族礼制又适配客家集体祭祀，如渤海大宗祠冬至祭祖按辈分排序、新贵主祭，融合了等级秩序与宗族团聚的双重传统^[5]。装饰语义层面承载伦理教化功能。木雕戏剧场景多取材于忠孝节义题材，体现儒家价值观的视觉表达；灰塑博古纹饰具有祈福意涵，鳌鱼造型兼具避雷与驱邪的实用与象征双重属性。现存大量楹联匾额，蕴含文化信息和内容素材。材料选择具有象征属性：花岗岩的坚硬质地对应宗族根基的稳固性，杉木的柔韧性关联文化传承的适应性，青砖黛瓦作为岭南乡村的典型材料承载地域记忆，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对应关系。

1.3 语用维度：功能演变的历时逻辑

建筑功能随历史进程呈现动态演变。古巷从封闭防御转为游览动线，祠堂从祭祀空间转型为文化展示场所，如云林公祠历经明清私塾、民国学堂、当代展示厅的功能迭代，云麓公祠广场成为“掷彩门”非遗活动的固定场地，这类时空转换可通过数字技术动态呈现。结构设计体现技术理性，抬梁穿斗式木架构保证承重与灵活性，高坡度屋顶配合花岗岩柱础形成防雨防潮方案^[6]，三进纵深既满足礼制又实现空间高效利用。装饰的实用与审美属性呈现功能复合特征：鳌鱼灰塑兼具避雷与驱邪功能，砖雕漏窗实现通风与借景双重作用，木雕封檐板在遮蔽梁架的同时承载文化叙事。材料的地域适应性体现生态适应原则：花岗岩就地取材且防潮性能良好，杉木质地轻盈便于加工，青砖素瓦成本较低便于维护。这些功能逻辑与装饰细节的关联可设计为沉浸式互动场景，使体验者理解传统建筑的技术特征。

通过符号学三维解析^[7]，本研究提炼出凤院古村建筑的核心符号要素：语形层提供数字建模的视觉基础，语义层构建文化叙事的价值内核，语用层揭示互动体验的场景依据。三者构成完整的符号系统框架（表1），为下文的数字活化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2 “重返凤院”的设计逻辑

本项目基于符号学“语形、语义、语用”三维框架，结合数字技术打造古村落沉浸式体验空间。项目设定两个核心目标：一是实现空间的“存旧续新”，对传统建筑进行活化利用；二是完成时间的“解析重构”^[8]，通过还原普通村民人生历程建立历史与当代的情感连接。设计以符号学理论为底层逻辑，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空间叙事。

2.1 符号学三维设计框架

设计框架以符号学的语形、语义、语用三个维度为核心，构建了从物质形态到文化意义再到互动体验的完整链条。

语形层关注建筑的物质形态，以凤院古村的空间结构为基础，运用点云扫描、BIM 建模等数字技术精准复刻古巷格局、宗祠结构、木雕灰塑等核心建筑要素，通过数字化手段将传统建筑的形态特征、材质肌理进行高精度还原，为沉浸式体验构建视觉框架。语义层以文化叙事为主线，围绕一位凤院村民的人生轨迹展开设计，在宗祠、祖屋、风水塘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场域中，系统再现出生、成长、婚恋、晚年等人生重要节点，通过仪式、生活场景和象征元素的立体呈现，重构广府与客家文化融合的生活图景，传递文化价值与情感记忆。语用层着重于互动体验的设计，通过混合现实（MR）技术实现虚实交融的沉浸效果，在古巷、宗祠等历史空间中植入多感官交互环节，使传统建筑的功能从历史延伸至当代，让参与者成为历史场景的体验者与文化传承的参与者。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形成“物质载体、文化内涵、互动体验”的协同系统。

2.2 用户定位与传播策略

项目将年轻群体作为核心目标用户。当前非遗文化在呈现方式上缺乏互动性与娱乐性，表现形式相对单一，导致年轻群体的实际参与度较低。本设计利用年轻人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度与社交分享习惯，通过构建沉浸式、强互动的文化体验空间，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数字内容，借助社交网络实现“体验、分享、传播”的传播路径。

2.3 叙事内容架构

设计的叙事内容以一位凤院村民的完整人生历程为主线，通过七个核心节点构建文化体验网络。出生节点在祖屋中还原满月酒、百日宴等仪式场景；童年节点设计农耕体验区和私塾场景；求学节点展示教育相关的文物器具；成年节点重现冠礼、笄礼等成人仪式；婚恋节点还原客家婚礼的准备与举行过程；工作节点展示客家人在手工艺、农业、商业等领域的历史贡献；晚年节点再现茶馆、棋牌室等老年人日常聚集的生活场景（表2）。七个节点共同编织出一幅完整的客家生活画卷。

表2 “重返凤院” 内容架构表



3 “重返凤院”的技术路径与实践

本研究采用人机协同设计方法，结合点云扫描、BIM建模、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等技术，对凤院古村传统建筑进行数字化转化。设计选取祖屋、私塾等闲置建筑作为实施载体，通过空间功能转化将其改造为文化展览与体验空间，在保持建筑本体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历史空间的当代利用。

3.1 数据采集与数字模型构建

初期阶段以文化数据采集为基础工作。研究团队对岭南传统民居进行田野调查，系统收集凤院古村的历史文献、建筑图纸及文化遗物，实地拍摄古建筑影像资料。采集内容涵盖空间布局、结构形式、装饰语法等建筑信息，以及宗族礼仪、生活习俗等文化内容，为后续数字化工作建立资料库。在此基础上，运用点云技术对目标建筑进行三维扫描，生成高精度数字模型，通过BIM软件(Rhino、Revit)完成结构化建模，确保数字模型的尺度准确性与结构合理性(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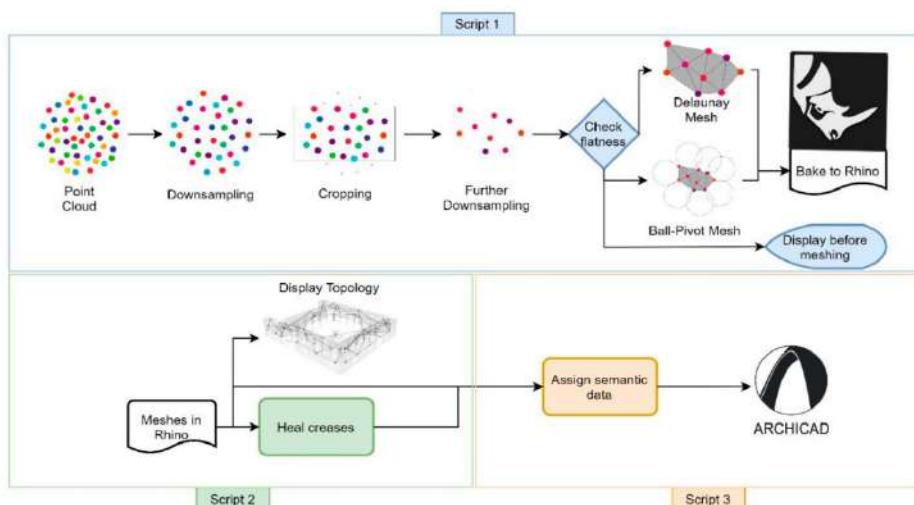


图1 自动参数化工作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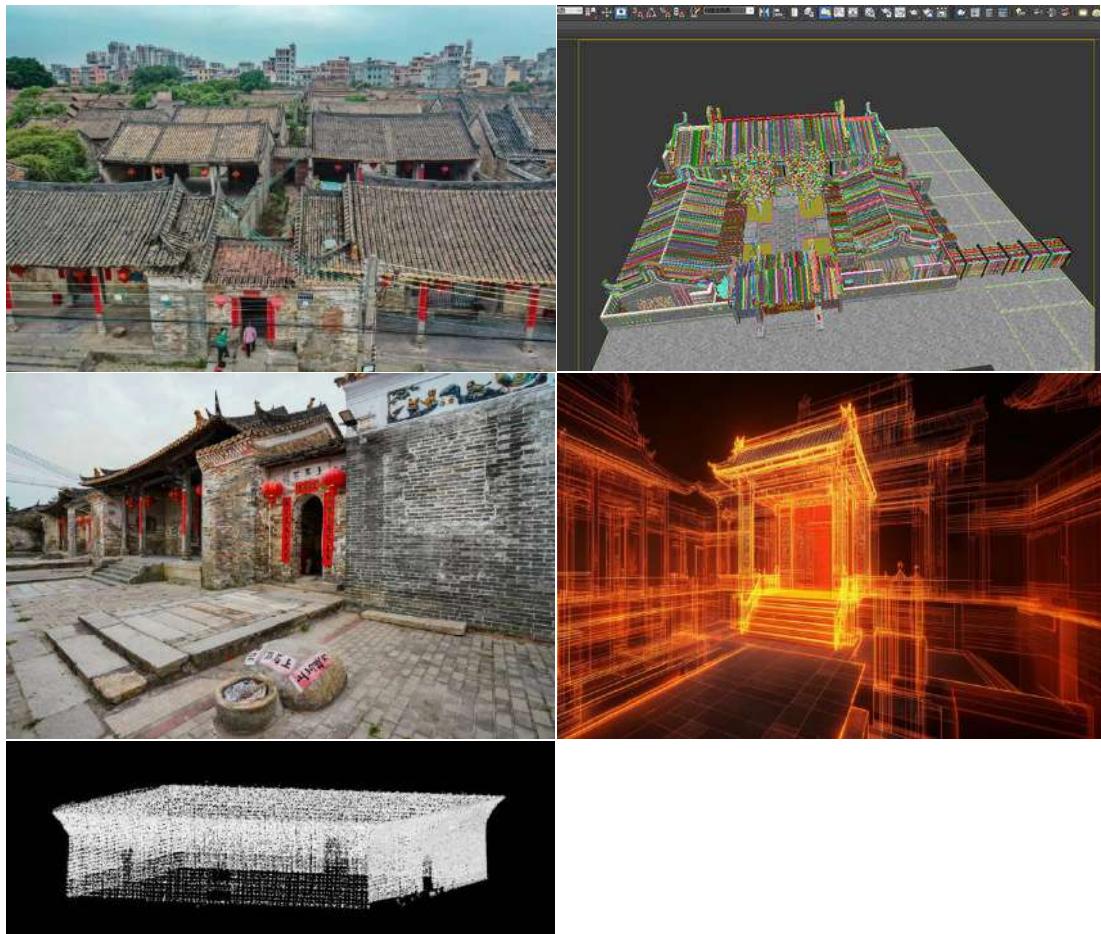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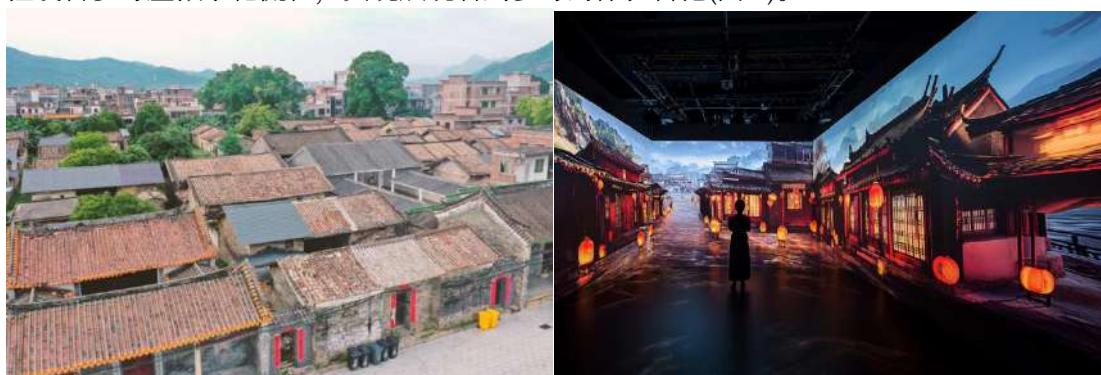


图2 数字化建模过程

3.2 人工智能辅助生成与沉浸式场景构建

设计过程引入人工智能辅助生成技术。使用 MidJourney 等工具生成初步设计方案，结合建筑历史信息与文化语义进行风格校验，形成符合岭南建筑特征的视觉方案。在虚幻引擎中完成场景搭建与交互设计，植入多感官元素(光影变化、环境音效、触觉反馈)，构建沉浸式体验环境。以祠堂祭祀场景为例，通过动态光影模拟时间推移，配合礼乐音效还原仪式氛围，用户可通过触控设备参与虚拟祭祀流程，实现从观看到参与的体验转化(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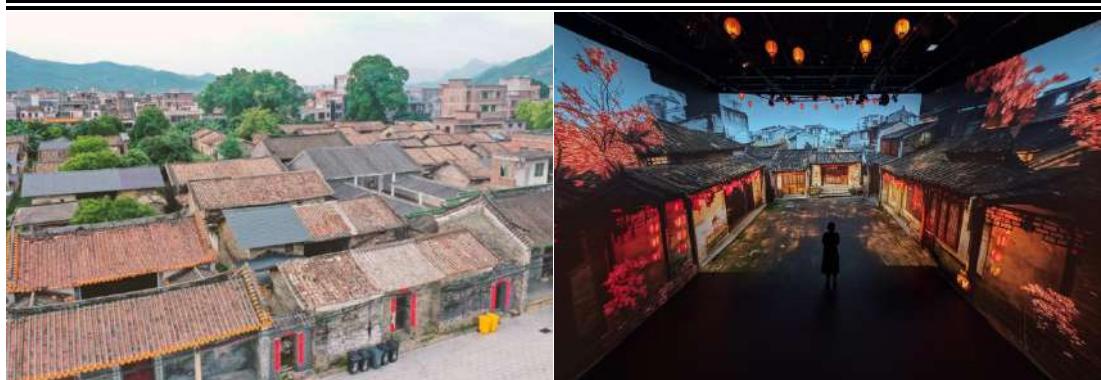


图 3 Cinema 4D 建模渲染效果图

3.3 混合现实整合与个性化体验实现

技术实施中整合混合现实(MR)技术，在实体建筑空间中叠加虚拟内容。用户佩戴 MR 设备进入祖屋时，可见虚拟家具陈设、历史人物影像等数字内容与真实空间叠合，形成“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空间体验^[9]。系统后台接入情感计算模块，通过识别用户面部表情与停留时长等行为数据，动态调整内容呈现节奏与互动难度，实现个性化体验路径(图 4)。



表 4 UC 系统虚拟沉浸式场景图

整个技术路径体现了从物质形态采集、数字模型重建、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沉浸式场景构建到用户体验反馈的完整闭环，其中人机协同体现在：人工负责文化语义的解读与设计意图的确立，人工智能负责视觉方案的快速生成与用户数据的实时分析，两者协同完成文化符号向数字内容的转化过程。

3.4 知识生产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重返凤院”项目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内容生成与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建立了动态的知识生产机制。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文化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原来的传统古村落文化知识生产依赖专家撰写的学术论文、地方志书与导览手册，以线性文本形式呈现，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而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文化内容的提取与重组。MidJourney 根据建筑历史资料生成视觉方案时，实际上完成了对文献信息的图像化转译，将文字记载转化为可视化的空间形态，而情感计算模块通过分析用户在不同场景的停留时长与情绪反馈，识别出哪些文化元素更能引起共鸣，这些数据反馈至内容生产环节，有机会形成从用户反馈到内容优化的循环机制。此外，用户在体验过程中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的图片、视频与文字评论，构成新的文化阐释文本，实现了从专家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的知识生产转型。

3.5 文化记忆建构的重塑

“重返凤院”项目通过虚拟现实、虚幻引擎等沉浸式媒介通过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传统文化记忆依托祠堂、祖屋等实体空间与祭祖、节庆等定期仪式维系，记忆传承受时空限制，参与主体主要为宗族成员。而项目以“场景化重现”^[10]作为影像基础，体验者在祖屋中通过虚拟现实设备看到的虚拟家具陈设、人物影像，是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史料的数字重建，这种重建过程本身即

是对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再现；另外，项目以“村民人生历程”为叙事主线，强化了日常生活记忆而非宏大历史叙事，这种叙事策略改变了传统文化记忆以精英人物与重大事件为中心的建构模式。

3.6 观众参与模式的革新

数字技术革新了体验者与文化遗产的互动模式，在传统文化展示中，观众作为被动接受者，与展示内容之间存在明确的主客体界限，而在数字化时代中，体验者从被动接受，到内容消费，再到内容共创^[11]。“重返凤院”项目通过多层次互动设计实现了这一转变(图 5)：通过物理、认知、情感、社交四个层面的互动设计，推动观众角色的三阶段转变：第一阶段，通过触控设备与体感识别实现具身参与，观众从旁观者转变为仪式参与者，成为内容消费者；第二阶段，通过解谜机制与非线性叙事实现主动学习，用户自主选择体验路径，进行个性化的文化解读；第三阶段，通过情感计算实现情感共鸣，并借助社交媒体分享形成二次传播；用户在线上社群中交流讨论，成为内容共创者。



图 5 观众参与模式的多层次互动模图

4 结语

本研究以凤院古村“广客融合”文化为核心，依托符号学语形、语义、语用三维框架解析建筑符号体系，结合点云扫描、人工智能、混合现实等技术构建“重返凤院”沉浸式项目，既验证了符号学对文化数字转化的指导价值，也革新了文化知识生产、记忆建构与观众参与模式。但研究仍存在局限：设计聚焦人生仪式与生活场景表层还原，未深入挖掘文化符号背后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等深层逻辑，部分文化元素仅停留在视觉符号层面，缺乏历史语境与当代价值的关联阐释。后续需加强与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协作，引入口述史、田野调查，丰富村民史料与地方记忆，提升文化内容的真实性与厚度，为古村落数字活化提供更完善的范式。

参考文献：

- [1] 陆鼎元.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2] 曾令泰. 广州从化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政府职能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8.
- [3] 张莎玮. 广府地区传统村落空间模式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8.
- [4] 张良林. 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2
- [5] 赖瑛. 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祠堂建筑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0.

[6] 汤国华. 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7] 埃科, 翁贝托. 符号学理论[M]. 王天清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8]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9] He Z , Wu L , Li X R. When art meets tech: The role of augmented reality in enhancing museum experiences and purchase inten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8(OCT.): 127-139.

[10] Blanco-Pons S ,Carrión-Ruiz, Berta,Luis Lerma, José,et 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augmented reality application for rock art visualization in Cova dels Cavalls (Spain)[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9.

[11] Carrozzino M , Bergamasco M .Beyond virtual museums: Experiencing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in real museums[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0, 11(4): 452-458.

试论观者——AI 时代架上艺术洞见

刘青云^{1*}

(¹ 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 上海市 静安区 200040)

摘要: 在当下, 架上艺术或者说绘画, 即艺术家所创作的图像较于广泛使用的算法生成图像, 会面临许多存在相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关乎图像这一概念本身, 也引发了对于一个问题的思考: 一幅架上艺术作品为谁而作——艺术家还是观者? 思考这个问题需要回过神来, 短暂地跳出信息爆炸、科技腾飞带来的感慨, 试问架上艺术的历史: 架上艺术如何存在? 本文以“观者”为核心, 结合“观者转向”理论与神经风格迁移(NST)技术案例, 分析AI生成图像对架上艺术的双重挑战——创作者身份模糊削弱观者审美共鸣, 媒介差异导致艺术价值认知分歧; 最终提出: AI时代架上艺术需回归“媒介温度”与“独创性表达”, 以“非商品属性”重构存在价值。

关键词: 架上艺术; 神经风格迁移; 艺术价值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32>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Viewer: Insights into Easel Painting in the AI Era

Liu Qingyun^{1*}

(¹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 Jing' an,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era, easel painting—or more broadly, painting as the artist's creation of images—faces a number of existential challenges when compared with algorithm-generated imagery. These challenges concern the very concept of the image itself and provoke a crucial question: for whom is an easel painting created—the artist or the viewer? To explore this question requires stepping momentarily outside the astonishment brought by the explo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reflecting on the history of easel painting: how does it exist? Focusing on the notion of the “viewer,”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theory of the “viewer’s turn” and examples of Neural Style Transfer (NST) to analyze the dual challenges AI-generated images pose to easel painting—namely, the blurring of the creator’s identity that weakens the viewer’s aesthetic resonance, and the medium differences that lead to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artistic value. Ultimately, it proposes that in the AI era, easel painting must return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medium” and “original expression,” reconstructing its value through its “non-commodity attributes.”

Keywords: Easel painting; Neural Style Transfer; Artistic value

1 引言

陈平的《论观者转向》一文中, 总结了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种艺术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称其为“观者转向”^[1], 文中概括总结了李格尔(Alois Riegl)、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宾斯托克(Cf. Benjamin Binstock)、弗雷德(Michael Fried)等人的递进认知, 即将艺术

作者简介: 刘青云(2000-), 男, 内蒙古鄂尔多斯, 硕士, 研究方向: 艺术管理

通讯作者: 刘青云, 通讯邮箱: liuqingyun2000@foxmail.com

史的研究如何由研究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主体地位转向研究艺术作品—观者之间的关系。在此需要提及此种转变的前提，在李格尔为肇始的半世纪内、即现代绘画艺术发展后，因其高度的主观性、对于“再现”的摈弃，使得现代绘画艺术需要不同于传统艺术史的批评欣赏方式，接受美学的发展也在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文末，陈平总结，通过上述等学者的研究，现在拥有多维含义的“观者”概念，观者的存在之于架上艺术，是从未分离、亦必须重视的部分。

那么，借巴尔与布列森（Mieke Bal and Norman Bryson）之言^[2]，将艺术作品的观者暂且划分为“理想性观者”与“经验性观者”，其中贡布里希著名的“图式与矫正”理论^[3]谈及的观者的“本分”，精准地指出了“理想性观者”的在艺术创造中的身份，同时指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总是要考虑到观者的“预期”和识别能力，即贡氏所说：“观看者以艺术家自居，必须有艺术家以观看者自居相对应”；而“经验性观者”作为另一种观者，是非给定的、更自然、无目的地看到艺术作品的、更为广大的一种观者。

以上，在谈论架上艺术时，“观者”作为创作的永恒要素，可以作为思考AI时代架上艺术何在的一个锚点，将各色的架上艺术回归到接受环节的必然性上。在绘画创作多数发生于各类学院为中心的现在，一位学院生、艺术家，其受到的艺术批评多数来自前文提及的“理想性观者”，即环境中的师长、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贡氏所言的“观看者”与“艺术家”之间理想的互动也因身份的高度相似，沉默地消融了。从历史经验看：学院中的艺术家无需顾及观者的接受能力、学院中的观者也娴熟地泛化、经验化了各色艺术家的主观表达，如此往复、妄论有所进益，这也是历史中各类学院派艺术的积弊。

2 AI 生成图像的创作者身份困境：基于 NST 技术的分析

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各类图像的行为，乍看跳脱了作品—观者之间的陈腐关系，使得图像的生产者与使用者在强力工具的辅助下得到了统一。但需要明晰“工具使用者”与“图像创作者”指尖的艺术伦理关系，同时需要审视传统架上艺术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艺术价值是否存在差异。以下就此两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如何定义在使用人工智能程序生成图像时的创作者身份从属？跳过如何训练程序的赘述，一个成熟的程序是如何生产内容的，以下将 NST 技术（Neural Style Transfer，以下简称 NST）技术作为试论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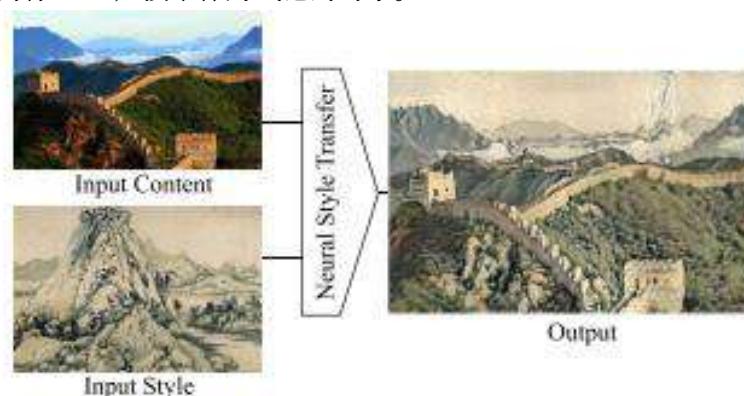


Fig. 1. Example of NST algorithm to transfer the style of a Chinese painting onto a given photograph. The style image is named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by Gongwang Huang.

图1 NST 技术示意图

图源 Neural Style Transfer: A Review IEEE 可视化和计算机图形学交易

上图展示了NST技术如何提取黄公望《千里江山图》的艺术风格，并将其迁移到一张以长城风景为内容的摄影作品上，生成具有独特艺术肌理^[4]的图像。那么面对这幅“万里长城图”，创作者的身份从属于内容生成中的哪个角色？程序使用者、黄公望亦或是能力强大的NST程序？

讨论创作者的身份从属，需要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何在。《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的伦理反思——以AI绘画为例》一文中，作者就文中第二章“AI绘画的四重伦理问题”中“艺术伦理”一节，简明扼要地指出针对图像生成程序使用者，如果以传统艺术创作的路径：“艺术体验

—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来思考，程序使用者显然没有独立的艺术体验与技术上的创作参与^[5]。同样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探讨》一文中，作者论及了“菲林案”与“腾讯案”^[6]在司法过程中的法院判定标准，即“当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客观表现形式符合最低限度的差异性要求，并且人工智能生成物来源于人的创作行为，能够体现人的个性与创作意图时，法院才能认定其构成独创性的作品。”这两篇文章看似相左的观点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界限：人工智能生成物同其他自然物一样，独创性、也就是可版权性的确立需要创作者足够的独创性构思和创作前劳动投入。

创作者的身份从属对观者而言是否重要？观者作为艺术接受环节的参与者，都需有能力考校一幅作品的独创性、需要同时认识到独创性是艺术活动的动因和目的，是始与末的两端。贡氏所言观者的“本分”在面对人工智能程序生成物时依然，作为观者需要认识到自己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所占据的份额，如若创作者的形象在观看作品时十分模糊，那么观者无法体会到与创作者产生共鸣时的艺术体验，也就无法获得审美快感。创作者身份的模糊会使得观者的艺术体验变成一场荒诞的、无始无终的滑稽移情，恰如班克斯（Banksy）的《气球女孩》（Girl with Balloon）及其后续自毁事件，当观众在没有创作者形象的迷雾中追逐意义时，艺术体验不再是与创作者的共鸣，而是一场充满荒诞感的自我投射游戏。因此，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程序的发展，艺术创作活动的多样化强调了观者“本分”中以往并不常提及的一点——观者需要能够具体化人工智能生成物中的个性、独创性。观者同样与艺术家、创作者一样面对着人工智能生成程序带来的新挑战，观者亦会品尝到AI时代的某种无奈：即使作品尽收眼底，也要足够相信这幅作品是没有独创性、甚至作者的。

3 传统架上艺术与 AI 生成图像的艺术价值差异：媒介属性的视角

如何审视传统架上艺术与AI生成图像的艺术价值差异？这个问题其实在上述部分已经得到了论述。艺术价值来自于艺术接受环节的完成，观者作为接受方在观看时，能否从作品中得到独特的艺术体验决定了艺术接受环节是否能够完成。一幅传统架上艺术作品，在艺术接受的环节，需要接受观者的批评，但从材料主义的观点出发，传统绘画相较于AI生成图像，在媒介上更符合观者的心理惯势：笔触、线条组成了某种属于传统架上艺术的“温度”，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通过改良古老的蛋彩画法，结合干画法使得画面具有某种独特的肌理^[7]，在形式之外使得作品拥有了独特的语言魅力，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现实主义的绘画创作。

相对地，依然以图1生成得到的“万里长城图”为例，观者在观看时，是否能够与图像创作者主观的艺术体验产生共鸣？元人张雨题黄公望画就有“峰峦浑厚，草木华滋”之语，受明代董其昌叹赏^[8]，那么能否从迁移得来的大痴笔墨中体会如此的语言魅力？这两个问题直观地指向AI生成图像的艺术价值，但现在的人工智能程序无法做出回答，原因如下。

4 结语：AI 成像技术的局限与架上艺术的未来路径

以NST技术为例，人工智能程序成像的质量完全受制于程序的发展与客观媒介的有限性，局限性使其并不能完全代表人工智能程序成像的最终与最高能力，通过莱昂（Leon A. Gatys）等人的实验^[9]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到这种局限：每一次对于神经风格的捕捉与迁移其实都是对原图像RGB像素的一次统筹与复制。这个过程无可避免地会降低生成图像的像素颗粒数，使得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在观者看来较传统架上艺术作品粗糙了许多，如“万里长城图”不得大痴笔墨神韵一般无法在艺术语言上为观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此种对于“细腻”的审美追求其实不仅是在现实主义的绘画之中，远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欧洲画家们就已经对画作的细腻程度提出过苛刻的要求，在现称为“矫饰主义”的艺术流派标准中，画作的每一道笔触都有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瓦萨里（Giorgio Vasari）就曾对罗马诺（Giulio Romano）的画作提出过批评，认为罗马诺的笔触中缺少“优雅”，让观者感受到画家在创作时的笨拙与过分的努力，因此虽在整体效果上具有美，可极细微处却体现不出艺术家应当具备的“天才”，即没有完美的“肌理”。可见对于一件造型艺术作品，艺术价值的评判是不是对于主题、内容的过分关注，形式和语言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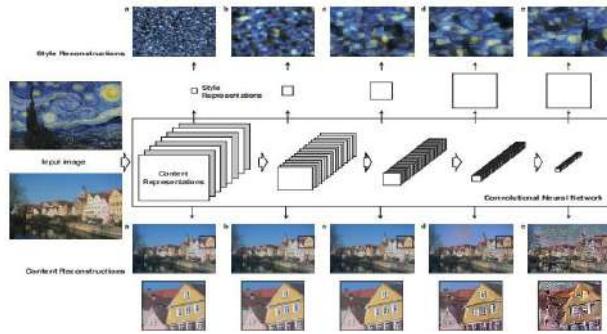


图2 莱昂等人在实验中发现在使用NST成像技术时反复叠加底片后较高图层出现明显的模糊离散
图源 Image Style Transfer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但数字成像技术在语言上的局限是可以被突破的，正如现今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例如下图《神奈川冲浪》的肌理捕捉实验，未来NST技术通过更为精准的肌理捕捉、更高分辨率的显像方式，技术上有望以极高的完成度生成具有葛饰北斋艺术风格的、高分辨率、具有艺术语言魅力的AI生成图像。反观现在所谈论的“AI生成图像”，所面临的最大难关即显示器与画布的材料性差异，当计算机分配的像素颗粒精细度堪匹配画家们研磨调和的色粉，架上艺术的语言美感也将受到冲击。届时，传统架上艺术较人工智能生成所不能及的艺术生产效率、物质媒介的泛用性、传播的广度与宽度等等，都将使架上艺术从本质上不得不追本溯源、另开他山，皆因AI时代架上艺术面对的不仅仅是市场份额、传播方式等俗浅的问题，架上艺术的发展不应被商品属性所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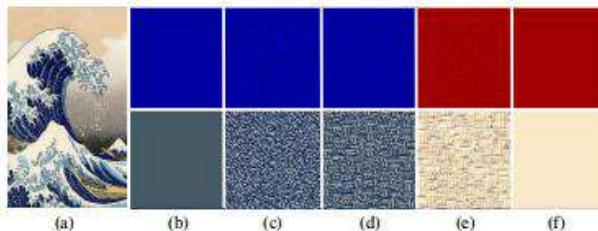


Figure 7. Stylization result of a toy image, which consists of four parts of different color or different texture.

图3 莱昂等人更为精细的肌理捕捉实验
图源 Image Style Transfer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参考文献：

- [1] 陈平. 论观者转向: 李格尔与当代西方艺术史学中的观者问题[J]. 文艺研究, 2021, (05): 5-20.
- [2] Bal M, Bryson N. Semiotics and art history[J]. The art bulletin, 1991, 73(2): 174-208.
- [3] 穆宝清. 贡布里希图像阐释的理论与方法[J]. 学习与探索, 2014, (02): 135-139.
- [4] 张富利. 新技术与美学的互生之旅: 人工智能艺术何以可能?[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5(01): 46-60.
- [5] 戴宏朵. 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的伦理反思——以AI绘画为例[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10): 142-144.
- [6] 王涛.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探讨——以“菲林案”为例[J]. 出版广角, 2020, (07): 71-73.
- [7] 汤玛斯·霍文, 汪溪涓.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安德鲁·怀斯[J]. 中国艺术, 2012, (02): 66-81.
- [8] 姜郭霞. 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笔墨意境[J]. 艺术科技, 2015, 28(11): 120.
- [9] Gatys L A, Ecker A S, Bethge M. Image Style Transfer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IEEE, 2016.
- [10] Jing Y, Yang Y, Feng Z, et al. Neural Style Transfer: A Review[J]. IEEE Trans Vis Comput Graph,

2020(11).

- [11] 李天. AIGC 介入影视艺术——从“生成”概念谈起 [J]. 电影新作, 2024, (03): 20-27.
- [12] 陈抱阳. 从生成式到多智能体的转向的人工智能艺术创作 [J]. 美术研究, 2023, (05): 109-113.
- [13] 王常圣.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图像艺术创作: 方法与案例分析 [J].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报, 2023, 5 (03): 406-414.
- [14] 刘雅典. 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形式与情感关系辨 [J]. 文艺争鸣, 2023, (07): 77-85.
- [15] 刘偲佳. 从算法到图像——AI 生成艺术的回顾与展望 [J]. 艺术市场, 2023, (06): 80-81.
- [16] 陶锋. 人工智能美学如何可能[J]. 文艺争鸣, 2018, (05): 78-85.
- [17] 范慧敏.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哲学研究[D].天津: 天津大学, 2019.

算法黑箱与艺术创作主体性的嬗变：消解、重构与路径探索

兰正焱^{1*}

(¹ 天津美术学院 油画系, 天津市 河北区 300141)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绘画实践中的不断深入，其运作机制造成的“算法黑箱”正深刻影响艺术创作主体性的内涵与边界。立足于“算法黑箱”与艺术创作主体性的关联，梳理其在创作过程中对主体性的消解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技术嵌入语境下主体性重构的可行路径。通过深化对技术运行逻辑的理解、推动跨学科教育以及更新理论批评框架，艺术创作主体性在新的技术语境中仍有望获得重塑与发展。

关键词：算法黑箱；艺术创作；主体性；AI 绘画

DOI：<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46>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gorithmic Black Box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Artistic Creation: Dissolution, Reconstruct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Lan Zhengyan^{1*}

(¹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School of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Oil Painting, Tianjin, Hebei, 3001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painting practice, the "algorithmic black box" caused by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connotation and boundar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rtistic creation.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lgorithmic black box"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artistic cre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echanism of its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feasible path of subjectivity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y embedding. 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echnology,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nd updating the theoretical criticism framework, the subjectivity of artistic creation is still expected to be reshaped and developed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context.

Keywords: Algorithm black box; Artistic creation; Subjectivity; AI painting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蓬勃发展，非常迅速地介入到了艺术实践，特别是在绘画领域引发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深度学习阶段后，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与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等算法逐渐主导创作逻辑的重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直接介入图像的生成与风格迁移。诸如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ChatGPT 5、豆包、即梦 AI 等文生图、图生图的 AI 绘画平台，在突破传统媒介边界与创作流

作者简介：兰正焱（1998-），男，福建宁德，硕士，研究方向：当代绘画研究

通讯作者：兰正焱，通讯邮箱：uncle-lan@foxmail.com

程的同时，也使非绘画背景的用户能够生产具象、复杂且风格多元的视觉作品，从而在当代艺术生态中引入了新的审美动力与文化变量。

然而，在技术赋能创作的同时，伴随而来的“算法黑箱”问题亦逐步浮现。算法在运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透明性，常常使得创作者面对结果时感到陌生、困惑亦或者惊喜。在使用上述的AI绘画平台生成图像时，有时会出现一些不符合预期的细节，如人物手指的增加或缺失、物体的错位、比例的失调等，而艺术家却难以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源。这种不透明性不仅影响了艺术家对创作过程的掌控，也对艺术创作的主体性构成了潜在威胁。正是这种“技术难以解释其自身”的黑箱性，削弱了艺术家对作品的整体控制感与创作主权。更进一步地，当算法不仅参与图像呈现、甚至开始介入审美风格、情绪表达乃至叙事建构时，艺术家的主体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 算法黑箱的理论基础与主体性挑战

1.1 算法黑箱的概念与特征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作为一种隐喻，它指的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不能打开、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的系统^[1]。人工智能所依赖的深度学习技术就是一个“黑箱”。深度学习是由计算机直接从事物原始特征出发，自动学习和生成高级的认知结果。在人工智能系统输入的数据和其输出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人们无法洞悉的“隐层”，这就是“算法黑箱”^[2]。在实际应用中，尤其是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算法，其决策路径往往由庞大且非线性结构的神经网络构成，即便是开发者本身，也难以精确追踪算法如何得出某一具体结果。

在艺术创作中，这一特征的影响需要置于更复杂的创作语境中审视。当用户输入同样一段指令——“月光下湖畔、克劳德·莫奈风格、月夜、湖泊、睡莲、柳树、灯笼、倒影、宁静、自然风光。”作为关键词，不同的AI绘画平台生成的内容不一样，同一AI绘画平台不同时间生成的图像内容也不一样。以豆包为例，两次指令输入后，生成的图像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图1图2）：灯笼的位置、画面的氛围、画面的笔触等。虽然豆包会告知用户采用哪种风格来生成图像，但用户无法获知是在怎样的计算逻辑下生成了特定的笔触与光影关系。依据同样的风格指令，用户依旧难以明确获知算法究竟依据了多少量的视觉风格图式。这种生成逻辑的封闭性，使得艺术家对细节的调整往往停留在“结果修正”而非“逻辑干预”层面。虽然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工具虽支持局部修改，但修改的效果仍依赖算法对“修正指令”的解读，而非艺术家对生成机制的直接掌控。但AI绘画的意外根植于“算法黑箱”的内部逻辑：算法对关键词的解读、图像元素的调取、风格参数的权重分配等过程均不透明，即便是同一组关键词，每次生成的结果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图1 由豆包生成（图片由作者输入指令）



图2 由豆包生成（图片由作者输入指令）

这种不可预测性使“震惊”不仅发生在观者层面，更延伸至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家自身。当笔者在 Midjourney 用 blend 令混合少数民族形象与星光点点的抽象画时（图 3），Midjourney 在背景处理中混入条状亮线与一种迷幻的色调。艺术家虽然手握指令却无法预判结果，这种“失控感”会颠覆艺术家对创作的主导认知。而当这种意外结果呈现出某种隐秘的视觉和谐时，艺术家与观者会同时陷入对意义来源的追问：这究竟是算法的误读，还是人类未察觉的潜在审美逻辑？这种对创作主体性的怀疑与对图像意义的迷茫，构成了创作与接受环节的双重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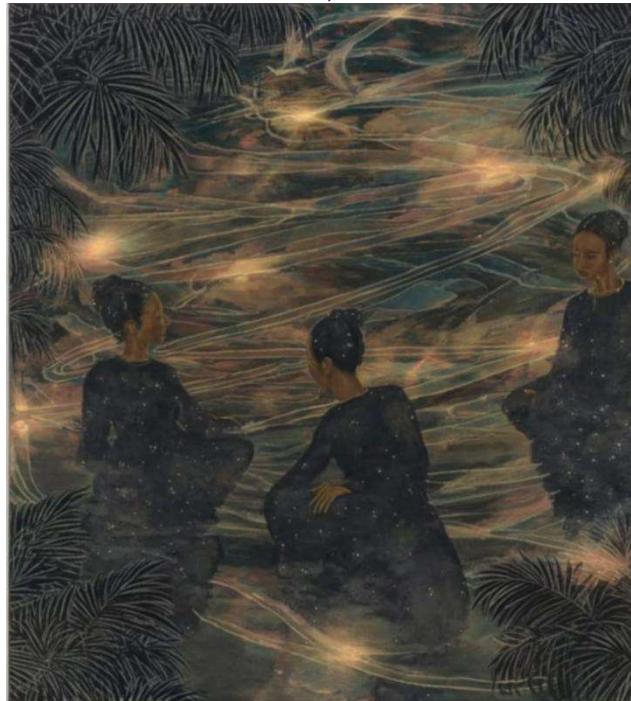


图 3 由 Midjourney 生成（图片由作者输入指令）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不完全控制”必然是创作的阻碍。事实上，当代艺术创作中，对创作的完全掌控本就不是绝对的追求。许多艺术家恰恰依赖创作过程中的意外与偶发——可能是油画颜料抹去重来中的意外肌理，可能是水墨在宣纸上的洇湿渗透，或是即兴行为中突如其来的灵感迸发。这些非预设的瞬间，往往成为作品突破常规的契机。区别在于，传统创作中的意外源于材料特性、环境因素或身体直觉，艺术家可通过长期实践积累对其的感知与引导能力，而 AI 生成的意外，源于“算法黑箱”的内部逻辑，其规律更难被个体经验捕捉。这种差异并非削弱了艺术家的主体性，而是重塑了控制的内涵——从对创作过程的高度主导，转向对算法偶发结果的敏锐回应与创造性转化。艺术家不再是全知全能的“掌控者”，而更像是与算法共同探索未知的“协作者”，在可控与不可控的张力中寻找新的表达可能。

更进一步，复杂性是加剧“算法黑箱”的重要诱因。当今的图像生成系统往往结合多种算法模块，如风格迁移、语义分割、深度渲染等，每一环节的算法都有其独立的逻辑参数与运行方式，彼此嵌套构成一个高维度的决策系统。即便最终图像效果可观，但一旦生成结果偏离创作预期，艺术家往往难以确切定位问题环节，也缺乏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调试与修正。正是这种技术层面的不可逆性，使得艺术创作的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算法驱动下的输出行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意图—行动—作品”三位一体的表达过程。

1.2 算法介入下的艺术创作主体性变化

艺术创作主体性，通常被理解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内容、风格与形式的主导权，是其思想意志、情感经验与美学判断的集中体现。在 AI 技术不断渗透的语境下，“算法黑箱”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深刻地介入到艺术家的表达逻辑与身份认同之中，从而对主体性的建构路径产生多重影响。

一方面，算法为艺术创作带来了便捷的方案可视化与拓展性空间，使得艺术家可以借助其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图像生成能力实现创意跃迁与效率提升。艺术家可以通过输入概念关键词，迅速获得视觉草图或不同风格的图像变体，从而在灵感生成阶段获得助力。

但另一方面，这种便捷性的背后也隐藏着控制感的悄然转移。在创作过程中，算法常常以看似中立的“建议者”角色介入，实际上却以其隐藏的训练偏好与风格导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的选择与判断。当 AI 频繁推荐某种构图方式或配色倾向时，艺术家可能在不自觉中放弃了原有的风格探索，而趋向算法推荐的最优解，从而使创作的独特性与个体化表达被淡化。

更关键的是，算法的不透明性使艺术家难以复原创作的过程链条，即无法解释某一风格为何被强化、某一结构为何被重复。这种对创作逻辑的失忆，使得艺术作品的作者身份面临模糊，主体性呈现出退化或转移的趋势。由此可见，“算法黑箱”不仅削弱了艺术家的技艺实践与情感注入，还在更深层次上撼动了艺术主体性的哲学基础。

2 算法黑箱对艺术创作主体性的消解

2.1 创作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动摇

在传统绘画语境中，艺术家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更是创作系统中的绝对中心。从初始构思到技法执行，从构成规划到情绪传达，每一道程序都体现了艺术家鲜明的个体意识与主观判断。譬如达·芬奇在构思《最后的晚餐》时，反复推敲人物动态与构图节奏，既调度宗教叙事的神圣意味，也精准捕捉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张力，这一过程本身即是艺术家主体性的有力展现。然而，在算法的介入下，艺术家日益转变为算法指令的操控者，创作流程也由“动手操作”向“语言调度”迁移。以 Midjourney 与 Stable Diffusion 等平台为例，艺术家通过输入文本提示指令，向系统传达创作意图，算法则自动执行图像生成。创作的主导权在表面上仍掌握在艺术家手中，实则在不断让渡给算法背后的训练模型与参数调控。

更为微妙的是，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身份发生了双重转变：一方面成为“指令的召唤者”，即通过调整语义来间接掌控图像输出；另一方面则沦为“结果的挑选者”，其创作任务日益转化为从算法输出的多个结果中筛选最符合期待的版本。“算法黑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被动性——即便艺术家反复尝试调整文本描述，仍无法确切控制图像构成逻辑及细节演绎方式。这种不确定性使创作过程变得碎片化与去个体化，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技—情—思”统一体遭到瓦解。

2.2 创作思维与审美体验的异化

传统绘画所依托的是自由联想与多元感知路径，艺术家可在灵感与经验之间游走，从微妙的色彩情绪中寻找独特的表达张力。因此，是否具有独特的观察能力与强烈的艺术直觉感受能力，直接表现出艺术家的艺术素质的高低、深浅^[3]。然而，AI 绘画平台往往嵌套了固定的训练模型与数据导向，它所学习的并非艺术家的个人经验，而是统计意义上高频出现的成功范式。艺术家在操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由算法推荐、模板调用与风格引导组成的技术脚本中，原本开放的创作思维逐渐内化为参数调整与风格选择的机械程序。艺术家若对生成结果产生依赖，可能会逐步放弃原本实验性较强的创作路径，从而陷入审美惯性。从自由演绎到模式遵循的转变，显然不只是媒介变化，更关涉到思维方式的异化与创作自由的潜在萎缩。

更为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观众的审美接受层面。传统绘画作品往往承载艺术家复杂的情感流动与生命体验，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以感知作品背后的温度与叙事。如果当观者面对一幅极具感染力的 AI 绘画时，首先会陷入身份确认的焦虑：这幅作品的情感表达来自艺术家的指令，还是算法对训练数据中情感符号的学习模仿？当得知某幅为人称道的画作实则由算法生成，且未经过人类的二次修改时，其对艺术情感真实性的认知会遭受强烈冲击——究竟是在欣赏艺术，还是误读算法的数据拼接？这种对创作主体性、情感真实性的身份悬置，构成了认知层面的深层震惊，迫使人们重新定义艺术创作的本质。并且，如果长此以往依赖于算法生成的大众偏好，导致作品风格与题材愈发同质化。观众长期接触此类作品后，审美感知可能变得迟钝，对艺术的理解与期待也会逐渐趋向公式化和消费化，从而形成算法审美惯性。这种机制对艺术多样性、批判性及精神探索性均构成潜在的压迫。

2.3 艺术作品原创性与个性的模糊

算法的介入使得艺术作品原创性的判断变得异常复杂，这一问题在 AI 生成绘画作品的版权纠纷与艺术评审实践中均有突出体现。以美国艺术家 Jason Allen 的作品《太空歌剧院》为例，

该作品在 2022 年 8 月斩获了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艺术博览会的数字艺术类别冠军，但他的这件作品仍因 AI 成分占比较多而被版权局三次驳回版权申请，因其创作依赖 AI 绘画平台 Midjourney 而引发巨大争议。4 传统版权观念要求原创性来源于作者的独立创作与智力成果，而 AI 绘画的生成过程依赖算法对海量训练数据的分析与重组，这使得作品的原创性难以明晰界定。Jason Allen 虽通过文本提示前后用提示词与 AI 进行了 624 轮的交互引导生成，但算法所学习的素材涵盖大量既有艺术作品，这种“依托既有语料生成”的方式，使得该作的原创属性存在争议。

在国内，类似现象同样频繁出现。2023 年 2 月李某的一件基于 Stable Diffusion 生成一张古装少女的图片，并将该图以《春风送来了温柔》为名在小红书等平台进行了发布。不久之后，原告发现百度百家号“我是云开日出”在其 2023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文章《三月的爱情，在桃花里》中使用了自己先前生成的图片作为插图，并且去除了该图片原有的水印。随后，原告以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百家号这位作者刘某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 5000 元^[4]。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AI 绘画在高规格展览中的渗透已不仅限于个案。近年来，部分参展者专门学习或购买符合国展主题与技法要求的 AI 图像生成方案，甚至出现了面向“AI 参展创作”的培训课程与代创服务。这些作品在视觉效果、技法细节乃至题材设定上高度贴合评审偏好，但其生成路径往往是通过反复调用成熟模型与既有素材库的最佳组合而得，并非艺术家长期积累的风格化探索。当此类“技术适配型”作品在展览中大量出现，评选所依托的创作标准便被算法逻辑所反向塑造，展览的文化价值和甄别意义也随之被削弱，甚至出现审美趋同化与主题程式化的畸形倾向。

从技术角度来看，AI 作品大多建立在对海量既有艺术作品的深度学习之上，其生成结果不可避免地在构图逻辑、色彩体系与笔触语言上保留原始素材的痕迹。这种基于既有材料再加工的创作模式，很容易沦为视觉拼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突变与风格突破。在这种背景下，艺术家的身份正被重构为策划者而非制造者，其作品的独立原创性愈发模糊。更为严峻的是，若是长期依赖算法生成的艺术家，可能逐渐丧失对自我风格的主动建构与反思能力。在生成效率、市场反馈与视觉吸引力的共同驱动下，创作者容易迎合算法与市场的双重偏好，最终导致个性表达的弱化与艺术风格的标准化。一旦创作沦为对系统成功路径的重复调用，艺术便失去了其作为人类精神自觉实践的根本价值。

3 算法黑箱下艺术创作主体性的重构

3.1 新创作模式下主体身份的重塑

尽管“算法黑箱”对艺术创作主体性构成了多重挑战，但在人机协作加速演进的技术语境中，艺术家的身份也在经历新一轮的结构性重塑。不论是 AI 辅助绘画还是直接参与创作，这类新型创作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艺施行者”，而逐渐转化为技术与表达之间的“协调中枢”与“算法编排者”。他们不仅要理解并驾驭算法生成平台，更需要将个人美学意图转译为可被算法识别与响应的语言输入，从而在不可见的“算法黑箱”中重建创作主权。

这类新型艺术家需具备跨界整合能力，既理解如 GAN、Diffusion Models 等图像生成算法的运行机制，又能灵活运用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等工具进行图像处理与风格调和，还要有架上绘画材料使用的技法基础。他们通过文本提示、参数控制与迭代反馈，间接建构作品视觉形态，实现从“技术使用者”向“人机共创者”的转型。

在创作流程中，艺术家对算法输出的介入与审美判断至关重要。他们往往将创意与创作相分离，艺术家可以从人工智能的生成作品中找寻灵感与思路^[5]，进而通过删改、重构与再表达等方式完成个性化转化。比如在生成图 3 后，若对画面整体氛围不满意，可通过对色彩饱和度与细节结构的手动修饰，赋予图像独特的气质与叙事张力。这种基于算法结果的再主观化过程，正是新型主体性建构的重要体现。

因此，艺术家的主导权虽从直接绘制转移至语义调度与算法协商，但并未消解，而是在算法框架内实现了一种“嵌入式自我表达”与“操控中的生成性实践”。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艺术家的角色身份，也预示着未来艺术实践的部分内容或者门类或许将愈发依赖于人机协同的复合协作模式。

3.2 艺术作品原创性与个性的新诠释

在 AI 协同创作的现实中，“原创性”不再是纯粹的人类个体自发生成成果，而日益成为人机互动关系中的产物。这一转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原创性的边界、构成机制与伦理基础。无论是输入提示词、选择生成参数，还是对生成结果进行后期调整，个体始终在创作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6]。尽管算法主导了图像生成的物理执行环节，但创作者在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与干预仍是不可替代的创造行为。这类“共创式原创性”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创作，更强调创作机制中的交互性、调试性与过程复杂性。

在这一语境中，个性也从风格上的一致性转向干预路径上的独特性。艺术家不再追求作品在技法或题材上的统一标识，而倾向于通过个性化的文本提示设计、审美逻辑设定、结果调优方式体现自身意图。不同艺术家可能通过诗性叙述、环境细节描写、隐喻性意象等方式引导算法，进而生成结果中形成明显区分。这种对文本语义与图像生成之间关系的敏锐把控，正是新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因此，在算法环境下，原创性与个性不应再被视为零与一的判断命题，而应理解为“度”的问题，即在算法参与的框架内，艺术家如何实现创造性引导、个性化表达以及批判性自觉。这种“协同原创”模式，也为未来艺术理论与批评提供了新的评价维度与分析视角。

4 技术语境中的实践路径

4.1 培养适应时代的创作人才

面对 AI 技术对创作逻辑的深度介入，艺术教育的挑战已不仅是工具更新，更涉及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的重塑。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帮助学生理解技术的同时，保持他们的创作主观能动性与审美独立性？

在课程体系设置上，不必要求所有专业学生都精通 AI 技术，而应根据不同学院和学科方向进行差异化安排。例如，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艺术学院或交叉学科方向，可将机器学习原理、算法美学、生成艺术设计等课程列为专业必修，帮助学生在掌握技术逻辑的同时，探索创作中对算法的审美调度能力。对于以传统造型艺术为核心的学院，则可将 AI 技术纳入通识类或选修类课程，使学生在具备基本理解的前提下，有自主探索的空间。然而，这种模式的实施还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造型艺术学院中相当一部分教师并不具备 AI 相关知识与创作经验，导致课程落地困难。对此，教育体系需要同步推动教师能力的更新：一方面，可以通过跨院系合作与联合教学，将技术类课程由计算机或新媒体艺术方向的教师主讲；另一方面，应设立教师培训与进修计划，让传统艺术教师在掌握 AI 技术基础的同时，能将其与自身的艺术专业背景结合，形成跨领域的教学能力。

在这一基础上，课程内容也应重视“过程意识”的培养，不仅关注作品的视觉结果，更强调算法调试、输入设计、风格控制等环节中的创作判断。如此，学生才能在理解技术的同时，保持个人风格的建构与批判性思维，真正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融合，而不是被动依赖工具。

应鼓励学生将 AI 参与下的造型作品带入展览、学术汇报和校际交流中，并进行观众反馈分析与同伴互评，形成“创作—反馈—再创作”的动态循环机制。这种机制有助于打破“生成即完成”的被动依赖，强化作品背后的人类判断力与美学责任感。使新型造型艺术创作者既能在算法语境中保持独立审美，又能在技术驱动的艺术生态中持续塑造个人风格，从而推动艺术主体性的长远发展。

4.2 构建新的评价体系

当下，算法生成图像的迅速崛起，已促使传统的艺术批评体系出现结构性紧张。视觉作品的生成不再源于纯粹的技艺执行，而是建立在复杂的人机协作与语义调度之上，这要求艺术理论转向对生成逻辑与操作路径的深入理解。

与此同时，艺术批评的重心亦需随之转变。与其单纯评估作品的完成度或视觉冲击力，不如将关注焦点转向创作行为中的选择结构：艺术家是否主动调节提示语、是否对生成结果进行情绪介入或结构重构、是否展现出审美判断而非技术迎合？这些过程性判断正在成为衡量主体性的关键证据。

AI 艺术的创作规律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对大量 AI 艺术作品的分析，总结出算法艺术的创作规律和方法。研究算法在绘画创作中的应用模式，以及如何通过调整算法参数和输入信息，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探讨艺术家在人机协作创作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算法实现有机结合，创作出更具价值的艺术作品。通过对创作规律的研究，为艺术家提供创作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运用算法进行艺术创作，同时也为艺术教育提供教学参考，培养学生的算法艺术创作能力。

结合算法艺术特点，更新艺术批评标准是客观评价算法参与的艺术作品的关键。在传统艺术批评标准的基础上，应加入对算法独特性、人机互动创造性等方面的考量。如果一个 AI 艺术作品是基于独特的算法设计，并且在人机协作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那么它就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在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时，除了关注作品的审美价值、思想内涵等传统因素外，还应考虑算法在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人机互动所带来的创新和突破。如果一个 AI 艺术作品通过算法的运用，展现出了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并且在人机互动中传达出了思想情感或价值批判，那么它就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在评价 AI 艺术作品时，还应关注作品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尽管算法是一种技术工具，但 AI 艺术作品最终还是要传达人类的情感、思想和价值观。因此，艺术批评应注重作品是否蕴含着对人类生存状态、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关注和思考，是否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启迪。通过更新艺术批评标准，能够更全面、客观地评价算法参与的艺术作品，为 AI 艺术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导向，促进 AI 艺术的健康发展。

5 结语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艺术创作过程，艺术主体性也在悄然发生转变。“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自主性与复杂性，使艺术家的主导地位、个性表达与原创判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彻底消解，而是一种向“协作性操作者”与“策略性表达者”的迁移。艺术家通过算法调度、语义控制与创意再编辑，重构了自我在创作机制中的能动性与判断权。展望未来，随着生成模型规模的扩大与数据来源的多样化，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将更加紧密。

面对这一嬗变，艺术教育与理论批评体系应同步更新，以支持主体性在技术语境中的再生与延展。未来艺术实践的关键，不是回避技术参与，而是如何在人机协同中，持续保持人的判断、经验与情感的创造性表达。

参考文献：

- [1] 张淑玲. 破解黑箱：智媒时代的算法权力规制与透明实现机制[J]. 中国出版, 2018(7): 50.
- [2] 许可. 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与数据正义[N]. 社会科学报, 2018-3-29.
- [3] 王宏建. 艺术概论[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 [4] 陈永伟. “AI 文生图著作权第一案”引发的争议[N]. 经济观察报, 2023-12-11.
- [5] 杜雨, 张孜铭. AIGC: 智能创作时代[M]. 北京：中译出版社, 2023.
- [6] 杨红, 王萍舒. 人工智能生成艺术中的个人、集体与机器：伦理视角下的主体性探讨[J]. 艺术学研究, 2025(4): 73-8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的传统花鸟画创作转型

沈珺瑶^{1*}

(¹ 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与书法, 北京市 朝阳区 100103)

摘要: 近年间,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花鸟画带来了历史性契机与深刻挑战。借助类神经网络机制, AI不仅能够模仿古典笔墨范式, 更展现出全面且深入的风格凝练能力。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技术潮流, 传统国画创作者亟待重新审视自身角色, 使技术革新转化为风格演进的内生动力。本文以花鸟画为切入视角, 以生成式AI与传统笔墨艺术语言融合的潜在路径为问题, 探讨其路径与价值边界。

关键词: AIGC; 花鸟画; 人机协同; 艺术本体论; 技术伦理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3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Flower-and-Bird Painting Creation Unde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en Junyao^{1*}

(¹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alligraphy, Chaoyang, Beijing, 10010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brought historic opportunities and profound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flower-and-bird painting. By virtue of neural network-like mechanisms, AI can not only imitate classical brush and ink paradigms but also demonstrat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yle condensation capabilities. Faced with this irreversible technological tre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reators are urged to re-examine their own roles and transfor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stylistic evolution. Taking flower-and-bird painting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I and traditional brush-and-ink artistic language, exploring its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nd value boundaries.

Keywords: AIGC; Flower-and-Bird Painting;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rtistic Ontology; Technological Ethics

引言

当前, 我们正身处一场由人工智能引领的创造性变革之中。以深度学习系统为基础的生成式技术发展, 通过模拟人脑的认知路径, 从海量数据中归纳规律、习得知识, 并持续优化其输出模型。在此进程中, 原本粗率、漏洞百出的AI艺术, 迅速演变为在完成度、多样性及产出效率上均不容小觑的艺术途径, 并且其应用领域也已突破静态平面, 向动态影像全面拓展。对于传统花鸟画家而言, 生成式AI所代表的新质创造力已成为必须正视且利用的工具。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效的视觉生成能力, 对建立在个人心性修养与笔墨锤炼基础上的传统创作模式有着互为补充、

作者简介: 沈珺瑶 (2001-), 女, 研究方向: 写意花鸟画

通讯作者: 沈珺瑶, 通讯邮箱: moysyjy53@163.com

参照的作用。艺术家群体应如何理解并介入这一进程，成为关乎画种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

1 AI 生成技术的演进轨迹

生成式 AI 的运作，建立在预训练模型与大数据解析的基础之上，其核心在于实现跨媒介内容的智能合成。用户仅需提供简明的“提示词”，系统便能据此生成相应的图像、文本乃至音视频内容。在视觉艺术领域，这一生成逻辑主要体现为文生图、图生图与图生文三种交互形态。

生成式 AI 的艺术应用，经历了从粗糙到精密的快速迭代。早期以 GauGAN 为代表的平台，基于生成对抗网络（GAN）技术，实现了从语义到图像的初步转换，但其成果常面临输出不稳定与分辨率低的困境。随后，以扩散模型和自回归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算法，有效地攻克了这些技术瓶颈。当下主流平台如 DALL-E 3、Stable Diffusion 及 MidJourney，因其友好的交互界面与卓越的生成质量而被广泛应用。这些系统通过吸纳全球图像数据库的视觉养分，构建起一套模拟人类认知的学习与推理机制，并能将习得的“能力”迁移至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它们在处理非现实题材——如科幻与奇幻主题时尤显出色，能够快速为创作者提供高度风格化的视觉参考。

AI 技术带来的震撼，首先源于其令人目眩的发展节奏。从 GauGAN 面世至今不过五年，AI 艺术的质量已逼近专业水准，其形态也从静态图文延伸至动态影像。初代模型的输出常在透视、构图等基础造型层面显露缺陷，但更新的模型已能迅速完成自我修正。在短短数年间，AI 以其超常的学习进化能力与令人惊艳的艺术表达，重塑了公众的审美预期。其未来发展的终极形态，以及是否将部分取代艺术家的创造性职能，目前尚无定论。诚如学者所言，AI 生成内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稀释甚至扭曲人类独有的表达方式。AI 技术革新所裹挟的焦虑与振奋，正促使每一位艺术实践者寻求自身的回应策略。另一方面，AI 所复现的远非最终的图像结果，其仿真的对象贯穿于创作行为的全流程——从素材的采集、提炼，再到视觉语言的整合与呈现，AI 的涉猎范畴已延伸至除命题以外的所有环节。一定程度上而言，AI 所模拟的是作为创作主体——艺术家完整创作活动。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机制所具备的持续进化的特性，反映出这一技术的长期性，可见在未来的数十年中，AI 艺术与人类创作将形成长期竞争、互助的关系。然而，就现状而言，AI 尚不具备取代艺术家的主体性资格。它更多地扮演着人类意识的技术性延伸角色，其工具属性远大于主体属性。当下的 AI 仍需在接收明确指令后方可启动并调整，其角色类似于传统画坊中领悟力极高的学徒，负责高效执行艺术家的构思。然而，随着认知模型的持续迭代，AI 与人类思维模式的边界可能日趋模糊。届时，对 AI 艺术本质的界定及其对艺术家角色的深远影响，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深刻反思。

2 花鸟画与 AI 的融合路径与本体性思考

在人工智能深刻重塑创作生态的宏观背景下，以花鸟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同样面对着本质层面的危机。若要对此作出审慎的判断，我们须将视角从技术转向其创作本体——花鸟创作者的应对策略。无论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获得主体意识，都注定成为未来艺术创作中关键性的参与变量。随着算法模型的持续精进，生成式技术对艺术创作本体论价值的叩问已日趋紧迫，这要求每一位花鸟画实践者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适。

传统花鸟创作范畴中，具有随机性的笔墨样式是承载书画脉络的形式载体，诸如性灵、气韵等美学范畴均围绕笔墨得以呈现阐发。人工智能对创作流程的吸收，使得传统的花鸟创作者不光要面对是否采用技术的简单选择，更需要学会如何在“共生”与“竞合”中界定自身位置。依据 AI 的介入程度，创作者的角色定位可分作几类：固守“一笔一画皆由己出”的传统型艺术家；将 AI 用于辅助性工作（如素材生成、风格试探）而保留画面主体手绘性的改良型艺术家；在 AI 生成的样稿基础上，进行审美抉择与笔墨提纯的“导演型”艺术家。可以预见，后两种深度融合模式的探索，将成为未来领域内的重要实践方向。

AI 技术为花鸟画带来的赋能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一，是其强大的风格复现与整合能力，能够助力艺术家突破个人经验与视野的局限。在“人机协作”模式下，画家可以指令 AI 对浩如烟海的艺术遗产进行深度挖掘，从历代大师的经典图式中提取特征、解构风格，进而生成海量变异样本，为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灵感源泉。以微软“小冰”的实践为例，其化身“夏语冰”所创作的《或然世界》系列，正是对艺术史四百年间 236 位画家风格要素进行内化与重组后的产物^[1]。其所展现出的样式广度与形态完成度，为当代花鸟画家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外部风格库”。其二，

生成式 AI 的高效能极大压缩了从灵感到草图的转化周期，降低了传统创作中反复试错的物质与时间成本，从而加速了艺术家观念的形成与风格的蜕变。正如大卫·霍克尼等先行者所展示的，数字工具与 AI 的结合，能够释放出惊人的创作能量，催生出兼具个人风格与时代气息的庞大作品序列。

这一切技术变量，都促使我们回归艺术的本源，重新思考花鸟画创作能力”在当代的核心内涵。回顾传统评价体系，通常围绕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展开：一为视觉层面，关乎画家对笔墨、构图、意境等形式语言的驾驭程度；二为意蕴层面，关乎作品所传递的生命感悟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艺术家通过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将内在的真实感受转化为能够引发时代共鸣的普遍性表达。

然而，AI 时代的到来正悄然改变这一价值坐标。在当下本就存在过量视觉刺激的社会中，生成式 AI 的普及进一步消解了技术性图像的稀缺性。如今，即便毫无绘画根基的普通人，也能借助工具生成构图完整、物象肖似的花鸟画面。这使得“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技术普惠成为可能。在此语境下，艺术家“如何作画”的权重大为降低，而“为何创作”的观念性与精神权重，则被推至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简言之：作品的“情感深度”与“思想厚度”在未来更加受到凸显，因此这对创作者的综合学养、审美格调与生命体悟提出了远胜从前的要求。未来的评价标准，或将首要考量创作意旨的层次与深度，而非技术执行的娴熟度。艺术家的角色，因而可能呈现出“去技能化”的倾向，那些兼具深厚人文底蕴的学者型艺术家，或将迎来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在技术迭代的同时，传统花鸟画家也必须警惕随之而来的伦理调整。运用 AI 参与创作的作品，其作者权益应如何界定？训练数据所涉的版权争议责任归于何方？2023 年针对 Stability AI 的集体诉讼，以及 Getty Images 的侵权指控，均为业界敲响了警钟。随着相关法律框架的逐步建立，艺术家亟需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在利用技术便利时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如谷歌 CEO 施密特 (Eric Schmidt) 所言“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语句可能会模仿和近似人类语言，但它们只会淹没或扭曲后者。”^[2]就本质而言，现阶段的 AI 艺术仍是人类创造意志的延伸，其具体应用完全服从于艺术家的主观决策。因此，一旦作品涉及侵权、抄袭或触碰伦理底线，其法律与道德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依然是作为使用者的艺术家。在吸纳技术的同时，创作者必须正视当前 AI 模型的不可靠性，对 AI 生成内容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管理数字版权、维护创作伦理，已成为 AI 时代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之一。如学者于婉莹所言：未来的人工智能不只是基于大数据总结出的绘画技巧和模式，科学家在设计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能力时，必将依托具有人类共识的审美规则和价值判断作为其重要支撑，能够与人类的艺术创作相辅相成^[3]。

尽管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但必须承认，现有 AI 仍远未达到替代人类进行花鸟画创作的全部维度，这为艺术界的调适留下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从根本上说，作为人类意志的延伸，AI 不具备自我意识与情感体验，其所有输出皆源于对既有数据库的统计与重组，而非源于对自然生命的直观感悟与创造性转化。其算法可以模仿情感的“形式”，却无法拥有情感本身。无论是 Midjourney 的瑰丽想象，还是“小冰”的娴熟笔触，其作品的主体性始终归属于背后的工程师与使用者。AI 本身，更接近于一支极为精密的“智能画笔”，而非独立的“执笔人”。回顾人工智能的目标，实质是用机器实现人类的部分智能。花鸟画艺术创作的精髓，绝非是机械性的视觉图像生产，其本质是创作者与天地生灵之间所建立的生动的、审美的生命对话，其核心是艺术家独特的情感温度与生命体验。AI 纵然能够生成在形式上无可挑剔的花鸟图像，但这些作品终究因缺乏真切的生命投入而沦为“无根之木”。因此，花鸟画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在与 AI 的协同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自身的主体地位，重返自然，深耕生活，强化对生命世界的直观感受与哲学思考，以人之灵慧驾驭技之动能，才能现人文精神与智能技术的互补共生。

3 结语

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迭代之下，传统花鸟画的创作模式面临着新的考验。面对生成式 AI 于方法、价值层面带来的挑战，传统花鸟画创作者需要从根源上调整自身的创作路径，乃至形式追求，并再视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创作者通过拓展生命经验、凝练审美判断，利用新型技术，才能与新技术共生，进而为自身创作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同时，在 AI 技术的蝶变中，创作者必须主动厘清创作的伦理边界，提升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自觉性。经此，花鸟画家的创作能与时代内涵得到更深入的契合，传统审美与新技术也可得到新的诠释与认知。

参考文献:

- [1] 小冰, 邱志杰. 或然世界[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2] 亨利·基辛格, 埃里克·施密特, 丹尼尔·胡滕洛赫尔.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3.
- [3] 于婉莹. 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变革性影响分析[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4, (01): 190-194.

数字时代中国画留白美学的传承与创新：技术适配性与精神内核的平衡

温甫玉^{1*}

(¹ 天津美术学院 造型艺术学院, 天津市 300141)

摘要：中国画留白美学的核心并非空白区域的表层呈现，而是植根于道家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指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追求，以及虚实对比的视觉逻辑。数字时代下，像素、代码、虚拟空间等技术载体重构了留白的形态，却也引发“技术过载侵蚀精神内核”“固守传统脱离数字场域”的双重困境。本文以精神内核不丢、技术适配有度为原则，通过剖析数字水墨、交互设计、VR/AR 艺术、新媒体装置中的实践案例，梳理留白美学的传承路径——如何保留“意境优先”“虚实相生”的本质；同时探索创新方向：如何让数字技术成为留白意境的延伸而非替代，最终构建技术适配与精神内核共生的留白美学新范式，为传统美学的当代转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时代；中国画；留白美学；传承与创新

DOI：<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68>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Negative Space Aesthetics in the Digital Age: Balancing Technical Adaptability and Spiritual Core

Wen Fuyu^{1*}

(¹ School of Plastic Arts,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City, 300141,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of the blank space aesthetics in Chinese painting is not the superficial presentation of blank areas, but is rooted in the Tao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being and non-being, aiming at the pursuit of an artistic conception where words have an end but meaning is endless, as well as the visual logic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illusory. In the digital age, technological carriers such as pixels, code, and virtual space have restructured the form of white space, but they have also triggered a dual predicament of "technological overload eroding the spiritual core" and "adhering to tradition and detaching from the digital field". This article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not losing the spiritual core and maintaining a proper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By analyzing practical cases in digital ink wash painting, interaction design, VR/AR art, and new media installations, it sorts out the inheritance path of the blank space aesthetics - how to preserve the essence of "artistic conception first" and "the interplay of reality and illusion".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how to make digital technology an extension of the blank space artistic conception rather than a replacement, and ultimately build a new paradigm of blank space aesthetics where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and spiritual core coexist,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Keywords: Digital ag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Blank space aesthetic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作者简介：温甫玉（1996-），女，天津，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写意油画

通讯作者：温甫玉，通讯邮箱：1614253525@qq.com

引言

中国画以意境为灵魂，追求的是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而留白正是重要的创作手段^[1]。当数字画笔替代毛笔、虚拟空间覆盖宣纸、交互反馈打破静态观赏，中国画中的留白美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数字技术为留白提供了新的表达场域：数字水墨可通过像素透明度模拟墨分五色的留白层次，VR空间能以空无区域延伸传统绘画的二维留白，交互设计可借动态空白实现虚与实的实时转化；另一方面，技术的狂欢也常导致留白美学的失焦：部分数字创作者将留白简化为信息空白，用3D建模填满虚拟空间、以动态特效覆盖画面间隙，看似丰富的视觉元素实则挤压了虚的意境空间，让留白失去引导想象、承载哲思的精神内核。

这种技术与精神的失衡，本质是对留白美学传承与创新关系的误读：传承不是固守宣纸留白的单一形式，而是守住“意境优先、虚实相生”的内核；创新不是用技术颠覆传统，而是让技术适配内核、拓展表达维度。因此，数字时代留白美学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让技术成为传承的载体而非破坏的工具，如何让创新始终扎根于中国画的精神土壤。这既是传统美学当代转化的关键，也是数字艺术摆脱技术炫技、获得文化深度的必由之路。

1 留白美学的精神内核

要实现数字时代的传承，首先需厘清中国画留白美学的精神内核。它并非单一的视觉手法，而是哲学思想、意境追求与视觉逻辑的统一体，这是数字创新不可偏离的根与魂。

从哲学层面看，留白的内核是道家“有无相生”的宇宙观。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赋予留白无中生有的审美价值。画面中的空白（无）并非空洞，而是与物象（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有机整体。如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画面中心仅一叶扁舟、一位渔翁（有），四周皆为空白（无），但这空白不是无物，而是寒江与天空的象征，更是空旷孤寂意境的载体。观者通过有的具象，感知无的深远，实现“有无相生”的哲学体验。这种无不是真无，而是隐在的有的内核，是数字时代留白传承的根本。无论技术如何变化，留白都应是有意义的空白，而非无目的的空无。

从意境层面看，留白的内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追求。传统绘画的留白，本质是意境的留白。通过省略不必要的物象，引导观者调动想象，填补画面未直接呈现的内容，形成画内有景，画外有意的体验。王维水墨山水常以淡墨远山（虚）与浓墨近树（实）对比，远山的虚不是画不出来，而是为了让观者联想到远山之外有远山、云雾之中有江湖，从而获得超越画面本身的意境共鸣。这种以虚引实、以实显虚的意境逻辑，决定了数字时代的留白不能停留在视觉空白的层面。数字水墨的像素空白、VR空间的虚拟空无，都应承担引导想象、承载意境的功能，否则便会沦为技术化的空洞。

从视觉层面看，留白的内核是虚实对比的节奏平衡。传统绘画通过实的物象与虚的留白的对比构建视觉节奏，引导观者视线聚焦。清代笪重光《画筌》中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正是强调实的密集与虚的疏朗需形成平衡。若实过多则画面拥挤，若虚过多则物象孤立。这种节奏平衡的内核，在数字时代同样适用。数字绘画的像素密度、交互界面的信息布局、VR空间的元素分布，都需遵循虚实平衡的视觉逻辑，避免技术元素堆砌导致的实有余而虚不足。

正是这三重内核，构成了留白美学的灵魂。数字时代的传承，不是复制宣纸留白的形式，而是将这三重内核融入数字创作。无论是像素、代码还是虚拟空间，都应成为哲学思想的载体、意境延伸的工具、视觉节奏的支撑。

2 数字场域中留白内核的坚守

数字技术虽改变了留白的载体，却未改变其精神内核。许多创作者通过技术为表、内核为里的实践，让中国画留白的本质在数字场域中得以延续，这种传承并非被动复刻，而是主动适配中的坚守。

数字创作中，意境优先的内核通过像素语言得以传承。艺术家徐冰的影像作品《蜻蜓之眼》虽非传统水墨形式，却巧妙运用监控摄像视频剪辑而成，在海量监控视频片段的重组中保留大量视觉空白：画面中刻意虚化的背景、未做细节处理的人物群像，留白艺术手法在影视作品画面中的应用，可以引发观者想象，促使观者跨越体裁、艺术形式的限制，挖掘影视作品蕴含的意义，进而自行发现影视画面中包含的广泛深刻信息^[2]。如同传统水墨中的留白，引导观众在信息间隙

中构建想象空间，暗合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美学追求。另一位数字艺术家邱岸雄的《新山海经》系列数字绘画，则以低饱和度色块勾勒神话生物，用大面积的透明图层和单色背景模拟水墨的虚白意境，画面中超过60%的数字空白并非技术缺失，而是对传统计白当黑理念的创新诠释。邱黯雄在创作访谈中曾提到，他会严格控制数字笔触的叠加层数，避免因过度渲染破坏画面的疏朗感，这种以简驭繁的创作逻辑，正是对留白意境优先内核的坚守。相比之下，部分数字水墨作品过度依赖3D建模与纹理叠加，将物象的每一处细节都极致还原，看似逼真，却因视觉信息过于密集，消解了传统水墨虚实相生的意境，沦为技术炫技而非艺术表达。

交互设计中，虚实相生的内核通过信息布局得以传承。故宫博物院的每日故宫APP，没有陷入信息堆砌的数字困境，而是以留白美学构建界面逻辑。APP首页以文物高清图片为核心（实），周围仅保留日期、文物名称、收藏按钮三个基础元素，其余区域均为纯净的空白（虚）。这空白不是功能缺失，而是对传统留白虚实对比的适配：空白区域既避免了广告、推送等冗余信息对文物的干扰，让用户注意力聚焦于文物本身（实），又通过空无引导用户想象文物背后的历史场景（虚），如看到宋代瓷瓶时，空白处仿佛成为瓷瓶曾存放的书房，实现功能实用与意境审美的统一。这种以虚显实、以实引虚的设计，与传统绘画中孤舟渔翁衬寒江的逻辑如出一辙，都是通过虚的衬托，让实的价值与意境得以延伸。

VR/AR艺术中，节奏平衡的内核通过空间设计得以传承。VR故宫的太和殿场景，没有用数字技术复刻故宫的满景，而是以空间留白还原传统建筑的审美节奏。VR空间中，1:1还原太和殿本体（实）：屋顶的吻兽、殿内的龙椅、墙面的彩绘都细致呈现，而殿外的庭院、天空则处理为简洁的淡灰色虚拟空间（虚），没有加入树木、人群等多余元素。这种实的密集与虚的疏朗，形成了清晰的视觉节奏。用户的视线自然聚焦于太和殿（实），同时通过虚的空间感受到皇家宫殿的宏伟空旷，正如传统山水画中近山实、远山虚的节奏平衡。若VR场景中塞满树木、宫灯、侍从等元素，看似还原真实，却会让太和殿被淹没在实的拥挤中，失去皇家礼制的庄严意境。这正是VR故宫设计的高明之处：以空间留白守住虚实平衡的内核，让技术服务于意境而非相反。

3 技术适配中留白形态的拓展

传承不是固守，创新也不是背离。数字时代留白美学的创新，在于让数字技术的特性，如交互性、虚拟性、动态性等与留白内核适配，拓展留白的形态与体验维度，让虚实相生的逻辑在数字场域中产生新的表达。

交互性赋予留白动态转化的新形态。传统绘画的留白是静态的，观者只能被动接受虚与实的关系，而数字技术的交互性，让留白可以随用户行为实现虚与实的动态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对内核的破坏，而是对有无相生的延伸。网易云音乐的私人FM界面，播放状态下以歌曲封面为核心（实），周围为纯黑留白（虚）；当用户点击空白区域时，空白处会弹出播放进度条、收藏按钮等功能元素（实），点击消失后又恢复为空白（虚）。这种从虚到实再到虚的动态转化，既保留了界面的简洁，又不影响功能使用，实现了交互需求与留白美学的适配。这种动态留白，本质是传统虚实相生的延伸：传统绘画中虚与实是静态共生，而数字交互中虚与实是动态共生，但其核心逻辑仍是实支撑虚、虚衬托实。teamLab的新媒体装置《花与人的森林》则更进一步，展厅内90%区域为黑暗留白（虚），仅投影动态花朵（实）；当观众走近花朵时，花朵会绽放，走远后花朵会凋谢。观众的行为成为虚实转化的触发点，留白不再是固定的空白，而是随互动变化的意境载体。梅洛·庞蒂曾提出，我们认知一个空间，感知到和记住的并不是单一图像，而是一个对整体感知的律动^[3]。数字留白创新并非孤立改变形态，而是顺应整体感知律动的认知逻辑，使技术服务于更具生命力的美学体验，最终实现功能、体验与传统留白内核的统一。这种创新让传统留白的意境延伸从观者想象走向观者参与，却始终未脱离以虚显实的内核。

动态性赋予留白时间流动的新体验。传统绘画的留白是凝固的，而数字技术的动态性，让留白可以随时间变化，形成时间维度的虚实节奏，这种体验创新让意境延伸更具层次感。数字水墨作品《四季竹石图》，没有用静态画面呈现四季，而是以动态留白模拟季节变化：春日，竹叶以疏朗的笔触绘制（实），背景留白为淡绿（虚），留白中隐约浮现春雨的动态效果（虚的动态）；秋日，竹叶变得密集，背景留白转为淡黄，留白中飘落虚拟的枯叶。这种动态留白，不是简单的画面动起来，而是让虚的空间随时间流动，与实的竹叶共同构建四季更替的意境，正如传统绘画中一叶知秋的含蓄表达，但数字动态让这种表达更具感染力。这种创新，本质是将传统留白的空

间节奏与数字技术的时间节奏结合，让虚实相生从空间维度拓展到时空维度，却未偏离意境优先的内核。

数字技术的特性适配传统留白内核，在拓展留白形态与体验维度的同时，始终不背离虚实相生，意境优先的传统本质，实现技术服务与美学、创新锚定传统的统一。交互性是留白从静态感知走向动态参与的关键适配点，动态性则让留白实现空间维度到时空维度的拓展。整体来看数字留白创新的内在规律，是技术始终作为工具，以整体感知律动，意境延伸为导向，在拓展体验维度的同时，牢牢锚定传统留白的核心内核，最终达成功能、体验与传统美学的统一。

4 避免技术异化，守住内核边界

数字时代留白美学的传承与创新，核心是平衡——既要避免技术无用论的保守，也要警惕技术万能论的异化。而平衡的关键，在于明确技术适配的边界：技术可以拓展留白的形态、体验与维度，但不能替代留白的精神内核。任何数字创新，都应满足“内核不丢、功能适配、意境不弱”的原则。

首先，技术适配需以精神内核不丢为前提。数字技术的应用，不能以牺牲有无相生的哲学、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为代价。部分数字游戏的古风场景，虽采用传统水墨风格，却在画面中塞满光影特效、道具图标、任务提示（实），几乎无留白（虚）可言——这种设计虽满足了游戏的功能需求，却丢失了传统留白的意境需求，玩家看到的是技术堆砌的古风，而非有意境的古风。相反，独立游戏《绘真·妙笔千山》的场景设计，则以内核优先适配技术：游戏画面以传统青绿山水为基底，场景中的山石、树木（实）与云雾、水面（虚）形成清晰的虚实对比，即使是游戏功能按钮，也设计为水墨图标融入留白区域（虚），避免干扰意境——这种设计，让技术服务与青绿山水的留白意境，而非让意境服务于技术，正是内核不丢的平衡典范。

其次，技术适配需以功能需求适配为原则。数字留白的创新，不能脱离数字载体的功能属性：交互设计的留白需兼顾信息传递效率，VR艺术的留白需兼顾沉浸体验安全，新媒体装置的留白需兼顾观众互动便利。每日故宫APP的留白设计，既满足了意境审美，又兼顾了用户阅读效率：文物介绍文字以灰色小字置于留白区域（虚），既不干扰文物图片（实），又方便用户快速阅读；而若将文字设计为水墨动态效果，虽更具传统韵味，却会降低阅读效率，违背交互功能适配的原则。同样，VR展览的留白设计，需避免过度空白导致的方向迷失：VR故宫展览的中轴线场景，在空白的虚拟庭院（虚）中设置了subtle的光影引导线（虚的引导），既不破坏空旷意境，又帮助用户明确行走方向——这种适配，是技术服务与功能与审美统一的体现，而非单纯追求技术创新。

最后，技术适配需以意境不弱为底线。数字技术的应用，应强化而非弱化留白的意境。部分新媒体装置为追求视觉冲击，用强光特效填满整个展厅（实），几乎无留白（虚），观众虽感受到震撼，却因实的过度刺激，无法产生意境共鸣，这种设计，是技术对意境的异化。而teamLab的《无相之云》装置，则以意境不弱为底线：装置中，虚拟的云（实）漂浮在黑暗的展厅（虚）中，云的密度随观众人数变化（实的动态），但始终保持疏朗透气的节奏，黑暗的留白（虚）让云的形态更显轻盈，观众在其中行走，能感受到置身云端、天地辽阔的意境，这种设计，用数字技术强化了虚的意境，而非用技术覆盖虚的空间，正是意境不弱的平衡关键。

5 结语

守正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经验^[4]。数字时代中国画留白美学的传承与创新，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内核与技术的共生。传承的核心，是守住有无相生的哲学、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虚实对比的视觉逻辑——这是留白美学的根，无论技术如何变化，都不能偏离；创新的核心，是让数字技术的交互性、虚拟性、动态性与内核适配，拓展留白的形态（动态留白、空间留白）、体验（参与式、沉浸式）、维度（时空维度）——这是留白美学的翼，让传统美学在数字场域中焕发新活力。

未来，随着元宇宙、AI绘画等技术的发展，留白美学的创新空间将更广阔：AI可通过学习传统绘画的留白逻辑，生成符合意境的数字留白。元宇宙可构建跨时空的留白场景，让用户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古今留白美学的对话。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技术适配性与精神内核的平衡始终是

核心命题——唯有以传统内核为根，以数字技术为翼，才能让中国画留白美学在数字时代既守住经典，又创得出新意，成为数字艺术的东方美学基因，也为全球数字美学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纪瑞青. 意境在中国画中的运用和发展[J]. 国画家, 2022, (04):77-78.
- [2] 陈婧. 影视作品画面中的“留白”艺术探究[J]. 戏剧与影视, 2024, (23):130.
- [3] 梅洛·庞蒂. 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M]. 王士盛、周子悦,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 [4] 尚辉. 卷首语[J]. 美术, 2019, (12):1.

从咏鸟诗看唐代诗人情感的变迁

徐佳怡^{1*}

(¹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省 延安市 716000)

摘要: 唐代咏鸟诗的流变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与诗人情感结构的演进。初唐时期, 宫廷咏鸟诗承袭六朝余风, 以藻饰为表、功业为里, 服务于政治颂美与士人进身之阶; 盛唐阶段, 李白借“大鹏”“凤鸟”抒发浪漫豪情, 杜甫则以“鹰”“朱凤”寄寓仁政理想与现实关怀, 体现出理想主义与社会关切的双重书写; 中唐咏鸟诗在乱世背景下多抒写身世之悲, 韦应物等人延续杜甫传统, 以鸟喻世, 讽刺现实; 至晚唐, 咏鸟诗创作臻于繁荣, 李商隐以流莺、北禽曲诉党争中之命运, 罗隐、皮日休等人则借鹭鸶、鹤媒等冷峻意象批判社会弊端, 艺术手法由绮丽转向沉郁, 情感基调也从雄健转为哀婉。整体上, 唐代咏鸟诗不仅实现了艺术表现与象征内涵的多重突破, 也成为观照唐代文人精神世界与情感变迁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唐代; 咏鸟诗; 情感变迁; 意象演变; 时代精神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19>

The Evolution of Tang Dynasty Poets' Emotions as Reflected in Bird-Praise Poetry

Xu Jiayi^{1*}

(¹ Ya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bird-themed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era's spirit and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poets. During the early Tang period, court bird poetry carried forward the lingering influence of the Six Dynasties era, adorned with ornate language while concealing political ambitions beneath its surface, serving both as political panegyrics and a stepping stone for scholars seeking advancement. In the high Tang era, Li Bai channeled romantic grandeur through imagery of the “great peng” and “phoenix,” while Du Fu employed the ‘hawk’ and “vermillion phoenix” to convey ideal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and real-world concerns, embodying a dual focus on idealism and social engagement. Amidst the turmoil of the Middle Tang, bird poetry often lamented personal misfortune. Poets like Wei Yingwu continued Du Fu's tradition, using birds as metaphors for the world to satirize reality. By the late Tang, bird poetry reached its zenith. Li Shangyin used the wandering oriole and northern birds to lament fate amidst factional strife, while Luo Yin, Pi Rixiu, and others employed images like egrets and cranes to deliver stark critiques of societal ills. Artistic techniques shifted from ornate splendor to somber depth, and emotional tones evolved from vigorous vigor to melancholic lamentation. Overall, Tang dynasty bird poetry achieved multiple breakthroughs in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symbolic depth, becoming a vital medium for examining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emotional evolution of Tang literati.

Keywords: Tang Dynasty; Bird-themed Poetry;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of Imagery; Spirit of the Times

作者简介: 徐佳怡 (2000-), 女, 陕西汉中,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 徐佳怡, 通讯邮箱: 1914456571@qq.com

引言

鸟类意象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吟咏的重要对象，在唐代达到了艺术表现与精神寄托的高峰。唐代咏鸟诗不仅延续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融注新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质。从初唐宫廷应制中的功业隐喻，到盛唐诗人借大鹏、朱凤抒发的豪情与仁怀，再到中晚唐时期以孤雁、病鹤寄托身世之悲与末世之思，咏鸟诗的演变深刻反映了唐代政治、社会的转型与文人精神世界的流转。本研究以时间为轴，通过考察不同阶段代表性诗人的咏鸟作品，剖析鸟类意象如何从宫廷装饰逐渐发展为情感载体、政治隐喻与艺术精神的复合符号，从而揭示唐代诗人情感结构的变迁与诗歌内在精神的演进。

1 初唐咏鸟诗：宫廷语境中的形式美追求与功业表达

初唐咏鸟诗的创作与发展，与宫廷文化及其政治语境紧密相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贞观时期，随着国力逐渐强盛与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复兴，唐太宗、魏征、虞世南等人强调文学应服务于政教，批判齐梁文风中的浮艳倾向，提倡“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1]。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宫廷诗仍延续了齐梁以来形式华美、讲究辞藻的传统，咏鸟诗更成为颂圣应制、歌功颂德的重要载体。

唐太宗在文学创作上颇有建树，尽管他的咏鸟诗作并不多，但包括《赋得早雁出云鸣》和《咏鸟代陈师道》在内的几首咏鸟诗，都生动地描绘了他晚年宫廷生活的景象，风格柔美，语言华丽，充分展现了梁、陈诗风的韵味。以《赋得早雁出云鸣》为例：“初秋玉露清，早雁出空鸣。隔云时乱影，因风乍含声”^[2]。诗歌表现出了展现了华美的语言和精巧的对仗，但情感表达略显不足。此外，褚亮、刘孝孙等唐太宗的朝臣，都与南朝和隋代的绮艳诗文群体有着深厚的联系。例如，刘孝孙的《赋得春莺送友人》中：“流莺拂绣羽，二月上林期。待雪销金禁，衔花向玉墀。翅掩飞燕舞，啼恼婕妤悲。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3-1]。语言纤弱，笔力不振，其中的“待雪消金禁，衔花向玉墀”是典型的梁陈宫体风格。初唐诗坛，帝王周围聚集的宫廷文人，常赞颂帝业、歌功颂德以彰显帝国声威。在宴享时应制唱和，借诗文助兴点缀盛世，满足帝王的统治需求。

在这一阶段，咏鸟诗不仅服务于政治颂美，也成为士人谋求进身之阶的媒介。例如杨师道的《应诏咏巢鸟》中，“桂树春晖满，巢鸟刷羽仪。朝飞丽城上，夜宿碧林陲。背风藏密叶，向日逐疏枝。仰德还能哺，依仁遂可窥。惊鸣雕辇侧，王吉自相知”^[3-2]。诗人以慈鸟反哺象征孝道，结尾四句借用王吉射鸟典故祝寿，以期得到帝王的认可与赞誉。在遵循宫廷礼仪的同时为自身功业的成功铺就道路。虞世南《飞来双白鹤》借双鹤高飞暗喻人生际遇，皆在物象中寄寓颂圣或言志之心。更有如李义府《咏鸟》，以“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4-1]委婉表达求仕之意，太宗亦以“与卿全树，何止一枝”^[3-3]予以嘉许，显示出咏鸟诗在政治交往中的实用功能。

袁行霈曾指出，初唐诗歌存在“从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之趋势^[5]。尽管贞观宫廷咏鸟诗仍以应制与功业诉求为主，其情感表达中的艳情成分已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抱负与仕途理想的抒写。随着帝国气象日盛，士人心态亦趋于开阔，咏鸟诗逐渐突破纯粹的形式美追求，开始承载更丰富的情感与人格内容，为盛唐咏物诗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

2 盛唐咏鸟诗：理想主义与现实关怀的双重书写

盛唐国力愈加强盛，政治开明，国君心态开放，这为文人从事政治活动及实现功业理想提供了强大支撑。咏鸟诗在盛唐诗人钟爱的诗歌类型中虽并非焦点，但由于鸟类作为情感载体具有强烈的鲜活性，加之诗歌整体水平提升，咏鸟诗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尽管许多诗人在盛唐时期的个人境遇不佳，但他们并未与社会脱节，反而展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救世情怀，他们通过诗歌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批评和讽刺。

2.1 讥讽时事

从咏鸟诗的发展史来看，盛唐时期的诗人开始自觉地将社会政治现实融入诗歌，他们通过咏鸟诗来表达对现实和政治的讽刺，这也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储光曦在《群鸦咏》中写道：“群鸦随天车，夜满新丰树。所思在腐余，不复忧霜露”^[6-1]。诗人以“群鸦”来喻指小人，委婉地讽刺了身边那些追随“天车”的贪禄小人。

南朝已有诗人吟咏百舌，刘孝绰和沈约都有诗、赋流传。但内容大都是借咏鸟来反衬思乡。王维的《听白舌鸟》则有所不同：“上兰门外草萋萋，未央宫中花里栖。亦有相随过御苑，不知若个向金堤。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啼。万户千门应觉晓，建章何必听鸣鸡”^[7-1]。诗前六句着力刻画百舌鸟，先点明其栖息于深宫禁苑，凭借婉转的鸣唱深得帝王青睐，得以在宫阙花丛间栖息，在御苑金堤旁鸣啭。末二句“万户千门应觉晓，建章何必听鸣鸡”则暗讽当时的社会现实：真正能司晨报晓的雄鸡与贤良之士，不被当权者看重，而朝堂所重用的，恰是这类巧舌如簧的百舌鸟之流。全诗虽无一字直斥政治，却通过百舌鸟与鸡境遇的鲜明对比，将隐忧与不平尽皆托出，以写鸟可见诗人愤懑之情。

储光曦与王维都借鸟来喻指讥讽时事，虽未直言但愤懑之情呼之欲出。同时，二者不单是讥讽时事，前者情感色调中含有隐退的倾向，寄怀相对含蓄；后者通过对“巧言”的警惕，在批判政治的同时侧重修心，二者的核心是自我心境的清净与隐退。与强盛的国力相伴的是诗人包容的心态，因此盛唐咏鸟诗仍然以李白和杜甫为代表，前者借咏鸟来表现其豪情壮志与理想追求，后者则在其咏鸟诗中表达了深沉的仁政情怀和时代心声。

2.2 豪情壮志

李白的咏鸟诗体现出了他浪漫主义的诗人本色，他的咏鸟诗以其形象生动、意境高远而著称，在诗作中常常流露出一种激昂的情感和对自由飞翔的向往。李白天生喜欢鸟类，尤其钟爱那些自由翱翔、不受束缚的飞禽。他曾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描述自己与隐士东岩子在崛山上隐居时：“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8-1]。虽不免有夸张之感，但也反映出了李白对鸟多有喜爱。在《赠黄山胡公求白鹇》一诗中，李白对白鹇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来形容白鹇的美丽^[9]。在《古风》中，他赞美双白鸥的自在与超脱，在对白鸥超逸不群的赞美之中表达了自己不愿与权贵为伍，渴望隐居江海的志向。《鸣雁行》则表现了他爱鸟护鸟的美好品德：“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一一衔芦枝，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客居烟波寄湘吴，凌霜触雪毛体枯，畏逢霜缴惊相呼。闻弦虚坠良可吁，君更弹射何为乎”^[10-1]。诗人不只写出了胡雁“客居烟波寄湘吴，凌霜触雪毛体枯，畏逢矰缴惊相呼”的困境，也以“闻弦虚坠良可吁，君更弹射何为乎”对猎雁者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不仅爱鸟更是护鸟，展现了他对生命博大的同情心。

以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为统计对象，发现李白诗文中出现的禽鸟不胜枚举，其中凤鸟与大鹏出现的频率最高。李白在年轻时就曾以大鹏自比，在《上李邕》中借“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11]表达了自己宏大抱负和纵横天下的理想。大鹏的形象象征着李白青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不可一世的宏大抱负，而凤鸟则暗示了他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对济世安民理想的追求。据统计，李白诗中仅以“凤”字单独构成的句子就有 20 余个，如《凤飞九千仞》（古风其四）中的“凤飞九千仞”^[12]以及《拟古十二首》其十：“仙人骑彩凤”^[10-2]等，都体现了他对高尚理想的向往。

2.3 仁政情怀

杜甫咏鸟诗体物精微、寄意遥深，体现他“救济人病，补时阙”的现实主义本色。其咏物诗现存 103 首，咏鸟诗 32 首，每三首咏物诗中就有一首咏鸟诗，涉及鹊、杜鹃、鹰、鹤等多种鸟类^[8-2]。在《归雁》中，杜甫因见江雁北飞而抒发怀乡之情，“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4-2]充满了悲怆。青年时期在《画鹰》中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羌”表达了他昂扬向上的凌云志向，而安史之乱后的《咏鹰》：“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13-1]则展现了诗人忠肝义胆，渴望清除国贼、挽救危亡，寓意颇深。

杜甫的咏鸟诗不单是描绘鸟儿的形态，更寄托了诗人的情感和对时代的思考，诗中充满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高度契合。在杜甫之前的咏物诗，大都没有突破托物言志、借物寓怀的范围。而杜甫的咏物诗则将思想内容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范围内，并且在诗中表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伟大情怀，表现出了浓厚的现实主义基调。杜甫的咏鹰诗在他的咏鸟诗中尤为引人注目，杜甫集中有咏鹰诗九首，非咏鹰但写了鹰的形象的诗三十六首，另有鹰赋一篇^[8-3]。鹰的形象在杜甫的诗中象征着诗人的理想抱负和人格精神。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鹰的形象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早期诗作《画鹰》^[14-1]中的鹰是诗人豪迈激昂、意气风发

的象征，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义鹘行》^[14-2]则更多地体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命运的思考。

杜甫的咏鸟诗不仅丰富了咏物诗的题材，更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儒家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改变了前人咏物诗较少反映民生疾苦的状况。他的诗歌中，无论是赞叹、悲悯、痛惜还是怀思，都流露出深厚的情感和对时代的深刻思考。

3 中唐咏鸟诗：乱世中的身世之感与社会批判

安史之乱后，盛唐转入了中唐。中唐时期国运日衰、宦官专权、边患四起，诗人的生活环境和心态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鲜有抒写豪情壮志的咏鸟诗。此时期诗人大多壮志难酬，因此其笔下的咏鸟诗寄意遥深、讽时刺世。

3.1 托物自伤

中唐时期的咏鸟诗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他们的青年时期虽在开元盛世度过，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巨变使他们失去了盛唐诗人那种豪迈与浪漫。在他们的咏鸟诗是诗人之间的唱和、赠别以及以鸟自喻、感伤身世。例如钱起《赋得巢燕送客》^[3-4]、耿湋《赋得沙上雁》^[3-5]、司空曙《夜闻回雁》^[3-6]等，常常通过鸟儿的离合、孤寂来抒发自伤之情，诗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在艺术表现上，“大历十才子”对鸟的描写格外用心，延续并深化了盛唐咏物诗“即物达情”的传统。比如钱起《衔鱼翠鸟》^[4-3]以简洁传神的笔法，生动再现翠鸟捕鱼的瞬间，富有画面感和情趣。又如《归雁》^[15]将雁的形象与人的乡思情感融合，通过“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的妙笔，把物象与情感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总体来看，以钱起、李端、卢纶等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其咏鸟诗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关注自身遭际，风格多阴郁悲凉。与杜甫咏鸟诗不同，他们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在中唐前期，能够承继杜甫现实主义传统，并对后期咏鸟诗产生重要影响的，则以韦应物最为突出。

3.2 讽世寄怀

韦应物现存的咏物诗共二十八首，其中咏鸟诗就有十三首，数量虽不算多，但咏鸟诗占比极高，作为横跨盛唐和中唐的诗人，他对国家兴衰有切身体会。与盛唐储光曦和王维不同的是，韦应物在讽世寄怀的同时表现了功不见用的感慨。

在中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时，韦应物并未选择对现实避而不见，也没有沉溺于个人悲欢，感慨。而是以咏鸟诗讥讽时弊，表达自己的批判和忧虑。如《杂体五首·其二》：“沉沉匣中镜，为此尘垢蚀。辉光何所如，月在云中黑。南金既雕错，鞶带共辉饰。空存鉴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竭肝胆，思照冰玉色。自非磨莹工，日日空叹息。古宅集祆鸟，群号枯树枝。黄昏窥人室，鬼物相与期。居人不安寝，搏击思此时。岂无鹰与鹤，饱肉不肯飞。既乖逐鸟节，空养凌云姿。孤负肉食恩，何异城上鵠。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同声自相应，体质不必齐。谁知贾人铎，能使大乐谐。铿锵发宫徵，和乐变其哀。人神既昭享，凤鸟亦下来。岂非至贱物，一奏升天阶。物情苟有合，莫问玉与泥。碌碌荆山璞，卞和献君门。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献知国宝，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岂存”。他用“祆鸟”象征怪鸟、恶鸟，扰乱人们安宁，而本应驱赶它们的鹰和鹤却“饱肉不肯飞”，反映了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不尽忠职守^[7-2]。诗的结尾以激愤之情予以斥责，表现了诗人对时政的关注和不满。《燕衔泥》：“衔泥燕，声喽喽，尾涎涎。秋去何所归，春来复相见。岂不解决绝高飞碧云里，何为地上衔泥滓。衔泥虽贱意有营，杏梁朝日巢欲成。不见百鸟畏人林野宿，翻遭网罗俎其肉，未若衔泥入华屋。燕衔泥，百鸟之智莫与齐”^[6-3]。燕子勤劳，得遂安居，但人世之中勤劳未必有美报。加之中唐国势已衰，诗人表面轻淡，言外有羁旅与功不见用的感慨，及对用人失当与世风冷漠的不满。诗人以燕子筑巢华屋自保，对比“野林”中的鸟类纷纷被捕，讽刺了依傍权贵者的处世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乱世之中百姓无处容身的无奈。

总的来说，中唐时期“大历十才子”的咏鸟诗多抒写内心的苍凉，而韦应物则以现实主义精神，创作了许多有讽刺和批判意义的咏鸟诗。中唐咏鸟诗不仅真实反映了时代剧变中人的精神转向，也以其深沉的情感内涵与鲜明的现实指向，拓展了咏物诗的艺术深度与思想容量，成为连缀盛唐与晚唐诗歌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中唐后期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4 晚唐咏鸟诗：象征主义的兴起与批判精神的深化

晚唐时期是中国咏鸟诗创作极为活跃、作品数量繁盛的阶段。元人方回曾指出：“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16]。此评虽显夸张，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晚唐诗歌题材趋于细腻化的倾向。就咏鸟诗而言，从数量分布上看，鹤、雁、杜鹃、燕、鹭、莺等成为吟咏主体，而如巨龙、大鹏这类象征雄健气魄的意象已近乎绝迹，猛虎、鹰等威猛形象亦寥寥可数。在内容层面，不少晚唐咏鸟诗折射出诗人对政治现实与历史走向的深沉思索，传递出末世文人特有的压抑、愤懑与不平之鸣。情感表达上，所选意象多具悲剧色彩，如失群孤雁、泣血杜鹃等承载哀怨传统的鸟类形象，其悲鸣屡屡回荡于晚唐诗坛，强化了整体诗风的感伤基调。

4.1 幽思婉转

晚唐前期的政局动荡不安、翻覆不定，使身处其中的文人普遍产生朝不保夕的忧虑感，心理层面承受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尽管他们仍心怀朝廷，并未完全放弃理想，但已丧失中唐时期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那种讽喻时弊、锐意批判的现实锋芒。与后期随农民起义而彻底绝望的文人不同，这一阶段的士人仍存有一定希望与抱负，只是这些志向在现实压抑下渐趋内敛，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他们大多不具备实际干预朝政的条件，转而将视线从社会现实转向自我精神的书写。在此背景下，晚唐前期的咏鸟诗创作出现显著变化：以讽喻现实、揭露社会黑暗为主题的咏鸟诗数量明显减少，诗人更多借鸟类意象来抒写个人内心的哀怨、愁绪与彷徨。咏鸟诗的关注点从外在社会关怀逐渐转向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反映出晚唐士人在政治低潮中的精神转向与审美内化。

在晚唐前期的政治乱局与文人处境中，李商隐的咏鸟诗集中体现了该时期士人的精神转向与艺术突围。面对宦官专权、竞争剧烈的恶劣政治生态，他虽有强烈的用世之志，却因处境艰难而难以直言陈情，遂将凝重的心事寄寓于咏物诗之中。这一类诗作因其含蓄深远、托物寓怀的特点，成为李商隐在压抑语境中的一种“隐微书写”，既避祸全身，又抒怀言志。在其《流莺》一诗中，“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暗合诗人宦途漂泊、命运无主的身世之感^[3-7]；“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则隐喻才情不为人识、抱负难逢时机的憾恨；而“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更以昼夜交替、宫门启闭象征朝局之诡谲与党派倾轧；末句“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将流莺无栖与诗人失所之悲融合为一，物我双写，被后人誉为“含思宛转，独绝古今”^[17]。另一首《北禽》作于梓幕时期^[6-4]，诗人以“北禽”自喻，“为恋巴江好，无辞瘴雾蒸”暗指依附幕主以暂得栖身；“纵能朝杜宇，可得值苍鹰”传达即便有意报效仍难逃政敌迫害之忧；“石小虚填海，芦铦未破矰”则透出虽怀精卫之志却无力突破现实困境的悲慨；结尾“知来有乾鹊，何不向雕陵”更流露出渴望预知危机、远害自保的心态。全诗将诗人的政治处境与北禽意象高度融合，展现其在党争夹缝中力求自存却难有作为的压抑心理。

李商隐通过这些作品，成功将个人身世、政治体验与咏鸟传统相融合，形成一种“物我互渗”的抒情范式。其咏鸟诗不再停留于传统的比兴寄托，而是将物象、情感与时代氛围高度整合，极大地拓展了咏物诗的情感深度与艺术表现力，对后世咏物诗创作影响深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商隐成为晚唐前期咏鸟诗最深刻的代表，其创作也标志着唐诗在政治低潮中向内心世界与象征艺术的深刻转型。

4.2 怨世讥时

晚唐后期的咏鸟诗创作，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呈现出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的鲜明特征。随着唐王朝国势日趋衰微，政治腐败、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日益加剧，诗歌创作也在延续中唐新乐府派关注现实传统的同时，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转变。诗人的创作重心从“救济人病”的讽喻意图，逐渐转向更具批判性与抗争意识的社会讽刺，他们常借咏鸟以抒击现实之愤、寄托忧世之思。在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笔下，咏鸟诗成为针砭时弊的利器。

皮日休《喜鹊》以鹊喻人^[6-5]，讽刺趋炎附势之徒；陆龟蒙《鹤媒歌》^[6-6]则借“鹤媒”形象影射官场中陷害同僚的奸佞之辈，其《雁》诗更以“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6-7]暗喻乱世中士人的艰难处境。罗隐出身贫寒而才华横溢，他“自以为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13-2]。进一步将个人不平之气与对朝政的批判融为一体，其《鹭鸶》中“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3-8]直指伪善之弊，

《鹰》中“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妨难”^[3-9]则讥讽朝政积重难返。杜荀鹤虽语言质朴，却在《闻子规》等作品中以“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抒发出寒士不遇的悲慨与时代的绝望^[3-10]。与此同时，郑谷等人则在艺术层面开拓出新的境界。其《鹧鸪》一诗不滞于物态摹写，而致力于营造凄迷意境、传递哀婉情韵，展现出晚唐咏鸟诗在审美层面的深化与创新。

总体来看，晚唐后期的咏鸟诗在整体上凝聚为一种具有批判意识与悲剧美感的诗歌类型。与盛唐和中唐咏鸟诗不同的是，晚唐后期咏鸟诗讽世直白辛辣，用鸟直接映射权贵、小人和贤士遭际，情感激烈，同时有高洁自守的意象。咏鸟诗既承接了咏物诗的传统比兴手法，又融入了晚唐特有的忧患意识与讽喻精神，在感伤中见锋锐，于寄兴中寓批判，成为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收束。

5 结语

唐代咏鸟诗的转变，堪称一部以羽翼载录的时代精神史。从初唐虞世南笔下“映海疑浮雪”的白鹤，到盛唐李白诗中“抟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再到中唐韦应物“岂无鹰与鹯，饱肉不肯飞”的鹰与鹯，最后到晚唐陆龟蒙笔下“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的孤雁，鸟类意象的演变，清晰地勾勒出唐代诗人从昂扬进取到彷徨沉郁的心灵轨迹。这种演变印证了自然物象在我国诗歌中是审美、道德与情感的象征载体。唐代咏鸟诗实现了三重突破：在艺术技法上，诗人突破齐梁咏物窠臼，李商隐“物我双写”的婉曲与郑谷“传神写照”的韵致，拓展了咏物诗的意境深度；在精神品格上，诗作彰显了唐代士人的气节与担当，杜荀鹤以子规啼血喻寒士之悲，罗隐借鹭鸶素白讽伪善之态，皆在困厄中不失批判锋芒；在文化意义上，鸟类意象从宫廷祥瑞到自由精灵，再至乱世悲鸟的演变，成为“文变染乎世情”的生动注脚。唐代咏鸟诗的永恒魅力，不仅在于其精妙的艺术表达，更在于它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磅礴之气与深沉之思。它既是诗人个体才情的飞扬，更是华夏文明“天人合一”哲思在诗歌中的璀璨绽放。

参考文献：

- [1] 清·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 潘永因. 传统文化修养丛书·万首唐人绝句·上[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1.
- [3] 黄勇. 唐诗宋词全集·第1册[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336.
- [4] 周啸天编著. 历代绝句鉴赏大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4: 157.
- [5] 袁行霈. 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J]. 北京大学学报, 1994, (6).
- [6] 周振甫. 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第3册[M]. 合肥：黄山书社，1999:971.
- [7] 于志鹏. 宋前咏物诗发展史[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144.
- [8] 赵梦. 唐代咏鸟诗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 [9] 周梅，杨晓云. 张广亮编. 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诗选[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68.
- [10] 邵丽鸥. 中华古诗文[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3: 10.
- [11]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 李白诗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98.
- [12] 林东海选注. 李白诗选[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92.
- [13]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3.
- [14] 闵泽平校注. 杜甫诗全集·汇校汇注汇评·上[M]. 合肥：崇文书局，2023: 11.
- [15] 徐天闵选，熊礼汇校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古今诗选[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54.
- [16]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 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00.
- [17] 刘学锴，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893.

论《河山传》中微信书写的叙事功能与时代 隐喻

尹丹阳^{1*}

(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 750011)

摘要: 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大量引入微信聊天记录, 不仅是叙事技巧的创新, 更是现实主义文学面对高度媒介化现实所做的深刻回应。本文认为, 微信书写在小说中承担了多重叙事功能: 作为情节的加速器与省略器, 实现时空的高效转换; 作为人物的速写板与内心透视镜, 外化性格与心理; 作为跨媒介的叙事拼贴, 打破文本同质性并制造批判间距。同时, 微信的碎片化、表演性及公私域混淆等特征, 精准隐喻了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的浮泛、真实性的消解、权力资本的渗透以及个体在流动现代性中的无根状态。通过对微信这一微媒介的文学化运用, 贾平凹实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当代转化。

关键词: 贾平凹; 《河山传》; 微信书写; 叙事功能; 时代隐喻; 媒介融合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91>

On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Metaphor of the Era of WeChat Writing in *He Shan Zhuan*

Yin Danyang^{1*}

(¹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Shanxi, 750011, China)

Abstract: Jia Pingwa's extensive incorporation of WeChat chat records in *He Shan Zhuan* represents not only an innovation in narrative technique but also a profound response of realist literature to a highly mediatised real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Chat writing serves multiple narrative functions in the novel: it acts as an accelerator and ellipsis for the plot, enabling efficient shifts in time and space; it serves as a sketchpad and a psychological lens for characters, externalizing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inner worlds; and it functions as a cross-media narrative collage, breaking textual homogeneity and creating critical distance. Simultaneously, the fragmented, performative, and boundary-blurring (public/private) characteristics of WeChat accurately metaphorize the superficia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dissolution of authenticity, the infiltration of power and capital, and the rootless state of individuals within liquid modernity. Through the literary application of the micro-medium WeChat, Jia Pingwa achieves a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realist aesthetics.

Keywords: Jia Pingwa; *He Shan Zhuan*; WeChat writing; Narrative function; Metaphor of the era; Media convergence

引言：新媒体语境下的现实主义转型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始终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同频共振^[1]。从《废都》的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到

作者简介：尹丹阳（1997-），女，宁夏银川，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社会语言学

通讯作者：尹丹阳，通讯邮箱：ydy1519@163.com

《秦腔》的乡村文明挽歌，其创作轨迹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2023年出版的《河山传》，以其对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图景的史诗性描绘，成为其文学序列中又一重要坐标。这部作品在承继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展现出显著的叙事创新——大量嵌入微信聊天记录等新媒体文本。

邵燕君指出，在网络时代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要求作家直面媒介变革对社会的重塑^[2]。《河山传》中的微信书写正是这种创作意识的体现。它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技术尝试，更是传统文学形式在面对高度数字化、媒介化的社会现实时所做的叙事策略调整。微信作为集即时通讯、社交网络、支付等功能于一体的“超级应用”，其独特的文本形态（短句、表情包、语音等）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新材料，也提出了新挑战。

目前关于《河山传》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物谱系、时代记录功能及“河”与“山”的意象象征等宏观层面，而对贯穿始终的微信书写现象尚缺乏系统专论。本文据此立论，聚焦于小说中的微信书写，旨在深入剖析其承担的具体叙事功能，并挖掘其如何超越工具性层面，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隐喻，折射出深层的时代精神与集体心理。

1 情节的加速器与省略器：微信的叙事动力学

1.1 时空压缩与叙事效率

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中，情节推进与时空转换往往依赖详尽的场景描写与叙述连缀。而《河山传》时空跨度宏大，从乡村到都市直至海外，时间纵贯四十余年，若沿用传统手法极易导致篇幅冗长。微信书写的引入恰为其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叙事动力学”。微信的即时性在叙事上转化为“瞬间抵达”的效果，极大地压缩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比例。

例如，在描写洗河在西安的奋斗历程时，其与罗山公司的商业往来、人际关系的复杂变迁，常通过几屏微信对话便得以呈现。一个原本需要数页书信往来或多次会面才能交代清楚的合作意向，在微信对话中被快速推进。这种处理不仅精准模拟了当代商业社会高效（乃至仓促）的节奏，更在结构上形成了密集的“信息节点”，使叙事得以跳过冗余过渡，直接切入关键冲突与命运转折，实现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效果。

1.2 幕后信息的潜流通道

微信作为一种相对私密的通讯工具，在小说中成为披露幕后信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渠道。杨光在探讨文学与新媒体的融合时指出，新媒体文本的嵌入往往能揭示主流叙事之外的“潜流世界”^[3]。这一观点在《河山传》中得到充分印证。

小说中许多关于官员仕途动向、政策内部风声、商业对手弱点的“软信息”，并非通过公开场合或全知叙述揭示，而是在微信点对点的交流中悄然流转。这种叙事策略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它增强了情节的真实感与悬念感，使读者如同窥视者般同步获取推动故事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它巧妙构建了一个与台前表演相对的“幕后世界”，暴露了社会运作中依靠潜规则与暗流驱动的本质。微信因而成为驱动这个庞大故事机器运转的隐形齿轮，权力与资本的真正博弈正是在这些加密信息的传递与发酵中完成。

2 人物的速写板与内心透视镜：微信的个体维度书写

2.1 语言风格与身份表征

微信不仅是情节工具，更是贾平凹塑造人物的利器。在有限篇幅内勾勒从底层小人物、乡村精英到商人、官员、艺术家的庞大人物群像，微信语言以其独特的个性化特征，承担了为人物“写意速写”的功能。每个人物的微信用语习惯成为其身份、性格与教养的直接外化。

商人罗山的微信消息常常言简意赅、充满指令性，“办妥”“速来”等短句折射出其精明、务实与强烈的掌控欲。某些附庸风雅的官员或艺术家的微信，则夹杂着看似深奥实则空洞的文艺腔调，或频繁使用山水画、古董照片类表情包，暴露其矫饰与虚荣。尤为精彩的是对洗河微信语言流变的刻画：从其早期微信的直白、略带粗粝，到逐渐融入城市精英圈层后开始使用网络流行语与商业术语，这一语言上的“进化”本身便是其身份流动与文化适应的生动写照。这种“闻其微信，如见其人”的手法，实现了在有限篇幅内对人物核心特质的高效塑造。

2.2 数字面具下的心理真相

更深一层，微信书写成为探照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强光。其非面对面的特性，既为人物提供了情感宣泄与秘密吐露的通道，也成为了其进行自我表演的舞台。这一双重性使得微信同时承担了“内心透视镜”与“社会表演台”的功能。

在小说中，角色在深夜发出的充满迷茫、孤独或欲望的文字，可能与其白天的公众形象判若两人。洗河在都市奋斗中的焦虑、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对罗山既依赖又疏离的矛盾心态，许多都通过其与特定对象的微信私聊得以流露。这些时刻，微信屏幕仿佛成了人物内心的投影仪。与此同时，人物在微信群与朋友圈中精心编辑的内容，则往往是经过美化的“人设”塑造。小说中不乏人物晒出读书、品茶、参加高端论坛的照片，而其实际生活可能与此相去甚远。贾平凹通过记录这种表演性内容，并与其人物的实际行为进行对照，不动声色地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与精神空虚，完成了一种微妙的反讽批判。

3 跨媒介的叙事拼贴：微信的文本政治与美学效果

3.1 杂语共生与文本现实感

《河山传》中微信书写的广泛运用，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的叙事实践。它将数字时代的异质文本形态直接“拼贴”进传统的小说线性叙事中，产生了独特的文本政治与美学效果。微信聊天记录的嵌入，首先打破了小说叙述语言的同质性，引入了由网络用语、口语、行政腔调、表情符号等构成的杂语系统，与贾平凹式的、带有乡土气息与文人沉思的文学语言形成并置与碰撞。

这种杂语性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杨庆祥在论及新世纪小说的媒介意识时指出，当代现实本身就是由多种媒介、多种话语共同建构的复合体^[4]。《河山传》的叙事模仿了这种经验，让读者在阅读文学描写的同时，直接“看到”人物手机屏幕上的对话，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种跨媒介拼贴本身构成了一种隐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是由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媒介的碎片化声音嘈杂地组合而成。微信文本不是小说的点缀，它就是小说所要反映的那个“现实”本身的一部分。

3.2 同离效果与批判性阅读

然而，这种拼贴并非无缝融合。微信记录通过不同的字体、格式（显示时间、头像等）与正文形成视觉断裂，制造出类似于布莱希特“同离效果”的阅读体验。当读者的阅读流从流畅的文学叙述突然切换到格式化的微信对话时，会产生一种短暂的停顿与疏离。

贾平凹巧妙地利用这种效果，实现了一种冷静、客观的叙事姿态。他并不急于对微信中呈现的荒诞、虚伪或浮躁进行直接的道德评判，而是通过将其“原件呈现”，把评判的权力交还给读者。叙述者仿佛一个档案管理员，只是忠实地收录了这些时代的“数字文献”。其冷峻的笔调与微信内容自身所携带的情感温度（无论是热情、焦虑还是冷漠）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迫使读者去思考、去辨析，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微信书写因此不仅是再现现实的手段，更是一种组织读者反应、引导批判性阅读的叙事策略。

4 浮泛时代的隐喻：微信书写的病症学

4.1 碎片化生存与真实性危机

贾平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微信书写，精准地捕捉并隐喻了其所代表的交流方式背后，整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与感觉结构。微信对话的典型特征是碎片化：短促的句子、频繁的话题转换、被其他信息打断的交流，这一切都被忠实地记录在小说叙事中。这种碎片化的交流模式，隐喻了当代人注意力涣散、思维难以深化、交往流于浅表的普遍状态，揭示了我们正身处一个“浮泛的时代”。

同时，微信交流中弥漫的表演性导致了一种普遍性的“真实性危机”。当人物习惯于在数字面具后生活时，真诚的交往变得困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随之稀薄。《河山传》中许多人际的误解、合作的破裂、情感的错位，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基于表演而非真实的交往模式。微信，于是成了这个“人人都是演员”的社会的微型剧场，以其文学呈现迫使我们反思自我在数字

媒介中的异化状态。

4.2 权力渗透与悬浮共同体

微信还深刻反映了公私领域的边界溃散。工作与生活、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在微信中变得模糊，权力与资本的运作借此渗透至个体的日常私域。小说中，官员通过微信而非正式文件交代事项，商人通过微信群建立和维护利益同盟，各种请托、关系、资源的交换在看似私密的微信聊天中悄然完成。微信成了权力和资本延伸的“毛细血管”，它将原本可能局限于特定场合的社会博弈，扩散至24小时不间断的全天候状态。

此外，微信构建的各种“数字共同体”（如老乡群、公司群、兄弟群）呈现出脆弱与悬浮的特质。它们基于特定的利益或短暂的情谊而建立，也可能因一言不合而迅速解散或陷入沉寂。这与基于地缘、血缘的传统共同体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地呼应了齐格蒙特·鲍曼所描述的“流动的现代性”特征^[5]。小说主人公洗河从乡村到城市，在不同行业、不同社交圈层间穿梭流动的人生轨迹，正是这种现代性的绝佳体现。微信作为其维系旧关系、建立新联系的枢纽，既是这种流动生活的工具，也是其象征——它提供了一个“永远在线”的连接承诺，但这种连接却无法提供稳固的归属感，反而加剧了个体“身在何处”的茫然与无根感。小说结尾弥漫的苍凉与虚无，与此种由技术加速的、悬浮的生存状态密不可分。

5 结论：新媒体时代的现实主义生命力

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对微信书写的文学化运用，是一次兼具洞察力与艺术勇气的叙事实验。在叙事功能层面，它以其高效与灵活，承担了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与结构创新的多重任务：作为情节的加速器与省略器，实现了宏大时空背景下的叙事经济；作为人物的速写板与内心透视镜，以极简笔触勾勒时代群像并探入心理暗区；作为跨媒介的叙事拼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语言同质性，并通过制造同离效果引导批判性思考。

在时代隐喻层面，微信书写更超越了其工具性，上升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它那碎片化、表演化的文本形态，精准地隐喻了信息时代人际交往的浮泛与真实性的消解；其混淆公私域的特点，暴露了权力与资本在社会毛细血管中的渗透与运作；而其构建的悬浮的数字共同体，则深刻地揭示了“流动的现代性”中个体的无根与茫然。

通过“微信”这一微小的媒介切口，贾平凹成功地将其现实主义的笔触深入了当代生活的核心。他让我们看到，文学的现实主义不仅是描写田野与工厂，记录重大的社会事件，它同样需要有能力去捕捉和阐释那些构成我们日常感觉结构的新技术、新媒介与新经验。王德威曾评价贾平凹创作中“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6]，而在《河山传》中，这种声音与“数字化时代的叙事创新”形成了奇妙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河山传》不仅是一部关于“河”与“山”的史诗，更是一部为“信号”与“屏幕”时代的我们，所立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学备忘录。

参考文献：

- [1] 贾平凹. 河山传[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3.
- [2] 邵燕君. 在网络时代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4(1).
- [3] 杨光. 叙事学视野下的文学与新媒体融合研究[J]. 文艺理论研究, 2019(5).
- [4] 杨庆祥. 论新世纪小说的媒介意识与叙事新变[J]. 文学评论, 2020(4).
- [5] 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6] 王德威.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J]. 当代作家评论, 2015(3).

唐代河南元氏佛、道信仰研究——以出土墓志为阐释中心

陈阳阳^{1*}

(¹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 710127)

摘要: 唐代以降, 河南元氏家族开始转型, 家族部分成员便呈现出由尚武转向崇文, 修持宗教信仰的倾向。元氏家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为佛、道两家, 这样的倾向一方面是统治者推崇使然, 另一方面与时代风气、家风的转变密切相关。考察传世文献与出土墓志, 发现这些修持者多为女性, 她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能将佛、道典故融于文学创作中, 在家庭中也多以母亲的角色担任教育职责。在家庭教育中, 这些女性修持者不仅通过言行举止, 将自身修持与文学修养浸润于子女教育, 更通过亲身实践将佛、道思想融入家族文化中。

关键词: 唐代; 河南元氏; 佛教信仰; 道教信仰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06>

Research on Buddhist and Taoist beliefs of Yuan family in Henan during Tang Dynasty—— taking unearthed epitaphs as the center of interpretation

Chen Yangyang^{1*}

(¹ Northwest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Tang Dynasty, the Yuan family in Henan began to transform,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family showed a tendency to shift from martial arts to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 The family's predominant religious beliefs were Buddhism and Taoism, a trend influenced by both imperial endorsement and evolving social norms. Analysis of surviving texts and unearthed epitaphs reveals that these practitioners were predominantly women—well-educated individuals who skillfully integrated Buddhist and Taoist teachings into literary works while assuming educational roles within their households. In family education, these female practitioners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ir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literary refinement through daily conduct but also actively incorporated Buddhist and Taoist philosophies into clan culture through personal practice.

Keywords: Tang Dynasty; Henan Yuan family; Buddhist faith; Taoist belief

引言

婚姻与仕宦是研究唐代家族变迁的关键, 除却婚宦, 宗教信仰也是家族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陈寅恪言及“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 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 此为治史者之常识, 此无待赘论也。”^[1]关于河南元氏家族的研究, 较早的有余静《唐代河南元氏家族研究》^[2], 新近有纪振宇《唐代元氏政治地位变迁研究》^[3], 最新论著为陆路《北朝唐代元氏家族研究》^[4-1]。从先行研究来看, 余静研究涉及元氏家族的仕宦、婚姻、文化、经济和家族转型, 但鉴于篇幅, 各章节均未能做深入分析。纪振宇从仕宦和婚姻角度分析元

作者简介: 陈阳阳 (1999-), 男, 河南许昌, 硕士, 研究方向: 唐代文学、史学、碑刻文献学

通讯作者: 陈阳阳, 通讯邮箱: 13523285913@163.com

氏家族在唐代的政治变迁，进一步弥补了余静中的不足。陆路详考元氏自北朝以来的支系、婚姻，枚举成员的文学成就，进一步细致地梳理了元氏的历史发展脉络。各家研究各有承继，且能有新见新知，但是对于佛、道宗教信仰的专题研究尚未涉及。

唐代佛、道盛行，宗教的盛行造就了独特的士人生活空间，士族文人也被包围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中。以唐代关内道为例，其地有佛寺 251 座，仅京兆府中便有佛寺 218 座^[5]。长安佛寺数量之多，聚集之密，不仅有着文化示范性，也彰显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在此背景下，考察分析元氏家族成员的宗教信仰，可进一步了解唐代元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修养和子女教育。

1 河南元氏对佛法的修持

唐代河南元氏家族，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信仰佛教者分别为叶县公元夫人、冯琼夫人元氏、元婉、元复业夫人权氏和徐放夫人元氏。

叶县公元夫人，隋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元迪之后裔，十三出嫁，武德二年（619）去世，永徽六年（655）与丈夫崔氏合葬，终年六十七岁。出土墓志记载了元夫人的显赫家世、佛法的信仰。志文“敦弘内则，迥向法门。蔬食素衣，终身不坠。”^[6]元氏最后的人生选择，是以佛法来坚持本心、充盈心境。此墓志为担任沔州刺史的第四子撰文，志文中虽未言明母亲是否因修持佛法出家为尼，但其内容已传达出元夫人对佛法修持、盈持和追求清净淡泊的生活方式。

冯琼夫人元氏，河内侯元局之后裔，永淳元年（682）离世，享年八十三岁。志载：“顿口玄风，躯四主于正觉。凝姿净土，衍十诫之微言。”^[7-1]顿口是闭口不言之意，玄风是玄妙的法理、法风，正觉是圆满觉悟之意。净土是极乐世界的指代，十诫则指“十善业”。《资治通鉴》载：“其为沙门者，初修十诫，日沙弥，而终于二百五十，则具足成大僧。”^[8]十诫是僧人修法的必修课。这段志文带有浓厚的佛教气息，体现出冯夫人对佛法的虔诚供养。

元婉，亳州城父县令玄祐之女，天宝五载（746）去世，终年六十七岁。墓志详细地记载了元婉受戒、持经、定旨的历程。志载：“开元十七年诣天竺寺崇昭法师受菩萨戒，持金刚经，转涅槃经，于大昭和上通戒得禅定旨。又于寿觉寺主惠猷禅师受具足戒。于弘正惠干禅师皆通经焉。戒珠光明心地清净。”^[9]开元十七年（729），元婉受菩萨戒。菩萨戒是大乘佛法的戒律，其核心是修行者通过“止恶—修善—度众”的修行方式，实现从此岸到达彼岸，修成正果直至成佛。元婉修持了《金刚经》《涅槃经》，又向大昭僧侣学习戒律、领悟禅定要旨，并在寿觉寺主持惠猷禅师那里受足戒，在弘正惠干禅师那里通习佛法经典。最终达到了内心清净、心无杂念的境界。元婉的丈夫去世较早，由元婉独自一人抚养孩子长大，因而这也被称为孤儿寡母的教育——寡母教孤。西北大学李浩教授在“寡母教孤”上做过论述，他认为士族寡母大多学养深厚、他们有着完备的文化教育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在教育过程中其自身的修养、学养、学识都会对子女产生一定的影响^[10]。元婉作为家庭教育者，她的修佛行为也会对子女的成长教育产生影响。

元复业妻权氏，是权崇基之孙，权上相之女，天宝十四载（755）去世。“孀抚诸孤，更慈于母训。深精贯花之句，遽兴就木之悲。”^[11-1]是关于元复业妻权氏对子女教育和对佛法的表述。志载元复业开元廿八年（740）去世，离世后由权氏独自一人抚养子女。志文中的“贯花”是佛教用语，源自于佛法灵异用于说明佛法与说偈之音。碑志文献中贯花之句最早见于张衡《沧州弓高县实性寺释迦像碑》“贯花之句，光如水上之莲。”^[12]贯花之句指契合佛法，可以引导众生修炼开悟的言辞。莲花的光芒如虚如幻，暗指佛法言辞能够超越表象，指向终极真理。志文的表述表明权氏对佛法经典了解的深入。

徐放夫人元氏，太傅元琇与广陵郡高氏之后裔，大和九年（835）离世，享年六十一岁。墓志记载了徐夫人元氏皈依佛法及其子嗣对佛法的修持与弘扬。“既而继丧三良子，秘书薨没，爱女从其夫，悲伤忧迫，遂洁斋事浮屠法，复诣其指，归以自解。”^[13-1]志载元氏子嗣、亲友离世，爱女外嫁，她经历了重大精神创伤后，选择在佛法中寻求精神自解和心灵慰藉。又“子弘休，前苏州长州主簿；宰，前池州青阳主簿；咸以学行绳其家。独德祥方葱而剃，从浮屠居。”^[13-3]徐弘休、徐宰、徐德祥分别是徐夫人元氏的三个孩子，这三人从事职业与生活轨迹迥异。徐弘休、徐宰任职州县主簿，遵循了传统的仕宦之路。三子徐德祥则是“方葱而剃，从浮屠居”，他在成年以后并没有参与科举，而是选择修持佛法，并出家为僧。

河南元氏佛法修持者均为女性，她们在家庭中担任着子女教育的职责。元婉、元复业夫人权氏、徐放夫人元氏，她们的丈夫都较早离世，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是缺位的。此时，母亲便是家庭

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因而母亲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修养对子女产生影响深远。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元婉经历了受戒、持经、定旨，成为了正式的僧尼，但是离世后并没有采用塔葬。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她修持佛法并非是遁入空门，而是在佛法世界中寻求心灵安慰和精神慰藉。

2 河南元氏对道教的修持

唐代河南元氏家族，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信仰道教者分别为元丹丘、元镜远妻荥阳郑氏、元淳、元淳一和元濬。

元丹丘，北魏河南元氏之后裔，活跃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担任西京长安大昭成观威仪，生卒年未详，事迹和生平多见于李白的文集。另有《玉真公主祥应记》碑，此碑为元丹丘所建。元丹丘并无文集传世，李白与元丹丘的交游诗文成为了解元丹丘的重要文献。

诗文清晰地记载了他的生活空间和交游圈。开元十九年（731），李白初次拜访元丹丘居所，《题元丹丘颖阳山居并序》^[14-1]及《题元丹丘山居》^[14-2]写元丹丘的生活环境，“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14-3]此地环境清幽，云雾缭绕。关于丹丘的形象，李白言“元丹丘，爱神仙。”“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14-4]诗句展现出了元丹丘作为道教徒飘逸的形象。开元廿九年（741），元丹丘奉诏入京，次年担任长安大昭成观威仪，后举荐李白入朝。次年，李白便以道教徒及文学身份二入长安待诏翰林^[15]。天宝元年（742）至三载之间，元丹丘与李白亦有诗文唱和。天宝二载（743）李白作《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14-5]，三载（744）作《以诗代书答元丹丘》^[14-6]《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14-7]。《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为唱和之诗，当有元丹丘寄诗于前，李白以诗代书唱和为后^[13-3]。元丹丘和李白的再次重逢则是天宝十载（751），其年秋两人相见于石门山（今河南鲁山石人山），李白作《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纪之^[14-8]，后二人又在方城寺相遇，李白作《元丹丘方城寺谈玄》^[14-9]。此后，元丹丘经历及卒葬未见有文献记载。作为北魏皇室后裔，元丹丘从“宗室后裔”到“道教威仪”，身份转变折射出唐代士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的互动融合。

元镜远妻荥阳郑氏，陕州平陆县令郑岳之女，大历四年（769）去世，终年六十三岁。“夫人师心道流，早弃华丽，薰茹不味，日唯一饭者，卅年于兹矣。诚宜天祐其福，享以永寿，何神理之不明，而丧此贞善。”^[17]志文记载了郑氏的信仰修持。“早弃华丽，归心道门”言郑氏潜心归道，禁欲苦修，坚守道心。从志文的记载可以了解到郑氏的生活方式，看到当时社会对“修道者”的价值认同，即摒弃浮华，坚持清修。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修持是道教徒真善品性的象征。

元淳，女道士，约大历至大和年间在世，善诗，有才名，现存诗七首^[18-1]。六首全诗为《秦中春望》《寄洛中姊妹》《感兴》《闲居寄杨女冠》《送霍师妹游天台》《寓言》，另有残诗《感春》，仅存十二字^[18-2]。据诗作内容，可知元淳主要生活空间为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寄洛中姊妹》和《感兴》对安史之乱的记述可以补史证史，她以女性视角记下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创伤。

“废业无遗迹，仙都寄此身。弟兄俱已尽，松柏问何人。”^[18-3]《感兴》从“废业”写到“弟兄尽”再到“问松柏”，层层递进，写出了诗人“无家可依、无有至亲、无处寄身”的悲凉境遇，这不仅是纪实之作，更是一幅生动的安史之乱时期的百姓流亡图。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在元淳笔下凝结为“谁堪离乱处，掩泪向南枝”“弟兄俱已尽，松柏问何人”的个体悲鸣，这不仅印证了《旧唐书》“宫室焚烧，十不存一”^[19]的宏观记载，更以个体的女性视角记述战乱带给百姓的苦难。道家思想主旨，在《送霍师妹游天台》中体现的较为明显。“上元金胜何处在，阿母桃花几度开。”^[18-4]诗人采用主客问答，将神话人物与世俗之人对谈，实现了道教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温情交融。元淳以“问上元”“想阿母”的对话式笔触，将高远的神仙信仰转化为女性间的私密情感交流，实现了信仰表达的生活化表述。

元淳一，女道士，西京至德观观主，大历年间（776-779）归真。志载：“尊师大开顿悟，神假词华，龀岁而日诵万言，笄年而遍览三教，□驰出俗之虑，独蕴登真之想……天宝初，度为女道士，补至德观主。……大历中，竭来河洛，载抱沉痼，粤以□□年七月三日返真于东都开元观，春秋六十有□。”^[7-2]这是一份记载颇为详细的女冠私家档案。自幼年时元淳一便熟读道家经典，及笄之年遍览“三教”。天宝初年，元淳一受箓成为一名女道，并任职于西京长安至德观。大历年间，元淳一法师于河洛地区不幸染病，后归真于此。从世俗修道到至德观主，元淳一的经历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对女性的包容，以及唐代社会对道教的尊崇。此外，墓志的行文和用语也迥异，去世以后称之为“归真”，意为“返璞归真”，这也是道教生命观的体现。

元濬，一生未入仕，以处士称之，婚娶崔氏，生育一子六女，贞元廿年（804）去世，享年五十。元濬一生未仕，专于修道，墓志记载了他的生平和修道经历。五岁读《孝经》，二十精通道家经典。思想转向道家后“乃喟然叹曰：老子真吾师也！”^[11-2]三十岁时，出入山林，探奇访幽，颇具道家风范。我们在元濬身上看到的，是儒家和道家相融的文人思想。在元濬的成长过程中，道家思想对其成长和人生选择有着深远影响。

道教信仰者中值得推敲的是女冠元淳与元淳一的身份问题。两人生平相似，元淳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浓重的修道心境，元淳很可能是元淳一的简称，故推测元淳可能就是元淳一。若将墓志与诗作相合，勾勒的则是这个元氏女道士完整的一生，只可惜文献不足征也。虽元淳诗中有她作为女冠的记载，但是元淳一的墓志中除却生活经历、女冠生活、西京至德观主的身份外，并未提及其善诗文^[4-2]。若能有新出文献佐证，则可补史实阙失之憾。

3 佛、道修持者的文学修养与家庭教育

元氏家族成员佛、道的信仰者，他们精深佛、道经典，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其诗文创作也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这些女性修持者在家庭中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自身的文化修养对子女成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3.1 佛、道修持者的文学修养

从文学造诣来看，元淳是出类拔萃者，她的诗作记述了所处时代的繁华、文化的兴盛，也记述了安史之乱后百姓的乱离。元淳目前存诗七首，题材包括五、七言绝句、律诗，内容涵盖写景、抒情、叙事、感怀、修道、交游、饯别，诗歌兼备众体且感情抒发和遣词造句都别具一格。

《秦中春望》据其内容，乃知是居于长安时作。“上苑雨中树，终南雾后峰。落花行处遍，佳气晚来浓。”^[18-5]这两联描绘出雨后的长安春景，落花行遍，春意渐浓。尾联“喜见休明代，霓裳蹑道踪。”^[18-6]休明代为对盛世繁华的表述，是借景抒情表现对长安及其时代的称赞。《寄洛中姊妹》《感兴》前文已述，应当是安史乱前后所作，借废业荒园诉说战争的伤害，以及兄弟姊妹在乱离中的生活。这与杜甫天宝末年的纪实、感伤之作具有相同的作用。

《闲居寄杨女冠》^[18-7]《送霍师妹游天台》^[18-8]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遣词用语皆为道教用语。“青冥”“鹤唳”“杳蔼瑶台”“丹灶芝田”“鹤”“上元金胜”“阿母桃花”这些词汇都融汇了道教的典故，元淳能将其熟练运用，并付诸诗作，将诗文创作和宗教经典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诗作体现出元淳文学造诣与道教修持之深。

《寓言》^[18-9]是感怀、寓言诗作，具有讽刺意味。诗句借景抒情，托物比兴，细致入微地描述出宫廷女性的精神状态和情绪，这是一种惆怅、无助和失落。这种讽刺意味的表达，再结合此诗《寓言》的标题，极有可能是对天宝遗事的隐晦表述。那么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当为天宝之后。最后一首残诗《感春》^[18-10]为抒情之表达，因阙字太多难以明了诗意，但根据“莺”“燕”“怨心事”等词汇可知大概为感时伤春之作。

元淳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文学成就，是时代风气、家族传承以及文学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唐代科举推动了社会对文学的追求，形成了浓郁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是家学、家风的演变。亦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平仄二元化取代永明体四声八病，唐诗又融合南北朝文学之气韵，从而兴寄与风骨兼备。在多种影响下，元淳写出了风清骨峻、含蓄蕴藉的诗文。

3.2 佛、道修持者的家庭教育

唐代河南元氏，经检索，共得出土墓志 155 篇。男女占比来看，志主为男性的墓志有 113 篇，志主为女性的墓志有 42 篇，男性志主墓志占比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在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中，佛、道修持者共有 11 人，男性 2 人，女性 9 人，女性占比超过了修持者总数的五分之四。可以看到，元氏家族女性佛、道信仰者占比与其在总志中的占比形成强烈反比，总数不足三分之一的女性构成了佛、道修持者的主体。

这些修持佛、道的元氏家族女性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可以识字、诵读、明经（宗教经典）。家庭中她们是母亲，亦是教育的主要角色。唐代有宦游之风，当丈夫异地为官时，这些女性便独自承担起子女的家庭教育。另外一部分，由于丈夫的英年早逝形成了孤儿寡母的家庭教育形态，即“寡母教孤”。在子女的家庭教育上，她们首要目标是希望后代可以诗赋取士，获得功

名。这不仅仅是元氏家族女性的期望，也是当时社会的共同追求。其次，这些担任家庭教育角色的母亲，本身的文化素养和知识体系对子女也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在志文中看到，当母亲是佛、道修持者时，子女人生发展道路除了考取功名外，也会选择信仰佛、道，作为另外的安身立命之所。如徐放夫人元氏，在她的教育下，其子徐德祥“方葱而剃，从浮屠居”，徐德祥的人生选择与母亲日常教育的潜移默化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教育下，在有着宗教信仰家庭中成长的成员便具有了“世俗功名”和“精神超越”的多重选择。他们首要以家族荫庇和科举考试作为人生发展方向，当这条路遇到困境或者重重阻碍时，便选择遁入空门、道门，寻求精神解脱。这些选择并非是个体的直接选择，而是有着宗教信仰文化底色的母亲在教育子女时，不自觉地将个人期许、生存焦虑、家庭期望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中。

4 结语

综上，河南元氏家族佛、道修持者呈现出女性主导与世俗追求的特征，宗教信仰的实践有着独特的家学特征和鲜明的时代烙印。元氏女性在宗教信仰的修持中占据大多数，在家庭教育中也占据主导地位。这打破了我们固有认知，当士族女性在开放、包容的时代风气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们也可以如士族男性一般，积极的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来。元氏家族成员修持佛、道信仰与唐代皇室宗教政策也遥相呼应，李治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借助佛教为自己的皇权强化正统，玉真公主作为道教的修持者，以女性和皇族的身份入道。上行引发下效，统治者的这些行为都为元氏家族女性参与宗教活动提供了典范，从而形成了政策引导，士族响应的双方互动。此外，修持者的归葬方式是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剥离，她们死后遵循着与配偶合葬，归附祖茔的世俗礼法，并未严格依照宗教埋葬方式。以此，可知佛、道修持者更多是出于修身养性之目的。元氏修持者也普遍具备识文断字的能力，他们可以阅读佛、道经典，也可以独立创作具有“丹灶”此类宗教色彩的诗文，志铭用语里也有着鲜明的宗教烙印。这类具备文化素养与宗教学识的元氏女性，以修持佛、道为生活方式，将学识素养、个人期许融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形成了宗教气息浓郁的士族家庭，推动了家族家风的转型。如此看来，元氏家族的佛、道信仰研究，为我们理解唐代元氏家族的文学修养、家庭教育和家族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案例。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227-228.
- [2] 余静. 唐代河南元氏家族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 [3] 纪振宇. 唐代元氏政治地位变迁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 [4] 陆路. 北朝唐代元氏家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
- [5] 李芳民. 唐五代佛寺辑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1-45.
- [6] 西安市文物稽查队. 西安新获墓志集萃[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45.
- [7] 周绍良, 赵超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8] 司马光编著,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M]. 中华书局, 2011: 6002.
- [9] 文物研究所,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 (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203.
- [10] 李浩.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15-223.
- [11] 周绍良, 赵超编. 唐代墓志汇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2] 周绍良主编. 全唐文新编[M]. 第1部第3册,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2017.
- [13] 中国文物研究所, 千唐志斋博物馆编.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 (叁)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220.
- [14] 李白撰, 安旗主编.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5] 戴伟华. 李白自述待诏翰林相关事由辨析[J]. 文学遗产, 2009(04): 32-37.
- [16] 郁贤皓. 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J]. 河南大学学报, 1981(02):108.
- [17] 董诰编, 孙映逵校注. 全唐文[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2659.
- [18] 陈尚君纂校. 唐五代诗全编[M]. 34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65-68.
- [19]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457.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研究——以衡水地区为例

范记川^{1*}, 周帅¹, 王冬桂¹, 李晓倩¹, 王鹏²

(¹ 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教学部, 河北省 衡水市 053000; ² 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 教师发展中心, 河北省 衡水市 053000)

摘要: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方面, 可借助地方红色文化这一承载革命历史与精神内涵的资源, 丰富教育内容与形式。衡水地区蕴藏较多红色文化资源, 并蕴含“敢为人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特质。以衡水地区高职院校为例, 通过探讨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与实施现状, 探索形成“资源—课程—实践—协同”四位一体的融合机制, 以期提升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 促进地方红色文化传承, 并为培养兼备家国情怀与专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参考。

关键词: 地方红色文化; 高职院校; 爱国主义教育; 衡水地区; 融入路径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23>

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of Integrating Local Red Culture into Patriot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Hengshui Area

FanJichuan^{1*}, Wang Donggui¹, Zhou Shuai¹, Li Xiaoqian¹, Wang Peng²

(¹ Hengshui Health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Department of Marxist Studies,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² Hengshui Health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Abstract: As a crucial aspect for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s," patriotic education can be enriched in both content and form by leveraging local red culture—a resource embodying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The Hengshui area is home to abundan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haracterized by the spiritual qualities of "daring to be pioneers, selfless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Taking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Hengshui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and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integrating local red culture into patriotic education. It aims to establish a four-in-one integration mechanism encompassing "resources,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基金项目: 衡水市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衡水红色文化融入衡水市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研究》
(HSS2024012)

作者简介: 范记川(1995-), 男, 河北邢台,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华北区域史

周 帅(1996-), 男, 河北衡水, 学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王冬桂(1981-), 女, 河北衡水, 硕士, 研究方向: 教育教学

李晓倩(1997-), 女, 河北衡水, 学士, 研究方向: 中国共产党历史

王 鹏(1996-), 男, 河北衡水, 学士, 研究方向: 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视觉

通讯作者: 范记川, 通讯邮箱: fjchxb123@163.com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red culture,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equipped with both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Keywords: Local red culture;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Patriotic education; Hengshui area; Integration paths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1]，为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指明方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涵，使之转化为激励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的强大动力”^[2]。因此，将红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有利于提升新时代高职院校传承红色文化、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3]。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其爱国主义教育成效直接影响国家产业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

地方红色文化是特定区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的精神结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实践性和感染力，既能避免爱国主义教育的“空泛化”，又能通过“本土故事”增强教育的亲和力与认同感。

近年来，关于“地方红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探讨成为学术热点问题，已取得颇为丰厚的成果^{[4][5][6][7][8][9][10][11]}。然而，在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细分领域，尤其是以衡水地区为具体研究对象时，相关研究尚显不足^[12]。衡水地区作为革命老区，其红色文化资源在高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有效利用。因此，以衡水地区为例，深入探讨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不仅是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的积极响应，也是推动衡水地区红色文化传承与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1 衡水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概况与育人价值

1.1 衡水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衡水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且特色鲜明，涵盖物质与非物质两大类别，形成了“革命源头、抗日烽火、建设探索”三大主题脉络。衡水全市拥有近百处红色遗址遗迹、纪念场馆、纪念碑亭及纪念设施^[13]，这些资源不仅见证了衡水地区革命历史的辉煌篇章，更为高职院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素材。

物质类资源是红色文化的直观载体，主要包括革命遗址、纪念馆、纪念设施等。如安平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衡水市烈士陵园、冀中军区司令部旧址、饶阳耿长锁纪念馆等，这些场所都是开展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地点，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实践场景。

非物质类资源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主要包括革命精神、红色故事、革命歌谣等。一是弓仲韬“敢为人先”的革命首创精神；二是“父送子、妻送郎”的“无私奉献”抗日精神；三是耿长锁为代表的“艰苦奋斗”建设精神。这些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一脉相承，是培育大学生爱国情怀的重要思想源泉，“有助于其将精力集中到国家建设、民族利益上，并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14]。

1.2 衡水地区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

衡水地区红色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与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高度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强化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衡水红色文化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历程。学习相关历史，能帮助学生理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宗旨；了解抗日根据地斗争史，可让学生感悟革命先烈“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惜牺牲的崇高精神；研究农业合作化实践，能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内容能够帮助高职学生

坚定“四个自信”，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家国情怀，增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15]。

其次，培育职业素养，提升实践能力。高职院校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目标，衡水红色文化中的实践精神与职业素养高度契合。相关实践中展现的“创新意识、责任担当、团队协作”能力，与当代高职学生所需的职业素养一脉相承；群众“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实践智慧，能够启发学生在专业学习与技能训练中勇于探索、解决实际问题。此外，组织学生参与红色遗址保护、红色故事宣讲等实践活动，还能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与社会责任感，为其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传承地方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衡水红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有机结合。通过学习地方红色文化，高职学生能深入了解家乡的历史贡献与文化特色，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进而激发传承地方文化的自觉意识。红色文化“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基石”^[16]，将衡水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衔接，能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文化认知体系，提升文化自信。

2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衡水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为全面了解衡水地区高职院校利用地方红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本文以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等高职院校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座谈等方式收集数据。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68份，有效回收率96%；访谈思政课教师20人、专业课教师30人、学生干部50人。结合调研结果与实际观察，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融入衡水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如下。

2.1 现状分析

第一，培育职业素养，提升实践能力。调研显示，85%的学生认为“学习地方红色文化对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有帮助”，78%的学生表示“愿意参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表明学生对地方红色文化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认同度较高。然而，在对衡水红色文化的具体认知上，多数学生对地方红色文化的认知停留在“听说过”的层面，缺乏系统了解与深度理解。

第二，教育形式初步探索，但融入范围较窄。当前衡水地区高职院校已开始尝试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但从融入范围来看，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思政课与党团活动中，专业课融入较少，校园文化建设中红色元素相对也较为匮乏。

第三，资源利用初步开展，但合作机制不健全。部分高职院校已与本地红色教育基地建立初步合作^[17]，但合作多停留在“参观打卡”的浅层层面，缺乏深度合作：一方面，学校未与基地共同开发校本教材、实践课程等教学资源；另一方面，基地讲解员多为兼职人员，缺乏针对学生的个性化讲解，难以满足教育需求。此外，学校与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协同机制也不健全，未能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育人合力。

2.2 主要问题

首先是资源挖掘碎片化，缺乏系统整合。当前衡水地区高职院校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多为“零散式”，未形成系统体系。一方面，对物质类资源的利用局限于“参观遗址、观看展览”，未能深入挖掘遗址背后的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对非物质类资源的整理相对不足，导致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难以充分发挥。此外，资源开发缺乏“高职特色”，未能结合高职专业特点，导致资源与教学脱节。

其次是课程融合表面化，缺乏深度渗透。课程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但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融入衡水高职课程体系存在“表面化”问题。首先，思政课融入缺乏系统性，多为“案例点缀”，未将衡水红色文化纳入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也未开发专门的红色文化校本课程；其次，专业课融入不足，多数专业课教师认为“红色文化与专业教学无关”；再次，课程评价体系未体现红色文化教育目标，学生的红色文化学习效果未纳入课程考核，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再次是教育形式单一化，缺乏创新体验。当前衡水地区高职院校开展的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形式较为单一，仍以“课堂讲解、参观学习、主题讲座”等传统形式为主，占比高达80%。而学生喜闻乐见的“红色情景剧、短视频创作、沉浸式体验”等创新形式占比不足20%。此外，实践活

动多为“一次性”活动（如清明节祭扫、纪念日参观），缺乏常态化、系列化的实践项目，导致学生参与热情难以持续，教育效果昙花一现。

最后是协同机制缺失，缺乏育人合力。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学校、政府、社会等多方协同，但当前衡水地区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首先，学校内部各部门协同不足，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之间缺乏沟通，红色文化教育“各自为战”；其次，学校与地方政府协同不足，政府部门在红色资源保护、政策支持等方面未与学校形成联动。这种多方协同的缺失，导致红色文化教育在衡水高职中难以形成强大的育人合力，影响了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3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衡水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衡水地区红色文化特色与高职院校教育实际，本文从资源整合、课程建设、实践创新、协同育人四个维度，构建“资源-课程-实践-协同”四位一体的融入路径，推动地方红色文化与高职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

3.1 资源整合：构建“特色化、系统化、专业化”的红色文化资源库

资源整合是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需围绕“特色化提取、系统化整理、专业化开发”三个方向，构建符合高职教育需求的红色文化资源库^[18]。

3.1.1 特色化提取，凸显衡水红色基因

据统计，衡水市约30%的红色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19]。针对这一现状，需从当地革命历史遗址、英雄人物事迹、红色文艺作品等多个层面着手，进而系统梳理出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红色文化核心内容。

3.1.2 系统化整理，形成资源体系

按“历史脉络+教育主题”整理衡水红色文化资源，有助于破解资源“零散化、无序化”的问题，让红色资源从“分散素材”升级为“可高效调用、能深度育人”的系统体系，为高职教育提供精准支撑：以时间轴为线索，梳理衡水地区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再到改革时期，形成清晰的历史脉络；同时，根据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将红色文化资源划分为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等不同主题板块，使各类资源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构建起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系。

3.1.3 专业化开发，对接高职专业

结合衡水高职专业设置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本质是打破红色资源“通用化开发”与专业教学“需求差异化”的脱节困境，让红色资源从“参观素材”转化为“专业育人载体”，契合高职教育“职业导向”的核心属性，以达到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专业教学的精准对接。

3.2 课程建设：打造“思政课引领、专业课融入、校本课补充”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红色文化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需构建“思政课引领、专业课融入、校本课补充”的立体化课程体系，推动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生血脉之中，促进红色文化入脑入心”^[20]。

3.2.1 思政课引领：强化红色文化教育主阵地作用

将衡水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红色教育在主阵地中“碎片化、浅表化”的问题，让思政课从“通用理论讲授”转向“地域特色与精神深度结合”的育人载体，真正扛起红色文化教育主阵地责任：首先，修订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在思政课程中增设“衡水红色文化”专题模块。其次，开发《衡水红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校本教材，系统收录衡水红色故事、历史事件及其精神内涵，并配套多媒体课件、案例视频等丰富教学资源。再次，创新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情境教学、小组研讨”等多种形式，切实增强学生的代入感。最后，改革课程评价体系，将学生对衡水红色文化的认知、理解与实践纳入思政课考核范围。

3.2.2 专业课融入：实现红色文化与专业教育的协同育人

推动衡水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教学，必须要让红色精神从“额外添加”转换为专业育人的“内

在基因”，进而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与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培养有机结合：首先，制定“课程思政”指南，明确各专业融入红色文化的重点方向及教学要求。其次，开展专业课教师培训，邀请党史专家和红色文化研究者为教师授课，提升教师挖掘红色文化与专业教学结合点的能力。再次，打造“红色+专业”示范课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课程案例。最后，组织专业课教师编写“红色+专业”教学案例集，收录各专业融入红色文化教学案例，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意识。

3.2.3 校本课补充：丰富红色文化教育内容

红色文化校本课程的开设，目的是弥补思政课“通用化”、专业课“专业化”的局限，从“地域深度”“个性需求”“情感共鸣”三个维度补充红色教育，构建更立体的育人体系：首先，设置必修课程《衡水红色文化概论》，系统梳理衡水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精神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并将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开设多样化的选修课程，以供学生根据兴趣选择；再者，定期举办“红色文化大讲堂”，邀请衡水党史专家、老党员及劳动模范走进校园，生动讲述衡水红色故事与他们的个人经历。

3.3 实践创新：开展“常态化、体验化、专业化”的红色文化实践活动

实践是红色文化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环节，需通过“常态化组织、体验化设计、专业化结合”，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获得感。

3.3.1 常态化组织，构建实践活动体系

构建“校内+校外”“日常+节点”的高职红色教育实践体系，核心是破解实践活动“碎片化、短期化”的痛点，让红色教育从“偶然开展”转为“持续浸润”，真正实现知行合一：首先，在校内日常实践中，开展常态化活动；其次，在校外日常实践中，与红色教育基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组织学生担任“红色讲解员”和“文化志愿者”，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清明节、建党节、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生开展“祭扫烈士陵园”“重走革命路”“红色主题党日”等活动；此外，利用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红色文化调研”和“革命老区帮扶”等社会实践活动。

3.3.2 体验化设计，增强实践活动吸引力

体验化设计是打破高职红色实践“单向灌输”困境、提升吸引力的重要环节，核心在于让学生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从而深化红色文化认知：首先，沉浸式体验，借助VR/AR技术，使学生“穿越”至历史场景，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其次，互动式体验，组织学生参与创作与表演，从而深入理解英雄精神。最后，创作式体验，开展活动，通过创作过程深化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3.3.3 专业化结合，实现实践与职业发展的衔接

将红色文化实践与高职学生专业实习、职业规划融合，关键是破解红色实践与职业发展“两张皮”的痛点，让红色教育从“额外任务”变为“职业赋能载体”，从而契合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本质属性。当然，我们所提到的“专业化结合”的本质，并非简单往专业学习中“加塞”红色元素，而是让红色文化成为连接“实践活动”与“职业成长”的纽带——既解决了红色实践“实用性不足”的问题，又为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最终实现“育人”与“育才”的深度统一。

3.4 协同育人：构建“学校-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多方协同，需构建“学校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的三位一体协同机制，形成育人合力。

3.4.1 学校主导：加强内部协同与资源统筹

学校作为红色文化育人核心主体，内部协同与资源统筹是突破教育碎片化的关键。若缺乏系统设计，易出现部门各自为战、教育与需求脱节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三方面努力：首先，成立“红色文化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思政部（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务处、学生处、各二级学院等部门负责人,统筹推进红色文化教育工作;其次,构建“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协同育人团队,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共同设计红色文化教育方案;此外,设立“红色文化教育专项基金”,用于红色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写、实践活动组织等,保障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3.4.2 政府支持: 提供政策与资源保障

市政府需为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精准支持,解决资源分散、保障不足等问题:第一,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对红色遗址进行修缮升级,丰富展览内容,配备专业讲解员;第二,出台支持政策,将高职院校红色文化教育纳入地方文化发展规划,对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成效显著的院校给予资金奖励;第三,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衡水市党史办、档案馆等部门的红色文化资源,向高职院校开放;第四,组织红色文化主题活动,邀请高职院校师生参与,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3.4.3 社会协同: 营造红色文化育人氛围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高职红色文化教育,本质是打破校园教育边界,破解校内资源单一、视角局限的核心困境,构建全员育人格局:首先,邀请老党员、老战士、劳动模范等担任高职院校“红色文化导师”,定期进校园开展讲座、座谈,分享红色故事与人生经历;其次,利用媒体平台宣传,衡水市电视台、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开设“衡水红色文化”专栏,报道高职院校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扩大教育影响力;再者,鼓励社会机构参与,为高职院校提供红色书籍借阅、展览参观等服务,创作红色主题的话剧、歌曲等文艺作品,丰富红色文化教育形式。

4 结论

地方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重要见证,是承载革命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独特育人资源,更是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依托。将其系统融入高职教育体系,既能破解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空泛化”“形式化”困境,通过具象化的红色资源增强教育感染力与实效性,又能推动地方红色基因的代际传承,助力培养兼具过硬技术技能与深厚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人才,契合高职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要求,真正让红色成为高职青年成长成才的鲜亮底色,为其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S]. 北京: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
- [3] 龚勋. 高职院校红色文化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探析[J]. 商业文化, 2021, (06): 18-19.
- [4] 如朱玥.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探赜——以海南省为例[J]. 新传奇, 2025, (17): 86-88.
- [5] 胡红丹, 王明, 张婷.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本地化探索与实践——以徐州为例[J]. 中国军转民, 2025, (05): 62-64.
- [6] 李海燕. 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J]. 中国军转民, 2024, (19): 108-110.
- [7] 王艳霞.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J]. 新传奇, 2024, (34): 89-91.
- [8] 朱玥. 红色文化融入当代高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策略研究[J]. 新传奇, 2024, (28): 83-86.
- [9] 景杨.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路径研究——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2, 21(22): 156-158.
- [10] 龚勋. 探析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1, 34(18): 93-94.
- [11] 李明昊.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意义及现状研究[J].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20, (09): 138-139.
- [12] 卢站桥. 以红色文化为载体夯实中职德育——以衡水科技工程学校为例[J]. 职业, 2017, (11): 98-99.

[13] 衡水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衡水红色印记[M]. 衡水: 衡水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2025: 211.

[14] 王远方. 高职教育传承红色文化的途径探究[J]. 船舶职业教育, 2023, 11 (01): 65-67.

[15] 胡红丹, 王明, 张婷.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本地化探索与实践——以徐州为例[J]. 中国军转民, 2025, (05): 62-64

[16] 朱玥. 红色文化融入当代高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策略研究[J]. 新传奇, 2024, (28): 83-86.

[17]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我院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举行签约仪式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EB/OL].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公众号, [2025-05-21]. https://mp.weixin.qq.com/s/dSBKIn5iUiRVHwW_PD_UNQ.

[18] 杨景.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路径研究——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2, 21 (22): 156-158.

[19] 张世淇. 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探析——以河北省衡水市为例[J]. 商展经济, 2025, (15): 59-62.

[20] 李海燕. 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J]. 中国军转民, 2024, (19): 108-110.

方言在胶东民俗文化中的多重社会功能及社会价值

郑婕^{1*}

(¹ 烟台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中文系, 山东省 烟台市 264005)

摘要: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 地方方言的传承面临严峻挑战。胶东地区作为山东半岛文化核心区, 胶东方言不仅承载着独特的语音系统与词汇结构, 更在民俗仪式、性别表达、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国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方言保护与语言资源开发”, 方言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本文以胶东方言为研究对象, 结合社会语言学、性别研究与文化认同理论, 系统探讨其在胶东民俗文化中的多重社会功能与现实价值。研究发现, 胶东方言在民俗仪式中具有“语言仪式化”特征, 性别语言差异体现社会文化结构的再生产; 方言作为“地方声音”的象征强化了居民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归属感。同时, 方言与城市文化协同发展, 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与文化软实力提升。本文旨在为地方语言保护、文化“两创”与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强调方言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方言; 胶东民俗文化; 文化传承; 社会功能; 社会价值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66>

The Multiple Social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the Jiaodong Dialect in Jiaodong Folk Culture

Zheng Jie^{1*}

(¹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Yant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gional dialect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Jiaodong Peninsula, the cultural core of Shandong, is home to the Jiaodong dialect, whose distinctive sound system and lexicon not only encode local knowledge but als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itual life, gender perform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With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explicitly calling for “enhanced protection of dialects and exploitation of language resources,” dialect studies have moved from the academic margins to the policy center. Taking the Jiaodong dialect as its focal point and 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sociolinguistics, gender studies, and cultural-identity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ultiplex social functions and present-day value of the dialect within Jiaodong folk culture.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dialect is “ritualized” in folk ceremonies, while gendered speech differences reproduce prevailing socio-cultural structures. As the “sound of home,” the dialect intensifies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local identity. Moreover, synergies between the dialect and urban-cultural initiatives

基金项目: 烟台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方言在胶东民俗文化中的多重社会功能及社会价值》(项目编号:YTSK2025-469)

烟台理工学院 2023 年度学术团队与研发团队、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烟台理工学院“数字传播研究学术团队”建设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23XSTD01)

作者简介: 郑婕 (1995-), 女, 山东威海, 硕士, 研究方向: 文学

通讯作者: 郑婕, 通讯邮箱: monvina1231@yahoo.co.jp

boost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enhance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local-language preservation, the “dual innovation” of culture and urban growth, underscoring the dialect’s pivotal role in negoti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Keywords: Dialect; Jiaodong folk culture; Cultural transmission; Social function; Social value

引言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地方语言的使用空间日益压缩，方言的传承面临严峻挑战。根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3）》^[1]显示，60岁以下人群中，能够熟练使用本地方言的比例已不足45%。然而，方言不仅是语言多样性的体现，更是地方文化认同、社会结构维系与民俗传承的重要媒介。胶东地区作为山东半岛的重要文化区域，其方言体系——胶东方言，隶属于胶辽官话，具有独特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结构，是胶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Ralph Fasold在《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中明确了方言与民俗传承的关系，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方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分析了民俗活动如何通过方言得以传承和发展。刘志伟在《胶东民俗与方言》中探讨了胶东地区的民俗与方言的关系并分析了其中的文化意义。何万顺的研究讨论了语言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并可能触及方言和性别语言使用的一般情况，结合语言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更全面地探索并总结性别在胶东方言实践中的体现方式及性别语言对于胶东文化发展的意义。本文以胶东方言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语言学、性别研究与文化认同理论，系统探讨其在胶东民俗文化中的多重社会功能与现实价值，旨在为地方语言保护、文化“两创”与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1 文化本体维度：传统内核的坚守与现代表达的创新

1.1 国家政策引领下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中央文件和重要会议多次强调民俗文化保护及其对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深入推进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2-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大会上，也强调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倡导以自信的姿态展现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并指出传统民俗文化在民族文化复兴中的核心地位^[3]；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讲话中，强调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视民俗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鼓励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在贯彻国家文化发展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与地方政策，围绕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标，研究烟台胶东地区方言的传承机制，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2]。

1.2 胶东民俗中方言的具体应用及社会功能的实现

对胶东方言中性别和特定语言使用现状进行分析。例如性别语言的特征方面，分析胶东方言中性别特定的语言表达，如词汇、语法、语音特征等，以及男女在使用这些方言特征上的差异；探索胶东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性别角色、传统观念、教育背景等因素对性别语言的使用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民俗仪式中的方言实践。在长岛“祭海节”中，方言不仅是仪式语言的核心载体，更承担着“人—神—海”三者沟通的媒介功能。例如，“开洋节”是胶东长岛渔民每年正月十三举行的海神祭祀仪式，全过程使用“老岛话”进行，形成“仪式-语言-信仰”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请海神“龙王爷回家喽！”呼唤式语言，建立人神沟通；献祭品“猪头大、鲤鱼跳，龙王吃了保平安”押韵口诀，强化记忆与传播；送海神“风调雨顺，满舱归！”祈愿式语言，表达社区共同愿景。在莱州“过半年”节庆中，方言用于“送灶神”“请祖先”等环节，具有固定的语言模板与语音规范。婚礼中“上头词”“哭嫁歌”等均以方言演唱，形成独特的“语言仪式化”现象。其次表现在胶东地区性别语言的语音与词汇差异方面^[4]。调查发现，女性在方言使用中更倾向于使用“软音”“儿化韵”与敬语，如“您儿”“吃咧没？”；男性则多用“直音”“命令式”，如“快着！”“走起！”。在“胶东剪纸”非遗传承中，女性传承人使用方言进行“口诀

式”教学，如“剪个莲花配鸳鸯，剪个福字贴门上”，语言风格温柔细腻；而男性在“打铁花”仪式中则使用短促有力的方言指令，如“点火！”“起花！”，体现性别分工的语言再生产。

1.3 方言与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创新性表达

方言是胶东地区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通过方言的使用，居民能够建立和维系家庭、社区、村落等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5]。方言也是胶东民俗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工具，通过方言，老一辈向年轻一代传授民俗知识、历史故事和生活智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胶东方言实践面临变迁，年轻一代逐渐减少使用方言，转而使用普通话或外来语言，方言的使用率逐渐降低。烟台胶东地区方言作为民俗文化的载体，通过探讨对方言在民俗活动中具体使用场景，例如节庆、婚丧嫁娶、祭祀等传统仪式中的表达，分析方言对传统文化的传递和保存价值。方言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已经突破了传统方式的限制，在城市品牌与文旅融合、教育领域“双言协同”及人工智能等方面均具有创新性表达。将方言融入到景区解说中，建立方言文旅品牌；在学校教育中进行“双语课堂”，减缓方言流失率，提升地区文化传承力度；在各大平台中将方言融入到人工智能中，实现文化遗产数字化，进一步增强方言与民俗文化的创新型表达。

2 方言在胶东地区文化发展中的社会价值

2.1 方言与文化认同机制的建立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数据显示，71.3%的受访者认同“方言融入着对故乡和家人的感情”，65.8%的受访者认为“方言包含着家乡的历史文化”。方言作为“地方声音”的象征，也成为“地方感”的核心符号，尤其在春节、清明等返乡高峰期，方言使用频率显著上升^[6-11]。在“胶东年俗”传承中，祖父母通过方言向孙辈讲述“年兽”“灶王爷”的故事，形成“语言—记忆—情感”三位一体的文化传递机制^[6-2]。胶东方言中性别特定语言使用的现状及胶东方言中性别语言的社会文化意涵在相关领域的具体分析研究较少，方言与文化认同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我们在对胶东地区的语言文化的理解基础上增强烟台胶东民俗的文化自信，进而为地方语言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支持。对胶东方言中性别语言的研究可以增进对地区语言学和方言研究的理解，更有助于揭示语言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构建过程，增强人们对烟台市传统胶东文化的保护。

2.2 文化与城市的协同发展

烟台市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打造胶东文化标识体系”，其中“胶东方言文化周”已被纳入市级文化项目^[7]。通过方言剧场、方言短视频大赛等形式，提升城市文化辨识度。对胶东地区方言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于胶东民俗文化的重视，而民俗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方言。方言中性别语言在语言实践中的体现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跨学科合作的探索及对丰富多彩民俗文化的宣传有利于吸引游客，推动城市旅游业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如酒店、餐饮和手工艺品等）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胶东民俗文化能够为新型创业和创新提供丰富的资源（例如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不仅能够催生出更多具有文化内涵的相关产品，更能够激发城市的创新创业，推动城市的产业多样化，促进城市经济多元化发展。例如，2023年起，蓬莱阁景区试点“方言讲解”，由本地老人担任“方言导游”，游客满意度提升27%，复游率提高15%^[8]。案例^[2-3]：莱州“方言+非遗”市集，将方言融入草编、剪纸、面塑等非遗展示，设立“方言体验摊位”，2024年春节期间吸引游客超12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超600万元^[9]；2023年，抖音平台#胶东方言话题播放量突破3.2亿次，单条视频最高点赞量达127万^[10]。内容涵盖“老妈教我说土话”“胶东女婿第一次上门”等情景剧，形成“方言+情感+幽默”的传播模式。

3 结论

随着社会变迁，胶东方言中的性别语言体现了胶东地区特有的性别观念与文化价值。胶东方言中性别语言的变化方言中对性别身份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分析方言在语言实践中如何体现、受到现代社会文化的何种影响进而具体分析胶东文化中方言的社会文化意涵^[11]。该课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了解胶东及其民俗中的性别语言特点可以促进外界对烟台地区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有助于跨文化交流与对话，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国家明确指出，民俗文化

的保护对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论述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使其与当代社会的需求和价值观相契合。方言能增强人民内部的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更有利于宣扬烟台市传统胶东民俗文化；方言强化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不仅成为胶东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居民的地方认同感探讨方言在胶东地区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包括方言在家庭、社区、村落等不同区域的使用情况，明确方言是如何构建社会关系、强化群体认同的，这对于明确方言的社会功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23) [R].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2] 习近平. 《人民日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A]. 2021-11-11.
- [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4] 谢鑫宇.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论语言的性别差异及其成因[J]. 新楚文化, 2023(17): 58-61.
- [5] 李泓纲, 姜岚. 胶东方言的历史发展与分区[J]. 人文天下, 2017(06): 45-49.
- [6] 左秀兰, 吕雯钰. 关于方言使用及态度的调查研究——以威海地区胶东方言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38(01): 72-78.
- [7] 烟台市人民政府. 烟台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Z]. 2021-12.
- [8] 蓬莱阁景区管理服务中心. 2023 年度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R]. 2024-03.
- [9]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 (2023) [R].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4.
- [10] 字节跳动平台责任研究中心. 2023 年方言短视频数据简报. 2024.
- [11] 刘凤鸣. 胶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15-20.

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契合性研究

张文静^{1*}

(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省 广州市 510080)

摘要: 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相互支撑, 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进程, 共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 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维度呈现出同构、贯通、共生的契合性特质。在理论逻辑上, 二者均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发端, 秉持多元一体的辩证逻辑架构; 在实践逻辑中, 二者具备贯通古今的开放性视野格局, 坚定主张命运与共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价值逻辑范畴, 二者皆指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愿景、致力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

关键词: 大历史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人民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48>

A Study of the Logical Congruence between Macro-History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Zhang Wenjing^{1*}

(¹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80, China)

Abstract: Macro-history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Unified in the great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y jointly point toward the grand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ross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value logic dimensions, they exhibit congruent characteristics of isomorphism, interconnection, and symbiosi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logic, both originate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dhere to a dialectical framework of unity in diversity, and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rich soil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practical logic, both possess an open vision that connects the past and present, emphasize the continuity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irmly advocate for a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shared destiny. Within the realm of value logic, both point toward the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commit to build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Keywords: Macro-histor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people

引言

基金项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校级科研创新团队《习近平历史观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阐释研究》;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共建课题《大历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2023GZGJ253)

作者简介: 张文静 (1996-), 女, 山西临汾, 硕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张文静, 通讯邮箱: 1366716146@qq.com

大历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观和方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全体国民价值共识、形塑国家认同的核心政治叙事与精神坐标，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二者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上呈现出同构、贯通、共生的契合性特征，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重要保障和不竭源泉。

1 理论逻辑的同构性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1-1]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战略性、科学性的顶层设计理念，二者在理论发轫之基与逻辑建构之维上，深刻彰显出内在同构的理论品格。

1.1 理论发轫之基：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历史观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即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立场出发，将英雄人物的意志、人的思想动机视为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社会发展只是一种在量的方面的进化过程，没有质的飞跃和突变……不论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不论阶级斗争的存在”^[2]。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将唯心主义历史观推翻，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3-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者辩证统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科学上层设计，充分汲取吸收了唯物史观这一理论精髓。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3-2]，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3]。习近平大历史观注重“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5-1]，将中华民族的壮阔征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时空坐标系中，在崭新的时空维度下深刻作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5-2]的时代之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同样强调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是共同体的空间载体，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是共同体的精神纽带”^[6]，将认同建构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既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原理的必然逻辑延展，更是其在实践维度的必要展开与深度彰显。人民性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马克思曾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达成深度同频共振的辩证统一过程，其深刻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价值追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价值导向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9-1]

1.2 逻辑建构之维：多元一体

唯物史观将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充满内在联系、完整统一的大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唯物史观所构建的的理论高度，结合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提出了大历史观这一重要理论范畴。大历史观批判那些碎片化、狭隘、短视地研究历史的现象，认为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胸怀。在民族工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9-2]这一共同体理念表明，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交融汇聚、多元一体。

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蕴含着多元一体的辩证逻辑，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引。一方面，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多元一体。一是以宏大视野审视历史，强调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中国历史，看到了历史维度的多元与一体。二是强调灿烂的中华文

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又凝聚成了中华文化这一一体性，强调文化维度的多元与一体。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含着丰富的多元一体逻辑。一是在民族构成上，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起源、文化习俗与民族特性，这是多元性，56个民族已经结合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体性。二是在文化层面，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输送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各民族文化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相互交融、交互共生，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了文化上的一体性。三是政治认同上，各民族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民族特色，这是多元的表现。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起来，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五个认同”，使各民族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同凝聚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体现了政治认同上的一体性。

二者的多元一体辩证逻辑，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它既尊重了各民族的差异和特色，让各民族能够充分展现自身文化与发展优势，又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共同利益，有助于汇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伟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而奋勇前行。同时，这种辩证逻辑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的优越性。

2 实践维度的贯通性

在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的皆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以宏大的历史时空视野审视历史，注重从中华文明的发展的角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从而获得未来发展的新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强调中华民族各民族命运与共，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磅礴力量，二者在实践维度上具有紧密的贯通性。

2.1 贯通古今的开放视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掌握未来发展方向。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呈现出一种贯古通今、开放包容的开阔视野，其要义绝非对历史时序的简单延展或泛化解读，而是将“历史——现实——未来”视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深刻彰显着时空维度中历史演进的连续性与整体性逻辑。

一方面，习近平大历史观具有贯古通今的开放视野。一是从历史的长周期和长时段回顾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都置于宏大视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10]。二是将中华文明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不限定于一国一域，在对中外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比较中认识文化发展脉络、把握文化发展主流、汲取文化发展智慧^[11]。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具有贯古通今的开放视野。一是将中华民族在漫长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有益经验与优秀文化加以利用，转化为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素材，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二是积极吸纳世界各国在民族治理与民族发展方面的优秀经验与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国内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豪感。三是着眼未来，培养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代又一代新人，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未来能够持续繁荣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2 命运与共的未来前途

大历史观指引未来方向，大历史观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以古鉴今、彰往察来，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未来指引。它让我们能够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把握未来方向，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独特优势。一方面，大历史观构建了一个动态、有机且相互

关联的认知框架。在横向空间层面，大历史观要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宏大坐标系中加以考察。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的产物，也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制度伟大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纵向时间维度，大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它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如何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逻辑链条最终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理想。大历史观正是通过梳理这漫长的历史脉络，让我们从“两个必然”的规律高度，坚定了这一终极信念。另一方面，大历史观最终指向的是行动。它通过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为我们擘画了清晰的未来蓝图，并激发了实现这一蓝图的强大精神力量。大历史观明确了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这一判断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发展阶段的科学认知，它要求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必须服务于这个核心目标。大历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它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的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五大特征”，正是大历史观在当代实践中的生动展开和创造性运用，它既遵循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更彰显了基于国情的独特优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彰显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团结根基，更是凝聚未来的精神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力推动各民族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携手迈向共同繁荣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的时代伟力。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强大的现实功能。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漫长历史自然演进的产物。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深刻地将各民族的命运编织在一起，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以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共同体意识无法割裂的历史纵深与文化血脉。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从内部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各民族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从外部看，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与潜在的风险挑战，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将56个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形成“拳头”效应，才能有效抵御一切分裂破坏活动，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掌握未来。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回顾过去的认同，更是引领未来的旗帜，通过塑造共同的精神世界，为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它致力于在所有民族成员心中，构建一个超越个体民族身份的、更高层级的“中华民族”认同。一个共同体能够保持长久凝聚力，离不开一个被所有成员认可并愿意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梦想。这个梦想，承载着近代以来所有民族共同的苦难与辉煌，寄托着所有民族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将每个民族、每个公民的前途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使“共同体”与“复兴梦”同频共振。

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维度上相互贯通，从贯古通今的开放视野展现了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全面认知，从命运与共的未来前途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和前进动力，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和复兴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价值逻辑的共生性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以宏大的历史时空视野审视历史，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强调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凝心聚力、文化上多元共生、经济上休戚与共、情感上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二者在价值逻辑上具有紧密的共生性。

3.1 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性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并且多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共同富裕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和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皆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追求目标，二者在此具有内在契合性。

一方面，大历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视角。从历史长河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好向往，

《礼记·礼运》中就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2]的大同社会，蕴含着共同富裕的理念。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推动共同富裕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源于中华民族追求共同繁荣的千年梦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在党的战略规划与制度保障下，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历史进程必将稳步推进。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让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共同富裕能够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例如，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脱贫攻坚战略等，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让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对共同富裕的内在诉求。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奋斗目标，自然成为凝聚各民族力量的重要纽带。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有助于巩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2 精神家园的共建共塑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9-3]，使人民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习近平大历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起到了引领作用。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认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13]。这些特性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大历史观要求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等，将其融入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中，使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和文化内涵。习近平大历史观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方向指引，让我们明确了精神家园建设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属于双向互动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滋养。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这些特性使得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能够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推动着精神家园的共建，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培育了中华文化，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丰富和发展。

3.3 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共创性

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侧重点不同，但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规律、民族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的深刻认识和伟大担当。

一方面，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依据和思维支撑。第一，习近平大历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习近平大历史观坚持唯物史观，以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看待历史^[14]。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和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演进历史长度，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整体，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认知，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习近平大历史观体现出一种“天下一家”的天下情怀。这种天下情怀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倡导以广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倡导的各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等理念相契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导向。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和提供借鉴。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要义在于“引导各族人民深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5]，使这一精神内核融入血脉、根植心灵，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治理好本国民族事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强大的动力支持，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第二，其内含的“和合”思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为世界民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复杂多样，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等做法加剧了矛盾。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团结统一，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和谐共处、合作共赢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各民族凝聚共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第三，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个体差别的同时凝聚各民族力量。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全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相契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使命。

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性、精神家园的共建共塑性、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创性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价值逻辑共生性。这种共生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规律、民族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深刻认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

4 结语

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大历史观是认知之基，它让我们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必然性、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真实性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时代之需，它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共同意志和行动纲领。

只有站在大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哪里来、走过怎样的路、将向何处去，才能真正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
- [2] 蒋大椿, 陈启能. 史学理论大辞典[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6]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 [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7.
- [9]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 求是, 2024(3).
- [10] 习近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N]. 人民日报, 2021-12-29(1).
- [11] 甄占民. 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时代观[N]. 光明日报, 2024-05-27.
- [12] (清)孙希旦撰,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13]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6-3(1).
- [14] 王东, 王永贵. 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J]. 红旗文稿, 2025,(06):38-40.
- [15] 雷振扬.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治话语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 (05): 1-8.

人工智能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路径探析——以“柏子仁”IP 创新实践为例

贾淑华^{1*}

(¹ 烟台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 山东省 烟台市 264000)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 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然而, 传统非遗保护模式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以山东省汶上县小秦村 600 年柏子仁非遗为研究对象, 剖析其 IP 发展现状, 指出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柏子仁非遗保护的针对性策略。通过构建“技术赋能—社区参与—市场驱动”协同的非遗活态传承理论框架,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生产与传承, 开发非遗 IP, 升级全域营销, 实现非遗技艺标准化传承与高效生产, 激活文化基因, 提升市场竞争力与传播力, 为同类非遗项目提供可复制的数字化范式, 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柏子仁”IP; 人工智能赋能; 活态传承; 策略研究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li5.715>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for AI-Empowered Dynamic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aking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Baiziren” IP as an Example

Jia Shuhua^{1*}

(¹ Yant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Chinese and Law, Yantai, Shandong, 264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treasures of nat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carries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ultural genes. However, traditional ICH protection models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600-year-old Baiziren ICH in Xiaoqin Village, Wensha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its IP, points out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Baiziren ICH protection.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ICH that synergizes "technology empowerment —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market-driven" approaches, it leverag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to empower production and inheritance, develop ICH IPs, upgrade omnichannel marketing, achieve standardized inheritanc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ICH skills, activate cultural genes, and enhan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dissemination capabilitie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replicable digital paradigm for similar ICH projects, thereby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CH cultur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iziren” IP; AI Empowerment; Dynamic Inheritance; strategy research

基金项目: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AI 赋能柏子仁非遗 IP 活态传承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5ZB20020893)

烟台理工学院 2023 年度学术团队与研发团队、青年科研基金项目; 烟台理工学院“数字传播研究学术团队”建设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23XSTD01)

作者简介: 贾淑华(1984-), 女, 山东滨州, 硕士, 研究方向: 文学与文化

通讯作者: 贾淑华, 通讯邮箱: 498930529@qq.com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文化的璀璨明珠，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传统非遗保护模式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非遗活态传承带来了新的契机。将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与传承中，能够为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传承和创新提供新的途径和方法。国内对非遗保护与 AI 技术的结合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非遗数字化保护与 AI 技术应用，学者关注 AI 在非遗数字化存档、修复与传播中的作用。例如曲亮^[1]介绍故宫博物院通过高光谱成像和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 AI 辅助技术，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与裂化程度。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层面的应用，缺乏对非遗文化内涵与技艺精髓的深度挖掘，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框架；此外还有 AI 在非遗技艺传承中的辅助作用，例如王志澎^[2]利用 AI 生成玉雕效果图，提高与客户沟通效率；谢晓宇^[3]等提出 AI 可辅助非遗传承人设计创意内容，降低制作成本；非遗 IP 开发与文化资本转化。国外在非遗保护与 AI 技术结合，主要集中在 AI 技术在非遗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非遗 IP 开发与全球化传播等方面。例如谷歌“文化学院”项目通过 AI 技术将全球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并开放 API 接口供研究者使用。本文以山东省汶上县小秦村 600 年柏子仁非遗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 IP 发展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目的在于通过 AI 技术赋能，升级全域营销，实现非遗技艺标准化传承与高效生产，激活文化基因，提升市场竞争力与传播力，同时进一步探索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融合路径，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柏子仁非遗 IP 发展现状

1.1 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

柏子仁为柏科植物侧柏的干燥成熟种仁。现代化学研究表明，柏子仁中含有大量的柏木醇、谷甾醇和萜类，并含少量挥发油、皂苷、维生素 A 和蛋白质等^[4]。柏子仁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现代药理研究证明，柏子仁有改善睡眠、镇静、益智、保护神经等作用。临床多用于治疗失眠、月经过少、便秘、盗汗等疾病^[5]。在中医典籍中，关于柏子仁功效也多有记载。比如《本草纲目》记载：“平肝润肾、延年壮神。”^[6]《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久服令人润泽美色、耳目聪明、不饥不老、轻身延年。”^[7]《得配本草》记载：“安五脏、宁神志、去鬼交、定惊悸、利虚秘、治惊痫。”^[8]山东省汶上县小秦村的柏子仁加工工艺更是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明朝永乐年间，据《汶上县志》^[9]记载，山东省汶上县苑庄镇中药材加工于明朝永乐年间起步，由刘氏六兄弟从山西洪桐县传入汶上苑庄镇的小秦村的，已经相传 20 代。小秦村有着“柏子仁加工中国第一村”的美誉^[10]。《山东中医药志》^[11]称：“小秦村柏籽加工为国内首创，以洁净度高、破碎率低而著称，已成为中药材行业的上等精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小秦村的柏子仁加工工艺不仅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小秦村乃至汶上县的文化瑰宝。

1.2 现有 IP 开发情况

目前，柏子仁非遗在 IP 开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产品开发上，除了传统的柏子仁药材，还开发了柏子仁霜等产品。“柏子仁霜通常用于养心安神的处方中，效果最佳。”^[12]在文化传播方面，当地通过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向外界展示柏子仁加工工艺的魅力。同时，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提高了柏子仁非遗的知名度。然而，与一些成功的非遗 IP 相比，柏子仁非遗的 IP 开发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其 IP 形象不够鲜明，同时文旅融合程度较低，没有将柏子仁文化与当地的旅游资源有效结合，限制了其市场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进一步提升。

2 柏子仁非遗 IP 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传帮带”传承难题

传承人老龄化是柏子仁非遗传承面临的首要问题。许多掌握传统加工技艺的老艺人年老体弱，不能继续从事传承工作。而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的兴趣普遍不高，他们认为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收益低，缺乏吸引力。这导致传承链条面临中断的风险，一旦老艺人离世，一些独特的技艺和经

验可能随之失传。而且，缺乏系统的传承教材和规范的教学体系，传承效果参差不齐，不利于技艺的标准化传承和发展。

2.2 产品创新不足

柏子仁非遗产品的种类相对较少，主要以传统的药材和简单的炮制产品为主。在产品形态上，缺乏创新和突破，未能充分结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和审美观念。例如在保健品、化妆品等热门领域，柏子仁非遗产品的开发相对滞后，没有充分利用其药用价值和文化内涵，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此外，产品的包装设计也较为传统，缺乏时尚感和吸引力。

2.3 市场推广乏力

市场推广渠道有限是柏子仁非遗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其市场推广主要依靠传统的线下渠道，如药店、中药材市场等，线上推广力度不足。虽然已经利用了一些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但宣传方式和内容缺乏创新，难以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关注。品牌知名度低也是制约柏子仁非遗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3 人工智能赋能柏子仁非遗 IP 发展的针对性策略

3.1 社区参与：激发非遗传承的内生动力

3.1.1 传承人培养与激励

培养技术技能性人才，弘扬工匠精神，将传统师徒制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建立多元化的传承人培养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13]在职业院校中开设柏子仁加工相关专业和课程，邀请老艺人担任教师，将传统技艺系统传授给学生。同时，利用在线教育平台提供丰富的网络课程和学习资源，方便传承人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交流。建立传承人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传承人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表彰。设立传承人奖励基金，对在技艺传承、产品创新、文化传播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进行奖励，激发他们的传承积极性和创造力。

3.1.2 社区合作与资源整合

成立柏子仁非遗合作社，整合社区内的资源，实现共享和协同发展。通过合作社的模式，将分散的家庭作坊整合起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格局，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加强社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例如，高校可以与社区合作开展柏子仁加工工艺的优化研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进传统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3.2 技术赋能：AI 助力非遗技艺传承与生产

3.2.1 数字化保护与记录

利用 AI 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对柏子仁非遗的加工过程进行全面、细致的数字化记录。通过高清摄像设备捕捉每一个加工环节的画面，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对画面中的动作、工具、原料等进行识别和分析，准确记录加工的步骤和要点。同时，运用语音识别技术记录老艺人的讲解和经验分享，将声音转化为文字，建立详细的文字档案。采用 3D 建模技术对柏子仁加工设备、工具和成品进行三维重建。这些 3D 模型不仅可以用于展示和研究，还可以为虚拟体验和仿真训练提供基础。例如，游客可以通过手机或 VR 设备查看柏子仁加工设备和工具的 3D 模型，了解其结构和功能；传承人可以利用 3D 模型进行虚拟加工训练，提高学习效率。

3.2.2 智能生产与质量控制

引入 AI 传感器和数据分析技术，对柏子仁加工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和质量控制。在加工设备上安装温度、湿度等传感器，实时采集加工过程中的环境参数和设备运行数据。通过数据分析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及时发现加工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如温度过高、湿度不合适等，并自动调整设备参数，保证加工质量的稳定性。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柏子仁质量预测模型。在

生产过程中，可对新生产的柏子仁进行质量预测，提前发现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和改进，提高产品的合格率。

3.3 市场驱动：创新非遗 IP 的营销模式

3.3.1 线上营销创新

搭建“柏子仁非遗数字生态平台”，整合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多种营销渠道。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柏子仁非遗的加工过程、文化故事、产品使用方法等短视频内容，吸引用户的关注和互动。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邀请主播现场展示和销售柏子仁非遗产品，促进产品的销售。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和用户互动，发布品牌动态、活动信息，与用户进行沟通和交流，增强用户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开发线上虚拟体验项目，利用 VR/AR 技术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非遗体验。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或 VR 设备进入虚拟的柏子仁加工工坊，亲身体验加工过程，了解柏子仁的文化内涵。

3.3.2 线下营销创新

打造“非遗嘉年华”“本草文化周”等主题 IP 活动，与康养度假区、中医药博物馆等场景深度联动。在活动中，设置柏子仁非遗展示区、体验区、销售区等，展示柏子仁非遗的产品和文化。邀请老艺人进行现场技艺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同时，结合康养度假区的资源，推出柏子仁康养套餐、本草药浴等特色产品和服务，满足游客对健康养生的需求。与中医药老字号、文旅企业等开展跨界合作，联名开发非遗产品。借助合作方的品牌影响力和渠道资源，扩大柏子仁非遗产品的市场覆盖面。

4 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小秦村柏子仁非遗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其 IP 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技术赋能—社区参与—市场驱动”协同的非遗活态传承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在技术赋能方面，利用 AI 技术实现了非遗技艺的数字化保护与记录、智能生产与质量控制；在社区参与方面，通过传承人培养与激励、社区合作与资源整合，激发了非遗传承的内生动力；在市场驱动方面，创新了线上线下营销模式，制定了品牌战略传播方案。这些策略的实施，实现了非遗技艺的标准化传承与高效生产，激活了文化基因，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与传播力，为同类非遗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数字化范式。

- [1] 黄欣然. 曲亮: 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N]. 湖南日报, 2024(8).
- [2] 张帆, 刘桂芳. 当传统非遗邂逅人工智能[N]. 天津日报, 2025(1).
- [3] 谢晓宇, 范圣玺. 人工智能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基于民族学与设计学交叉视角[J]. 贵州民族研究, 2024, 45(2): 82-88.
- [4] 卢军, 芦霜. 柏子仁研究进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15(3): 247-250.
- [5] 王宁. 柏子仁研究进展[J]. 生物技术世界, 2015(8): 249.
- [6]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刘衡如, 刘永山,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529.
- [7] 顾观光. 神农本草经[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7: 71.
- [8] 严洁. 得配本草[M]. 姜典华,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183.
- [9] 山东省汶上县志编纂委员会. 汶上县志[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 [10] 孔德双, 张璨. 汶上县中都街道乡村产业“药”振兴[N]. 齐鲁晚报, 2024(3).
- [11] 张奇文. 山东中医药志[M]. 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 [12] 刘震营, 王玲娜, 等. 柏子仁本草考证[J]. 中成药, 2020, 42(8): 2135.
- [13] 习近平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N]. 人民日报, 2020-12-11(01).

农地二轮延包新政中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因应与发展

钟芷琪¹, 谢斯彤², 魏旭^{1*}

(¹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 法学系, 广东省 广州市 510642; ²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 广州市 510642)

摘要:农地二轮延包在稳定承包权、活化经营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人均一亩三分地”的细碎格局,诱发地力衰退、撂荒加剧、规模瓶颈等结构性风险。本文基于“产权—风险—激励”分析框架,系统评估现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与延包新政的适配缺口,发现:①补偿标准仅对接短期产值,忽视延包后农户长期承担的地力维护机会成本;②休耕补贴全国统一且水平过低,难以扭转“低投入—低产出”闭锁;③资金来源单一、横向补偿缺位,导致粮食主产区“护田吃亏”与主销区“免费搭车”并存;④受偿主体识别规则模糊,进城务工农民等非耕地群体仍大量挤占补偿份额。对此,文章提出“三位一体”刚性管控与弹性激励并重的制度重构方案:以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为核心,划定绿、黄、红灯区并配套差异化补偿;创设“中央财政+主销区横向补偿+碳汇市场交易”多元资金池,对休耕、轮作、地力提升给予阶梯式溢价;建立“多部门联审+动态信息云”精准识别机制,把补偿对象限定为实际务农且以耕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承包户或规模经营主体。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剩余控制权再分配与激励相容设计,可将延包红利转化为农户长周期养地护地的内生动力,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农民收益的多赢,为《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草案》的制定提供立法借鉴。

关键词:农地二轮延包;粮食安全;耕地保护补偿;补偿激励机制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60>

Response of the Cultivated-Land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o, and Its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Policy of the Second-Round Extension of Rural Land Contracts

Zhong Zhiqi¹, Xie Sitong², Wei Xu^{1*}

(¹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Law,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²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round extension of farmland contracts, while stabilizing usufruct and activating management rights, has simultaneously ossified the highly fragmented “one mu and three fen per capita” pattern, generating structural risks such as soil-fertility decline, accelerated

基金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粮食安全导向的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实证调查研究——以清远市《耕地保护促进条例》为例》(项目编号:202410564076)

作者简介: 钟芷琪 (2005-), 女, 广东广州, 本科生, 研究方向: 环境法、AI 知产、刑法、数字经济

谢斯彤 (2004-), 女, 广东广州, 本科生, 研究方向: 民法、刑法、环境法

魏旭 (1981-), 女, 广东汕头,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经济法

通讯作者: 魏旭, 通讯邮箱: jill_way@126.com

abandonment and a scale bottleneck. Drawing on a “property-rights-risk-incentives”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existing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cropland protection and the new extension policy. Four gaps are identified: (1) compensation benchmarks are pegged to short-term output value, ignoring the long-run opportunity cost of soil-fertility maintenance borne by farm households after extension; (2) the national fallow subsidy is uniform and set too low to break the “low-input-low-output” trap; (3) funding relies on a single channel and horizontal compensation is absent, so 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s “protect farmland at a loss” while major consuming regions “ride for free”; (4) beneficiary-identification rules are vague, allowing non-farming groups such as migrant workers to crowd out compensation shar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proposes a “three-in-one” institutional redesign that couples rigid control with flexible incentives. A dynamic soil-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would demarcate green, yellow and red zones with differentiated payments; a pluralistic fund pooling “central finance + horizontal transfers from grain-consuming regions + carbon-market transactions” would finance step-wise premiums for fallow, rotation and soil-quality improvement; and a multi-agency cloud-based verification platform would confine payments to contract holders or scale operators who actually farm and rely on cropland as their principal income sour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by reallocating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nd designing incentive-compatible contracts, the dividends of contract extension can be converted into endogenous motivation for long-term soil stewardship, delivering simultaneous gains for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farmer incomes, and offering legislative reference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Farmland Conserv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Bill.

Keywords: Second-round extension of rural land contracts; Food security; Cultivated-land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1 引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延包原则，即“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我国是以农业为根基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生产的中坚力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我国在调整土地制度上也格外谨慎。今年，第二轮承包到期的土地迎来规模上的高峰。对于土地制度的调整改革，上层建筑也沿用了“大稳定，小调整”的逻辑，这一改革步伐也符合我国国情^[1]。

但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存在着土地细碎化、土地利用效率低、人地矛盾尖锐^[2]、农户土地投资倒退等现实问题。农地二轮延包的展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暗含的多个问题，且实质上延长了农户对同一片农地的实质性承包权，这也意味着农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同一农户以同质化的耕作方式反复利用的概率大幅提升。当农地因二轮延包在同一农户手中被同质化的耕作方式反复利用时，其负外部性会沿着两条路径迅速累积：一是生态维度，连作与掠夺式经营使土壤有机质持续耗竭，氮磷钾速效养分比例失衡，重金属与盐渍化风险叠加，地力呈边际递减趋势^[3]；二是经济维度，细碎地块因缺乏流转与整合，难以引入资本—技术密集型投入，农户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抑制长期投资意愿^[4]。更为严峻的是，制度层面的延包安排虽在形式上延续了产权稳定性，却在法理上固化了“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初始分配格局，未能通过市场或行政手段将碎片化土地向高效率经营者适度集中，公平诉求下的“按人分地”与效率诉求下的“按能用地”之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拉大^[5]，人地矛盾遂由隐性紧张走向显性激化^[6]，粮食安全与农业转型双重承压。

此种背景下，国家在开展农地二轮延包工作时，虽然以稳定产权预期、降低交易成本等手段暂时缓解了农户对于土地产权的担忧^[7]，但却未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土地细碎化、利用低效率、地力衰退等结构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现象尖锐地指出^[8]，如果缺少具备耦合性的激励措施^[9]，农户对于农地的利用将不可避免地滑向“路径依赖”的陷阱。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作为一种利益调节工具，能够在不打破现有产权格局的前提下，通过经济补偿激励农户参与耕地

保护、提升地力、促进土地整合，契合“长久不变”的政策导向。鉴于此，本文将基于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路径，通过对农地二轮延包的剖析，探索出将农地二轮延包红利转化为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内生动力的优化路径。

2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现有框架与创新必要

2.1 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制度现状与实践情况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同时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10]。自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耕地保护方面的工作强度不断提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多份重要文件中都明确要严守耕地红线、注重耕地质量提升，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进一步指出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由此，多个省份响应中央一号文件号召，先后发布有关耕地保护补偿相关通知，逐步建立起耕地保护补偿体系，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的耕地保护补偿主要有两种结构层级，从纵向来看为政府间补偿，由中央财政拨款，下拨专项基金到地方做激励农民耕种土地的补贴款项；不同地区之间的政府就资源配置、不同类型耕地划定等进行布局，以实现区域之间的平衡管理。在此背景下，目前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补偿主体普遍以政府为主要力量，而缺乏辅助力量为政府分担压力；受偿主体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如四川成都和广东中山以“耕地”作为补偿范围，广东佛山、东莞等地区的补偿范围是“永久基本农田”；现行中央层面文件（如中发〔2017〕4号文、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仅原则性规定“补贴对象为承担耕地保护任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但未对“谁可受偿”设定全国统一、可操作的认定标准，也未明确“实际耕作者”与“权属人”之间的优先顺序。可见我国并未对耕地保护受偿主体设置统一标准，也未确立关于受偿主体的确定规则，缺乏标准性的衡量尺度。在耕地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方式板块，根据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及《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我国目前大部分补偿资金源于中央财政规划，补偿方式以经济激励为主，仅少部分地区以技术激励、工作激励等形式作为补充，缺少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加入。在此模式下，社会力量的缺位不仅凸显了地方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也削弱了大众参与耕地保护内生动力，不利于补偿目标的根本实现和长效维持。

从横向来看，由各地方行政部门对耕地实际耕种者作耕地保护补偿，帮助农民在耕种过程中能够获得长效稳定的经济补贴，引导耕地受偿主体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但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耕地集中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难以给予耕地保护主体应有水平的耕地保护补偿，存在设置补偿资金标准不适宜、补偿资金难以到位现象；而耕地零散、相对少的地区往往因二、三产业的发达，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虽然拥有更多的后备资金投入到这一板块，却也面临着资金累赘及缺少明确的受偿主体等问题。由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不同的地区实践情况差距较大^[11]，省份之间存在政策差异，如在“省级统筹、奖优罚劣、资金直补”大框架下基本一致的山东省与广东省均采取“田长制”，而耕地资源丰富、粮食产量全国第一的黑龙江省则以耕地地力补贴作为主要形式，山地丘陵占比高、耕地碎片化突出的重庆市实行分级奖励制度，难以形成具有普遍推广性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由此而言，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经历十余年探索与发展，已初步形成“纵向财政补偿+横向地方补贴”的制度框架，但在落实过程中仍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要素不明确、受偿主体模糊、补偿标准不适宜、补偿方式单一等问题。此外，通过文献研究与政策对比可以发现，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普遍仅有地方性规章，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等率先开展耕地保护补偿工作的省份，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都仅依靠其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意见或实施办法落实工作，相关保护条款分散在不同法律文件中，缺乏专门的、系统的耕地保护补偿法律规范，在发生纠纷、实际推进中难以以为农户主体的权益保障提供法律依据。

农地二轮延包政策出台，形成了土地稳定性增强、规模经营发展和新型经营主体壮大的新格局，对完善耕地保护补偿体系及保障农户主体权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凸显了现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适应性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2 基于农地二轮延包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演变需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指出，要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程，坚持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同时，耕地利用率不高、耕地撂荒、耕地用途畸变等^[12]问题屡见不鲜，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目标面临现实问题。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之一，耕地保护是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此背景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应运而生。2021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首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202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第十条规定“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调动耕地保护责任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2024年5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明确的立法项目及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中包括“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草案”，首次将“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作为专项进行专门立法，为耕地保护机制的迭代提供了锚点。

农地二轮延包的开展，实质上是土地产权的再次延长，农户主体与地块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提升了耕地与耕地主体之间的人身依附黏性。在农地二轮延包背景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演变实质是一场围绕“谁拥有在耕地上继续投入并承担长期风险”的剩余控制权再分配。土地的承包期限延长意味着以同质化方式利用同一地块的周期同步延长，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地块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水土流失等不可逆的伤害。同时，农业属于高投入、长时期才能收获回报、反馈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还会面临极端天气、市场波动等现实风险。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延长的同时，面临的生产力不确定性也随之让渡至农户身上，耕地所具备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巨大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耕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可持续且外溢的。但耕地保护主体却由于农用地的比较收益低于非农用地、强制政府干预等抑制因素而难以内部化，导致耕地保护工作出现耕地保护主体的缺口。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作为有效的调节手段，在完成简单的“补贴”或“奖励”功能的同时，把原本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耕地质量、数量、生态管护权重新切割，并以财政资金、生态指标交易、地力服务等可计量的方式，部分让渡给农户和村集体，从而换取他们对长期投入的默示承诺。也即，国家用可预期的补偿现金流，买回了农户手中潜在的“撂荒期权”，使“继续耕种”在财务上优于“抛荒或改作他用”，完成了剩余控制权从“国家单边管制”向“国家—农户共享”的过渡。

延包使耕地资产化的同时，并不丧失其本身的公共品属性——粮食安全、生态屏障、碳汇功能仍由国家战略强制兜底。补偿机制必须在“资产私有化收益”与“公共品外部性”之间找到折中方案：一方面让农户享有长期投入的增值收益，另一方面确保国家有权在粮食危机、生态灾害等极端情境下迅速收回或重新配置使用权。2024年列入立法计划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草案》之所以强调“质量提升”而非单纯的“数量平衡”，正是要在法律层面固化这一折中——通过补偿资金与质量指标挂钩，把农户的私人资本锁定在耕地质量升级这一不可逆路径上，既防止二次撂荒，也避免农户因短期套利而过度攫取地力。最终，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二轮延包中完成了一次精密的制度套利：国家以财政转移支付购买了农户的长期合作，农户以持续投入换取了资产增值的合法通道，双方在剩余控制权的重新划界中实现了激励相容。

2.3 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与农地二轮延包新政不适应、不契合之处

2.3.1 补偿精度与治理目标之间的矛盾

根据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9条、第39条规定，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制度，即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可流转。这一制度设计在法理层面构建了“承包权-经营权”的二元权利结构，但实践中却衍生出补偿资金分配的制度性矛盾。从物权权能理论分析，承包权作为用益物权，其核心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但“三权”分置后，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并获得独立权能，形成“承包权保留占有权、经营权行使使用权”的权能分割格局。这种分割导致补偿资金分配出现“权利主体与行为主体分离”的悖论——补偿资金基于承包权发放，而实际耕作行为由经营权人实施。

国家自2016年起即明确要求“把耕地补偿资金发放到真正种地的农民手中”^[13]，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耕地保护补偿通常是根据第二次国土调查图斑及承包经营权证面积实行一次性打包拨付^[14]，部分相对偏远的地区的发放依据则要追溯到78年改革时的土地划分。图斑种类一旦被标注为“耕地”，即触发此类财政拨付，而忽视地块是否仍然有种植价值、是否仍在种植状态或

种植主体。这种“补权不补地”“补地类不补行为”的模式，在国外的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15]，在我国的实践中凸显出两大结构性缺陷：真正从事耕地劳作的主体拿不到补贴，已经为非耕地的图斑地块继续领取补贴，从而削弱补偿的激励功能。

在重庆万州、北碚的实践中，这种法理设计异化为“补权不补耕”的激励机制^[16]。产权与耕作权的制度脱钩，使实际耕作者面临“保护投入—收益外溢”的完全外部性，边际激励为零，进而影响耕地养护、耕地利用等工作的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承包方有权流转土地经营权，但未明确流转后补偿资金的分配规则。实践中，补偿资金普遍按“项目区农户”“集体经济组织”两条线分配，转入方（实际耕作者）可分享的比例不足一半，剩余大部分仍流向拥有承包权的流出户。这种分配方式直接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8条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农业用途”的立法目的，导致“保护投入—收益外溢”的完全外部性。

更深层的制度成因在于，现行补偿机制未能适配“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7条虽规定承包方需维持土地农业用途，但未建立与经营权挂钩的补偿标准。在年度变更调查中，只要图斑地类未被修改，系统即默认其为“合法耕地”并持续拨付补偿，形成“数据惰性—资金惰性—管理惰性”的闭环。这种“补地类不补行为”的模式，实质是将补偿资金与承包权永久绑定，而忽视经营权的实际耕作行为。

2.3.2 补偿标准与农民收益预期的矛盾

图1 我国部分省份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标准一览图

省份	文件	总体水平	不同地区补偿标准
广东省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的意见》	永久基本农田：35元/亩	佛山市南海区 ^[17] ：永久基本农田800元/亩，一般基本农田400元/年 河源市龙川县 ^[18]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04.6元/亩 清远市阳山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95元/亩 梅州市蕉岭县 ^[19] ：35元/亩 杭州市萧山区 ^[20] ：一般耕地200元/亩，永久基本农田300元/亩 义乌市 ^[21]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20元/亩 宁波市 ^[22] ：永久基本农田70元/亩，其他现状耕地30元/亩 平阳县 ^[23] ：永久基本农田40元/亩，其他状况耕地30元/亩
浙江省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省级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通知	永久基本农田现状耕地不低于60元/亩，上年度变更调查确定的其他现状耕地不低于4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助。	
江苏省	《江苏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暂行办法》（苏国土资发〔2016〕336号）	主要以集体为单位接受奖励	南京市 ^[24] ：耕地300元/亩，种植水稻的区域120元/亩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指导意见	57.78元/亩	71.45元/亩 ^[25]
北京市 ^[26]	《北京市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25年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	100元/亩 300元/亩	大兴区 ^[27] ：300元/亩 朝阳区 ^[28] ：300元/亩 怀柔区 ^[29] ：400元/亩 昌平区 ^[30] ：800元/亩

二轮延包后，农户与土地之间的人身依附性增强，承包主体对土地的长期依赖性上升，期望通过土地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但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中，补偿标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尤其是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其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又并无过多的耕地需要补贴。如佛山南海区耕地保护补贴已达800元/亩，同省梅州蕉岭县仅35元/亩，

相差 22 倍；省际比较中，北京丰台 300 元/亩、广州花都 104.6 元/亩，而黑龙江全省统一 75.16 元/亩、贵州最低 48.45 元/亩，最高与最低差距逾 6 倍，若计入南海则扩大至 16.5 倍，且经济越发达、耕地越少的地方配套财力越强，亩均可支配资金反而更高，形成“粮财倒挂”。

此外，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其核心考量因素和依据主要聚焦于耕地的直接经济产出价值和可量化的生态服务功能，对农户因长期保护耕地而损失的潜在发展机会收益和收入保障则考虑不足。首先，在补偿标准的测算基础上，其通常依赖耕地的农业产值或年租金收益等显性、短期经济指标（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平均亩产等）。例如，江苏省、重庆市等许多省份在制定省级或市级补偿标准时，明确将“耕地产值”或“农业收益”作为主要的计算基数。这种计算方式直接反映了对耕地当下应用价值的重视，但未能捕捉和评估该地块如果转为非农用途（如建设用地）所能带来的显著增值潜力，而这恰恰是农户为保护耕地而长期收入损失的重要部分。其次，虽然近年来官方标准已逐步纳入对耕地生态价值的补偿，但其补偿额度的确定，往往基于可观测、可计量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本质上是对耕地现有公共生态服务的付费，而非对农户个人因放弃土地发展权而丧失的长期资本性收益的补偿^[31]，既无法促进对土地利益的合理分配，更难以提升农户对于保护耕地的意愿。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激励耕地保护主体，使其自愿耕地保有量达到或接近社会整体所要求的最优水平耕地，始终能够守住耕地红线、压实国家粮仓，但我国的耕地保护补偿主要聚焦于耕地本身的价值与产能，而鲜少关注农户主体的意愿与行为，这就导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中的标准并不能实际有效地激励农户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同时，较为学术性的评估也需要精细的仪器、技术和人才配合，这给实际操作过程中添加困难，使评估难以在全国耕地保护工作中推行。

2.3.3 休耕补贴激励休耕不足以保证耕地质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指出，要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程，坚持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而耕地休耕制度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目标是高度一致的，质量保护是耕地保护的重点。耕地休耕并不等同于耕地撂荒，而是意味着让耕地暂时退出耕作，进行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是保护、养育、恢复耕地地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耕地可持续利用能力的重要方式，符合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平衡利益分配、保护农户免受损失的目的^[32]。2016 年 6 月，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等 10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开展轮作休耕试点工作，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亦强调，要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二轮延包期间，耕地长期单一化耕种模式导致土壤质量退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为土地肥力保持、质量提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33]。2016 年国家开展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工作以来，对轮作休耕的资金投入持续正向增加，区域不断扩展，补助区域范围也不断扩大。二轮延包工作全面铺开后，推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将成为保护耕地工作的不二选择。但农户参与休耕面临着短期经济收益匮乏、机会成本降低、补偿资金不足等多重现实束缚，极大地降低了农户休耕轮作的可能性。我国目前的轮作休耕补助以政府为主导，且资金来源仅限于中央财政，资金补助标准单一^[34]，这种模式使得农户在休耕过程中无法摒弃可能出现的风险，顺理成章地保障耕地进入休耕状态，进而加剧了耕地质量下降的风险。同时，休耕轮作补贴在全国范围内标准统一，没有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做出灵活的调整，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补贴相对低廉而缺乏吸引力；在经济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如广东北部、四川北部等地区，补助给地方财政造成一定压力，并不利于形成长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3 基于农地二轮延包新政需求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因应与发展

3.1 更严格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设置

农地二轮延包强化了农户的产权稳定性，但也可能导致耕地过度利用问题或耕地二次撂荒问题的加剧。因此，亟须构建更严格的“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以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价为支撑，实现耕地保护刚性约束与弹性调控相结合，保持土地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

3.1.1 明确耕地红线的分类与边界

《耕地保护法（草案）》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自然地理格局和分区，对耕地资源质量进行分类评价、分等定级，结果作为跨区域耕地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工作的依据。可见，明确耕地分类及其等级对促进我国耕地保护及其高效利用有重要意义。而《耕地质量等级》将耕地质量划分了十个等级，对耕地资源质量分类评价、分等定级具有参考意义。由此，可在开展农地二轮延包工作的同时，同步进行耕地质量检验行动。

在精准评估耕地质量状况后，依据检验结果，可将耕地划分为绿灯区（安全利用）、黄灯区（限制利用）和红灯区（强制休耕）。绿灯区，即优质耕地，其耕地质量应符合《耕地质量等级》三等耕地标准，重点用于粮食生产，禁止擅自改变耕地用途。黄灯区，即中低产田，其耕地质量应符合《耕地质量等级》六等耕地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引导因地制宜轮作休耕，采取轮作休耕维持地力与禁止连作易导致土壤退化的作物等限制利用措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在休耕期间，为保护农户利益应发放耕地保护补偿金于农户^[35]。红灯区，即退化耕地，在此区域内，耕地因肥力严重不足或污染风险较高，必须进行强制休耕，以恢复地力和降低环境风险；在强制休耕期间，为保护农户利益，应发放耕地保护补偿金于农户。退化耕地强制休耕期满后，需经专家质检，达到黄灯区标准方可复耕，且复耕首年禁止种植高耗肥作物。

3.1.2 建立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制

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制是及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的工具，是监测预警耕地不合理流出的手段，能够帮助快速发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线索。构建耕地保护补偿的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制，需充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机制的权威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耕地保护法》（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将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这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等级评定标准，为构建耕地保护补偿的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机制提供了实施依据。根据《耕地保护法（草案）》第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统筹规范耕地保护卫星遥感监测工作的通知》，可由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耕地动态监测平台的建设，借助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的监测手段，对全国耕地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耕地的变化情况，包括耕地的占用、开垦、土地用途变更等信息，为耕地保护的动态调整与监测评估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管理和保护^[36]。此外，可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公开耕地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将考核结果与用地指标奖励等政策挂钩，以此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履行耕地保护职责。

3.1.3 强化法律责任与惩罚性赔偿

依据《耕地保护法（草案）》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地方政府承担辖区内耕地数量、质量与生态保护的三重法定职责，具体目标包括维持耕地保有量、维持耕地质量等级及落实生态红线管控等要求。由此，应强化地方政府承担辖区内耕地数量、质量与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对未达标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市县长、自然资源部门主管）启动分级问责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十二条，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行政记过、降级或撤职等处分；中央财政依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按未达标面积比例扣减地方转移支付资金。

而强化企业法律责任，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企业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人处以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由此，通过明确企业污染耕地的法律责任，遏制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倾倒等破坏耕地的行为。

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是德国土壤保护体系的基本法，也是欧盟制定土地保护框架法令的参考法律之一，对强化我国耕地保护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借鉴意义。针对恶意破坏耕地生态功能的行为，可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和追责范围^[37]（如企业非法排污或盗采黑土导致耕地退化，即使多年后土地易主，原责任方仍需承担全额支付土壤修复费用及长期监测成本等修复义务）以及明确惩罚性赔偿标准（如按修复成本3-5倍处罚），破解“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困局，为耕地保护提供刚性法治保障，推动生态修复与公平追责。同时，可借鉴德国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模式，

通过公示污染企业名单、鼓励公众举报，形成“法律追责+社会压力”的双重约束，增强社会监督力度与公众参与度。

此外，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八条可知，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闲置、荒芜耕地。因而，可以将农户连续两年未耕种且未申报休耕的，视为撂荒；通过对持续撂荒的农户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主动复耕撂荒地的农户发放一次性补助的措施，强化农户耕地保护的法律责任。

3.2 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机制和规范使用过程

在农地二轮延包政策下，耕地保护补偿资金需求持续增长，但我国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方式主要依赖政府间补偿与地方行政部门的补偿，这些补偿资金在本质上来源于单一的政府纵向财政补贴，给政府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也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补偿需求，限制耕地保护补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此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需进一步拓宽，构建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破解耕地补偿财政压力及效率的困境^[38]。

3.2.1 激活市场化补偿路径

结合《土地污染防治法》《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激活市场化补偿路径是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关键环节。耕地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39]及外部性，其不仅为农民带来直接生产收益，还为社会整体提供丰富非生产功能，如保障粮食安全、维持生态平衡等，而其负外部性则体现为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会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40]。市场化补偿可以为耕地的非生产性功能赋予一定的经济价值，使得耕地的保护和利用能够兼顾社会整体利益，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纠正这种负外部性。

《土地污染防治法》强调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的原则，明确了土地使用权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义务，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的责任。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中，应将这些原则和责任要求纳入考虑，通过市场化补偿路径，激励耕地保护主体积极履行土壤污染防治义务，同时对因保护土壤环境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和损失给予合理补偿。根据《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要求明确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即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或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度安排。

为激活市场化补偿路径，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耕地保护补偿。例如，制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对参与耕地保护补偿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支持，提高其参与积极性。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市场化补偿平台，为供需双方提供信息和服务，促进市场化补偿交易的顺利进行，如生态服务付费、绿色金融、碳交易等。生态服务付费是指用户直接为耕地提供的生态服务付费，如支付生态旅游费用、购买绿色农产品等；绿色金融则是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方式，为耕地保护补偿提供资金支持；碳交易则可以将耕地的碳汇功能纳入碳市场，使耕地保护主体获得碳交易收益；确保补偿资金的分配合理、透明，能够真正惠及耕地保护主体。

3.2.2 推动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化

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的研究视角除聚焦生态安全外，也应从粮食安全与区域耕地资源禀赋及经济增长协调性视角研究^[41]。对于耕地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省份而言，因超量的耕地保护任务而在发展经济收益相对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方面面临着诸多限制，使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给付也使其财政负担沉重。基于耕地的区际外部性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化有助于协调不同区域之间在耕地保护上的利益分配关系，缓解耕地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压力，最大程度地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明确规定了地区间横向补偿机制，耕地保护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可借鉴该机制相关规定，确定补偿方为耕地生态服务主要受益区（如粮食主销区、经济发达区），受偿方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粮食主产区、生态脆弱区；中央政府可以组织、协调下级人民政府之间开展横向补偿工作。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签订补偿协议，明确下列事项：补偿的具体范围，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列为重点补偿区域。补偿方式，包括资金支付、实物补偿、政策、项目、技术和智力补偿，如补偿方依据协议额度向受偿方的省级耕地保护基金池拨付资金，随后按比例

分配至农户；无偿供应农业生产必需物资、农业机械设备，以及开展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基础性工程；协同推进土地整治与耕地生态修复项目；补偿区向受偿区提供产业扶持、就业指导服务，以及组织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等帮扶措施。在实践过程中，增强其生产积极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实现耕地资源的长期稳定利用。

3.2.3 增设休耕期间的激励性补贴

我国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实践中，并无特别关注并设置对农户休耕期间的补贴，这一缺失导致农户普遍缺乏对耕地休耕的意识和积极性，进而引发了耕地的过度利用，甚至造成了不可逆的生态损害^[42]。这种损害不仅削弱了耕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还增加了后续修复的难度和成本。因此，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增设休耕补贴，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需要落实构建更为严格的“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43]。这一标准体系应涵盖耕地的数量保护、质量提升以及生态功能的维护，通过科学动态的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因长期反复耕种而导致肥力下降、土壤退化或生态环境受损的土地。及时识别这些需要休耕的土地，不仅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不可逆损害，还能降低后续修复的成本，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其次，应根据耕地的具体情况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应当获得的休耕补偿成本进行精准评估。休耕期间，农户可能会面临收入减少和生活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因此，合理的补贴标准至关重要。通过科学评估，给予农户适当的休耕补贴，不仅可以消除他们对休耕后生活成本的担忧，还能有效提升其参与休耕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推进休耕工作的顺利实施。

3.3 更加精确的补偿主体筛选规则

人作为生产中重要的影响因子，应当予以重视^[44]。在农地二轮延包工作中，一大痛点就是解决农地二轮延包及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面向的对象并不一致的问题。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中，受益主体往往是永久基本农田或其他耕地主体，而在农地二轮延包中，被延包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在延包中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需要明确其面向的主体，同时有几类主体应当被剔除在外：一是消亡户和五保户，二是已经在中心城镇买房的居民，三是举家搬迁到城镇和中心落户的居民；这几类主体已经能够明确得知，其经济来源不是耕地，同时产权也随着工作、搬迁等原因从乡村转移到城镇^[45]。在农地二轮延包、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更要谨小慎微地确认好补贴的主体，应当限制在实际务农及主要经济来源是耕地的农户。

3.3.1 明晰补偿主体的不同分类

耕地补偿主体的分类及权责界定是构建科学补偿标准体系的前提。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及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补偿主体可划分为补偿给付主体和补偿接受主体。从区域内视角分析，直接从事耕地保护的经营主体是补偿资金的主要接收对象，而从耕地生态服务中获益的主体则应作为补偿资金的支付方。从跨区域视角分析，补偿接受主体则通常为耕地保护目标较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补偿给付主体为耕地保护目标较低而经济发达的区域。此外，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耕地生态系统的价值，产生了负面的外部性^[46]影响；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耕地保护补偿责任，为耕地保护补偿给付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给付主体方面，政府作为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设置者与财政支付者，在纵向财政支付上，中央财政可通过转移支付、专项基金支持受偿主体，地方政府则配套资金并制定区域补偿细则；在横向财政支付上，通过“谁受益谁补偿”原则与跨区域横向补偿制度，向受偿主体支付补偿金。企业作为市场化补偿与生态责任履行者，应聚焦污染治理、生态抵消维度。工业污染企业需依法承担耕地污染修复责任，例如按污染物种类及超标倍数分级缴纳“耕地保护补偿资金”。高耗能产业则应将耕地碳汇功能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体系，按碳排放量的一定比例强制购买耕地碳汇指标。农业龙头企业可通过“订单农业+绿色溢价”模式，向采用生态保护措施的农户支付补贴，如中粮集团对有机种植水稻的加价收购。

在受偿主体方面，农户需得到直接资金补贴；合作社因规模化保护责任（如连片治理），其补偿标准应覆盖管理成本并体现生态效益。对于承担区域保护责任的主体，如粮食主产区，补偿资金应用于弥补因耕地“非农化”而丧失的机会成本，生态脆弱区的补偿则需覆盖土壤修复、梯

田建设等额外投入。此外，特殊群体如小农户、贫困户也应得到关注，其因保护耕地而放弃进城务工机会，需获得社会保障型补偿。

3.3.2 设置严格的补偿主体资质审核机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补充耕地主体补偿激励”，并强调“分类分主体制定耕地开垦费等费用标准”，要求“统筹安排资金用于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由此，在实施补偿激励时，必须保证实际补偿工作中的对象符合要求，配置一套适宜的资质审查机制与中央提出的“谁保护、谁受益”“以责定补、以补促管”政策精神高度一致。其作用在于，对现有体制的完善与补充，使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农地二轮延包后程序更加规范、规则更加适宜，为耕地保护主体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因此，对于二轮延包后应当给予耕地保护补偿的主体，资质的审查需要一套严格的机制。其一，对被延包的对象而言，需要审核其是否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在未来是否具备持续从事此方向的潜力，及其现在的耕地情况是否适宜继续耕种；其二，对延包的主体而言，资质审核部门需要综合各类信息，判断其是否具备符合条件的耕地，及其是否以耕地为主要经济来源。此外，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应当将三类主体排除在外：第一类是举家搬迁和进城落户的居民，第二类是已经在中心乡镇购房的个体工商户。第一、二类群体一般有非农业性的稳定收入，其生活、养老等需求对耕地的依赖性较低，应当以有偿的手段引导其退出土地，经过集体统筹和双方协商以转让给本村农户，避免无人耕种的情况发生；第三类是消亡户，由于整户消亡，无法继续履行承包合同，致使耕地长期撂荒，对此部分土地应当主动收回。

落实该套资质审核机制，仅仅依靠单方部门的力量，会导致审核程序变得繁琐和困难，程序的累赘影响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落实时效，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因此，还需建立起高效团结、节约资源的多部门协同审查机制，联合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公安、民政等多部门对受偿对象的身份信息、土地承包关系、户籍情况、经济来源等进行综合审查，确保有限的资金在调配中落到真正需要的主体身上，激励其在延包年限中有长足动力对耕地进行保护和利用。

3.4 设置更加科学的补偿标准体系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直接影响补偿主体的资金利用、农户的保护动力及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耕地保护补偿标准通常将耕地的生态、资源价值融为一体，未以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为基础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同时，仅基于耕地价值测算的补偿数值通常会远高于地方政府财政的支付能力。为此，在农地二轮延包背景下，需要设置更科学的补偿标准体系，充分发挥各方补偿主体能力，建立实践性更强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此外，也需严守耕地保护质量工作的检查，对土地情况已经不适宜继续耕种、应当将不得不休耕以恢复土壤肥力的土地纳入补贴覆盖的范围中来。

3.4.1 设置适宜的补偿资金标准

设置适宜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标准是构建更科学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体系的重点。《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第三条明确补偿工作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统筹协调，激励与约束并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制定补偿资金标准时，应严格遵循此要求，确保标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而为补偿资金标准的设定提供更明确、更具针对性的法律依据，应制定专门的耕地保护补偿法规或规章，规定补偿资金的具体标准、计算方法、资金来源、分配方式以及监督管理等内容。补偿资金标准应综合考虑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保护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具体包括耕地的质量等级、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保护需求、粮食生产能力、土壤污染治理成本等，以确保补偿标准能够充分反映耕地保护的实际需求和价值^[47]。如分类分级地针对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地力补贴及粮食规模经营三类场景，综合生态服务价值、质量保护成本及区域发展差异，构建差异化补偿资金标准。

永久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是粮食生产的根基所在。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其补偿标准应覆盖粮食安全责任、机会成本损失、义务保有量约束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耕地地力是农业可持续生产的核心要素，其补贴标准应覆盖地力维护成本、质量监测修复与分级激励措施。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路径，其补贴标准需覆盖规模成本分摊、生产效率奖励、生态协

同效益与产销区联动责任。此外，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和案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断优化测算方法和模型，提高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最后，可建立定期评估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物价指数变化、耕地保护成效等因素，对补偿资金标准进行动态调整，确保补偿标准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保持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3.4.2 建立动态的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统

建立动态的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统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农村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社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农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土地利用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同时农业领域的新技术发展势头也愈发向好，更加呼唤智能动态的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统。通过动态信息更新机制，能够及时反映补贴对象的最新情况，确保补贴对象始终符合政策要求。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可以集成土地承包信息、户籍信息、经济来源等多维度数据，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动态更新。同时，定期入户调查和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发现不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将其从补贴名单中剔除，确保补贴资金精准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农户手中。

监督系统则通过多部门协同监督、智能化手段和强化责任追究，保障补贴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多部门联合监督检查能够确保补贴对象的资格审核严格准确，而大数据分析、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智能化手段则可以实时监测土地利用状况和补贴对象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违规行为。此外，严肃追究责任和违规处理机制能够有效遏制弄虚作假等行为，维护政策的公信力。

动态信息更新机制和监督系统的建立不仅能够确保补贴对象的精准性，避免补贴资金的浪费和滥用，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有限的补贴资金真正发挥最大效益。同时，这一机制可以减少因补贴对象不准确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并适应农村社会的动态变化，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中央提出的“省级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统一管理平台”改革新政同频共振——用数字化、动态化、透明化的硬手段，将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25年自然资源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要求的“入库—监管—核销”闭环真正落实。

4 结语与余论

农地二轮延包政策的全面实施，既为耕地保护提供了长期稳定的产权基础，也对现行补偿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耕地保护补偿制度是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制度。为此，在农地二轮延包的背景下，应当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红线标准体系，遏制耕地过度利用问题或耕地二次撂荒问题，保持耕地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拓宽市场化与跨区域横向补偿渠道，应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持续增长的需求；明确耕地保护补偿的面向主体、设置更科学的补偿标准体系，通过制度创新破解保护动力不足、补偿效率低下等难题，实现耕地保护与农户利益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 [1] FENG L, BAO H X H, JIANG Y L. Reallocation reform in rural China: a behavio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Land Use Policy, 2014, 41: 246-259.
- [2] WANG H, TONG S F, SU F, et al. To reallocate or not: reconsidering the dilemma in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tenure policy[J]. Land Use Policy, 2011, 28(4): 805-812.
- [3] YU H, HUANG J K, SCOTT R, et al. Land right stability, land transfer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3(9): 82-91, 95.
- [4] 焦芳芳, 贾志宏, 刘启明. 农户土地诉求变迁与对其政策回应的探讨——基于豫西三个村实践的考察[J]. 农村经济, 2020(9): 59-66.
- [5] KUNG J K. Choice of land tenure in China: the case of a county with quasi-private property right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2, 50(4): 793-817.
- [6] KUNG J K. Common 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reallocation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a village survey[J]. World Development, 2000, 28(4): 701-719.
- [7] ZHAN Y, ZHAN X, WU M.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f land certification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J]. Land, 2025, 14(7): 1420.

[8] Wang, H., Xu, E., Huang, J. Farmland fragmentation, scale economy and the failure of fallow subsidy: A national panel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68, 101647.

[9] Tan L , Chen L P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path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829-1847.

[10] LIU Y S, ZHOU Y. Reflections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land use policy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J]. *Land Use Policy*, 2021, 109: 105699.

[11] CHENG L, JIANG P H, CHEN W, et al. Farm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for Changzhou City[J]. *Land Use Policy*, 2015, 48: 552-566.

[12] 俞家成. 论耕地保护补偿的法律内涵与制度表达[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5, 40(04): 29-41.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 (财农〔2016〕26号) [EB/OL]. (2016-10-21) [2025-10-27]. https://www.mof.gov.cn/gkml/caizhengwengao/wg2016/wg201606/201610/t20161021_2440126.htm

[14] 杨远舟. 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解析与重构[J].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 2024(1):18-42.

[15] ENGEL S, PAGIOLA S, WUNDER S. Design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 663-674.

[16] 杨庆媛, 王浩骅, 杨凯悦, 等. 中国耕地保护补偿体系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6(10): 15-29.

[17]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佛山市耕地保护补贴及激励办法》的通知[EB/OL]. (2025-02-10) [2025-10-27].<https://rec.southcn.com/post/512998>

[18] 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通知(河财农〔2025〕9号) [EB/OL]. (2025-03-10) [2025-10-27]. http://www.heyuan.gov.cn/zwgk/zdlyxx/czyjshsgjf/snbt/content/post_653413.html

[19]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的意见[EB/OL]. (2024-08-23) [2025-10-27].https://nr.gd.gov.cn/zwgknew/zcfg/flfg/gfxwj/content/post_4482581.html

[20]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通知(萧政发〔2020〕50号) [EB/OL]. (2020-12-09) [2025-10-27]. https://www.xiaoshan.gov.cn/art/2020/12/9/art_1229293108_1715839.html

[21] 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义乌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财农〔2017〕41号) [EB/OL]. (2018-06-29) [2025-10-27]. https://www.yw.gov.cn/art/2018/6/29/art_1229456347_59203460.html

[22] 临海市人民政府.临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通知(临政办发〔2024〕13号) [EB/OL]. (2024-03-13) [2025-10-27]. https://www.linhai.gov.cn/art/2024/3/22/art_1229304912_1692360.html

[23] 平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阳县耕地保护补偿》(平政办〔2016〕124号) [EB/OL]. (2016-08-08) [2025-10-27]. http://www.pycszxq.cn/Art/Art_23/Art_23_166.aspx

[24]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EB/OL]. (2017-07-20) [2025-10-27]. <http://zrzy.jiangsu.gov.cn/gtxxgk/nrglIndex.action?type=2&messageID=2c9082546000f1f201600a7a1b170024>

[25]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指导意见[EB/OL]. (2016-09-21) [2025-10-27]. https://www.hlj.gov.cn/hlj/c108040/202211/c00_31443920.shtml

[26]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

的函 (京政农函〔2025〕9号) [EB/OL]. (2025-05-21) [2025-10-27].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507/t20250704_4141510.html

[27] 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 北京市大兴区农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大兴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5-05-27) [2025-10-27]. <https://www.bjdx.gov.cn/bjsdxqrmzf/zwfw/zfwj67/1380045/2244424/index.html>

[28] 北京市朝阳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北京市朝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及政策解读[EB/OL]. (2025-06-05) [2025-10-27]. <http://www.bjchy.gov.cn/affair/zcjd/wzjd/4028805a96fc67e7019761e61aa54ac6.html>

[29] 北京市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北京市怀柔区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怀柔区财政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怀柔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5-06-11) [2025-10-27]. https://www.bjhr.gov.cn/zwgk/zcjw/202507/t20250701_4139078.html

[30]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农村局.关于《2025年昌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EB/OL]. (2025-06-09) [2025-10-27]. <https://www.bjchp.gov.cn/cpqzf/xxgk2671/cpqzcd/2025060915491392312/>

[31] 杨庆媛, 王文鑫, 周璐璐, 等. 耕地保护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6(10): 2-14.

[32] 杨庆媛. 协同推进土地整治与耕地休养生息[J]. 中国土地, 2017, (05): 19-21.

[33] LANDGRAF D, BOHM C, MAKESCHIN F. Dynamics of different C and N fractions in a Cambisol under five-year succession fallow in Saxony (Germany)[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Soil Science, 2003, 166(3): 319-325.

[34] 朱晓玲. 耕地轮作休耕补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农学学报, 2022, 12(06): 85-89.

[35] 孔淑杰, 梁伟森.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研究进展[J]. 国土资源情报, 2021, (09): 29-34.

[36] 牛帅, 胡业翠, 王清华, 等.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 理论内涵认知与指标体系构建[J]. 规划师, 2024, 40(11): 71-77.

[37] STRIIVE A. Grandstrukturen des Bodenschutzrechts[J]. JURA-Juristische Ausbildung, 2013, 35(4): 383-388.

[38] 刘刚. 基于耕地生态保护的利益补偿法律制度构建[J]. 长春大学学报, 2025, 35(01): 81-88.

[39] Brandt, L., Rozelle, S., Turner, M. A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Property Right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4, 160(4): 627~662

[40] Xiao Y, Wu X Z, Wang L, et al. Optimal farmland conversion in China under double restrain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 protec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142: 524-537.

[41] 孙晶晶, 赵凯, 曹慧, 等. 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其补偿额度测算——基于省级耕地-经济协调性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06): 1003-1017.

[42] 邹亚逍, 侯现慧, 景瑞祥, 等. 休耕政策对农户耕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土地依赖和耕地质量的中介效应[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7[2025-08-15].

[43] 杨庆媛, 刘燕, 杨人豪, 等. “三位一体”保护下的耕地休耕制度思考[J]. 中国土地, 2023, (02): 8-11.

[44] YAO Y. Land tenure choice in Chinese villages: the rational versus the political model[J]. Land Economics, 2004, 80(4): 477-489.

[45] 胡凌啸, 曹丹丘, 刘余. 二轮延包下的土地调整问题: 来自延包试点的启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02): 144-154.

[46] XIAO Y, WU X Z, WANG L, et al. Optimal Farmland Conversion in China under Double Restrain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 Protec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142: 524-537.

[47] 李冰强, 张小康. 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定位反思与规范重构[J]. 中国土地科学, 2024, 38(03): 10-17+70.